

目 录

总序	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	张西平	1
第一章	罗马教廷与蒙古帝国		1
一	蒙古的西征与欧洲的形势		1
二	出使蒙廷的使节		5
三	蒙王阿鲁浑遣巴扫马赴欧洲及教廷		11
四	蒙高维诺与中国第一个传教区		14
五	元顺帝与教廷互遣使节		16
第二章	明清之际中国的天主教		20
一	地理大发现与葡萄牙的保教权		20
二	耶稣会士开教中国		23
三	卜弥格以南明朝廷使节身份出使教廷		31
四	传信部与宗座代牧制的创设		40
五	罗文藻主教的任命		46
第三章	中国“礼仪之争”		52
一	双方的争执与教廷的裁决		52
二	多罗出使清朝及康熙皇帝的回应		60
三	嘉乐使华及 1742 年《自上主圣意》通谕		73
四	雍正帝禁止天主教		84
第四章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		89
一	法国在华的保教权		89

二	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务的态度	97
三	李鸿章拟与教廷通使	105
四	意、德等国攫取保教权	116
第五章	20 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	121
一	民初中国拟与教廷通使及失败	121
二	中外天主教人士对教会积弊的反思	127
三	刚恒毅来华及中国籍主教的任命	141
第六章	抗战与内战时期中国与教廷的关系	155
一	第二任宗座代表蔡宁来华	155
二	教廷承认伪“满洲国”与抗战时中梵关系	162
三	“圣统制”建立及应变与撤退	177
附录一	主要人名索引	189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05
附录三	图片	209
后记	217

第一章 罗马教廷与蒙古帝国

一 蒙古的西征与欧洲的形势

元代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地处边陲的蒙古族君临中原，统治中国达 109 年之久。唐时称蒙古族为室韦部落，《旧唐书》称其为“蒙古室韦”，他们以游牧为生，居契丹之北。五代以后，世贡辽金。后迁居斡难河（敖嫩河，黑龙江北源）及不儿罕山（今外蒙古和林东北）。1206 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举行盛会，共推铁木真为“大汗”，号“成吉思汗”，于是蒙古各部遂告统一。^①

成吉思汗生于 1162 年，其父被鞑靼人杀死。在度过了历尽艰险和寄人篱下的青年时代之后，他成为当时信奉基督教的克烈部的藩臣。他纵横捭阖，先与克烈部联盟，击败其他部族，然后再与之脱离，自立为汗。“他（成吉思汗）不但继承了帝国的传统，而且继承了文化的传统，并在其帝国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中，雇佣了更为开化的克烈人和畏兀突厥人。同时他也继承了草原古老民族好战的高度专门化的军事传统，以很高的速度和严格的纪律运用大群骑兵作战方法，这种速度和纪律，是西方重甲的骑士战术所不知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 453—456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

道的。”^① 由此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事业。

1211年，蒙古出征中国北部，在持续二十余年的战争中，蒙军掠山东、河东、辽西，克燕京，1233年与宋军联合灭金，然后，转而西征。1214年至1222年之间的纵横亚欧的征战，是历史上最惊人也是最惨烈的武功：蒙军在剿灭了突厥人新建的花刺子模国之后，穷追败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北部。同时，成吉思汗又派出另一支大军，在部将者别和速不台统帅之下，绕过里海南端，越过格鲁吉亚，翻越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驰骋俄罗斯南部，大败以基辅为盟主的俄罗斯诸国联军，经里海北部而归。12年之内，东、西两方的战场从印度河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无数城市被毁，村落成为废墟。蒙军的第三次西征是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的1236年至1237年，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和速不台在俄罗斯的王公们拒绝他们提出的交出“男子、公爵、马匹和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的要求之后，按顺序一个个包围并毁灭俄罗斯的城市——梁赞和莫斯科、苏兹达勒和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特维尔，“俄罗斯成了屠宰场”。蒙古的最后一次西征在1240年至1241年冬季，这是向西方的最后进攻。12月6日，基辅沦陷，蒙军通过这里，向西方进袭，其右翼通过加利西亚进入波兰，于1241年4月在西里西亚击溃波兰与日耳曼联军，拔都和速不台的主力进入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另一支蒙军向北冲进了奥地利，远抵克洛斯特诺伊堡。^② 最后，按照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说“不是由于欧洲的强大，而是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西欧才幸免于难。1241年末，窝阔台汗去世，在西方的蒙军首领拔都、

①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5—7页；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465—466页。

贵由和不里三将不和，终于在 1242 年撤退。

蒙古军队驰骋欧亚，为后来的历史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是野蛮和残酷的杀戮，成吉思汗以“凡我铁蹄所到之处，不许有任何障碍使我所骑的马为之绊倒”的悍气，纵使蒙军沦城村为废墟，人民为奴婢。1238 年，亦思马因人在送呈西方基督教世界英、法国王和教宗的信中，这样说道：“（蒙古人）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像蝗虫遍满地面，他们恐怖地毁坏了（欧洲）东部地区，……夷平城镇、砍倒树木、堕毁城堡、拔掉葡萄树、破坏园林、杀戮城民和农夫……因为他们残酷不仁，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怪物：嗜饮鲜血，撕裂、吞噬人肉和狗肉，穿牛皮，矮而壮，强健粗短，所向无敌。”^①《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作者以描绘世界末日来临的口吻写道：“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②《元史》诸将列传，几无不有“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然而另一方面，以贪欲为动机的“十万兵火万民愁”的征服过程，又会引出另一种历史结果：“蒙古人，……从亚洲的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③

当蒙古西征的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欧洲和小亚细亚一带正处于变动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天主教会内部教宗争立，教廷迁徙不定；同时教宗和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互争主权；由教廷和君主组织的远征东方伊斯兰教徒的十字军，屡次失败而回；拜占庭帝国因穆斯林的日趋强大和不断攻击而渐渐衰落；东

① 耿昇著、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 189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

②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第 64 页，康登学会，1914 年。

③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 29—30 页。

欧出现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希米亚和保加利亚等小国,且无力抵抗蒙古的入侵的局面。

在罗马教宗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 1227—1241 在位)时期,蒙古东征的消息不断传来,从波兰和匈牙利逃回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士,报告了蒙古军的杀戮情况。教宗获悉以后,曾致函日耳曼的各修会会长,试图组织抵抗蒙古的十字军,但因欧洲各国君主意见不一而作罢。^① 当时教宗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 II)与之争权。教宗在继位当年,便宣布对腓特烈的绝罚,还发动对西西里的进攻,但腓特烈回师击败教宗军。1239年,腓特烈率军攻入教宗领地撒丁。1241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罗马召开主教会议,试图反击,未成,同年去世。继位的新教宗柴肋提诺四世在位仅十七天便去世了。^② 一年以后,即1243年,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 1243—1254 在位)继位。他原为意大利人,生于热那亚望族。早年历任意大利阿尔本加主教、罗马教会副教长兼鲁奇那圣劳伦斯教堂枢机司铎、安科纳边境教区长。他在继位以后竭力振兴教权。1245年,英诺森四世与腓特烈谈判失利,从被围困的罗马城逃往法国里昂,在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 又称圣·路易)支持下召开里昂公会议。共有150名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与会,以作伪证、褻渎、异端等罪名,再次革除腓特烈二世教籍并废除其王位。同时会议号召各国君主支持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也就在这次公议会上,教宗和主教们讨论了如何应付蒙古入侵的问题。教宗决定派人到蒙古出使通聘。试图缔结和约,窥探蒙古的军事实力,并考察是否有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23页,(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② 《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第1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

可能使蒙古人改宗天主教。●

二 出使蒙廷的使节

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被教宗和主教团指命为使节。他出生于佩鲁贾(Perugia)一个贵族家庭,是小兄弟会的创始人,也是圣·方济各的挚友。他膺命出使蒙古时,已是65岁的老人了。同行者有波希米亚人司提凡修士,后来在经过赛里西亚时,又有一名波兰修士本尼迪克加入。他们于1246年到基辅,然后被蒙古人送往位于伏尔加河上游东岸的萨莱城,晋见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拔都决定立刻把他们送到大汗贵由那里,参加在金帐举行的即位典礼。他们被强迫以最快的速度骑马飞奔,每天换五六次马,“除了吃用水和盐煮的小米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食物,……除了用锅烧化的雪水外,我们没有其他饮料”●。他们终于在7月22日及时赶到位于哈刺和林的贵由营地,参加了贵由被拥戴和即位为大汗的大会。当时,蒙古各部的首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各归顺部族的首领,均参加了此次盛会。柏

● 《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第22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交流的传奇》Jean-Pierre Dreye 原著、吴岳添译,第101—10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公元635年,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来到长安,开始了基督教(时称景教)传华的历史。景教在中国一度盛行,至845年唐武宗灭佛时在中原绝迹。但在边陲地区的蒙古族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中仍有景教流行。中世纪的欧洲人隐约之间一直知道蒙古人中有人信奉基督教。1145年,叙利亚格白拉(Gabala)地方的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教廷,向教宗欧杰尼三世(Eugenius III)宣称远东有“长老约翰王”(Presbiter Johannes)是向耶稣圣婴朝拜的古代三圣王的后裔,要收复耶路撒冷。此后,天主教会中一直有人希望蒙古人改宗。

●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11页。

朗嘉宾在11月13日觐见贵由汗,呈上了教宗致蒙古皇帝的两道敕令。第一道敕令中教皇详细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第二道敕令则劝告蒙古皇帝停止向西方的进攻:“……兹特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徒。……全能的上帝迄今曾容许许多民族在你们面前纷纷败亡;这是因为有的时候上帝在现世会暂时不惩罚骄傲的人。因此,如果这些人不自行贬抑,在上帝面前低首表示卑下,那么上帝不仅不可能再延缓在今生对他们的惩罚,而且可能在来世格外加重其恶报。”● 贵由汗想请柏朗嘉宾把蒙古的使节带回欧洲,但被柏氏拒绝。柏朗嘉宾后来记叙他之所以拒绝大汗此一要求的原因是:“第一,我们害怕他们见到我们之间的内讧和战争,将会鼓励他们向我们发起进攻;第二,我们惟恐他们刺探我们国家的活动;第三,我们担心他们会被处死。”● 柏朗嘉宾在担心蒙古刺探欧洲的同时,却对蒙古作了一番详尽的“刺探”。他返国后撰写的《行记》共九章,其中有三章对蒙古的军事记载尤详:第六章:关于战争、军队的结构和武器,关于战争的韬略和部队的集结,对战俘的残酷性,对堡寨的包围和对于投降者的背信弃义;第七章:鞑靼人怎样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称,对自己臣民的压迫,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第八章:怎样同鞑靼人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情况,如何对付他们的韬略、堡寨和城市的防御工事,如何处置战俘。最后,他们于11月17日拿到贵由汗答复教皇的信,被遣送回国,于1247年5月9日再经拔都幕帐,最后于11月24日返回里昂。●

●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90—93页。

● 耿昇著、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104—105页,中华书局1985年。

● 同上书,第1—2页。

贵由汗让柏朗嘉宾带回教宗的信让西方人深感其“傲慢”。在表明了蒙古人不明白为何要接受西方基督教的洗礼以及对其“杀人之多”谴责的漠视之后,贵由汗最后说:“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至于柏朗嘉宾对于蒙古军事的刻意描绘,更使欧洲各国的君主忐忑不安。

当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军营的时候,教宗又派一使团出使近东的蒙古军营。此时,教宗正授权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教宗遣使的目的,希望能够联络蒙古人中的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合力进攻占据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

1247年夏天,教廷的三位使节龙如美(Andre de Longjumeau)、贵加(Guichard da Cremona)、亚杰利(Anselmo di Lombar 或 Ascelino)抵达蒙军前锋统帅拜住的军营。教宗使节不愿下跪,也不愿献礼。拜住大怒,命推出斩首,幸得拜住妃子中有一信景教(聂斯脱里派)者的营救,乃得幸免。7月25日,拜住将回信交给使节带回。拜住的回信言辞倨傲,称教宗“来信谓吾侪杀戮过重,殊不知吾人如此行者,乃奉长生天之命,与大地全土主人之诏敕。凡来降者,可保有其土地、河泽及资产,其胆敢抗命者当剿之。兹特谕汝教宗,如欲保有汝之土地、河泽及资财,必须亲自来营纳款,并遣使来朝”●。

1248年9月21日,法王路易九世统帅第七次十字军,驻扎于地中海中的塞浦路斯岛。12月14日,有两名青年,一名叫大卫(Moriffat David),一名叫马可(Marcus),自称是蒙古驻波斯军队统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8页。信末玺印文曰:“真主在天,贵由在地;上天神威,众生之王。”

● (日)佐伯好郎:《中国基督教研究》第124页。

帅宴吉只带的使者,晋见路易九世,由曾出使蒙古的龙如美任翻译。来信祝愿路易王国长盛不衰,并祝贺基督教十字军在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中获得胜利,语气与以往来信有很大的不同。此信很可能是伪造,但路易九世信以为真,于是派了龙如美和两名多明我会士约翰与威廉回蒙古报聘。他们于1249年1月27日离开塞浦路斯前往宴吉只带营中。宴吉只带遣法王使臣往见大汗,当时元定宗贵由汗已经去世,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临朝称制。龙如美拜谒了皇后。皇后复信路易九世,其内容令欧洲人大失所望:“据二教士言,本国与汝国之间,道途险阻,并有数敌国居于其间,……汝奉谕以后,须遣使来朝,欲和欲战,汝速自决。”^①龙如美于1251年回到小亚细亚的阿克复命。

由于蒙古朝廷视教宗和法王的使节为前来朝贡的人士,回信的语气十分傲慢,所以教宗和法国不拟再派使节。但是,那时的欧洲人已知道蒙古朝廷和军队中有人信奉基督教,所以教宗和路易九世试图派传教士进入蒙古。于是,在1253年5月7日,派遣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和另一位意大利人克莱莫那(Bartolomeo da Cremona)随行。^②他们带着国王的信件,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苏达克。这是一个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大商埠,可通往亚洲。6月1日他们离开苏达克,即遇蒙军,7月被送往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后又至钦察谒见拔都。拔都又把他们继续送往蒙古,12月27日到达和林,次年1月4日,受到宪宗蒙哥的接见。5月24日,又蒙召见,鲁布鲁克曾请求留在蒙古传教,但受蒙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35—37页。(日)佐伯好郎:《中国基督教研究》第247页。

② 方豪指出:鲁布鲁克自称不是使节,他对人说:“不要称我们为使臣,我已对可汗声明,我并不是路易王的使臣,……应称我为‘苦修士’或‘司铎’”(《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0—21页)。

哥的婉拒之后不得不返回,并于1255年8月15日到达的黎波里。当地主教不允许他回法国去见圣路易,而叫他将旅行经历以长信形式记录下来,另派人转呈国王。鲁布鲁克虽然没有可能留在蒙古传教,却记录了蒙古人中聂斯脱里活动的情况。据他所说,这些聂派教徒中很多人已转信佛教或伊斯兰教,有些人在放高利贷,有些人则娶了妻妾,已丧失了基督教徒的特性。另外,鲁布鲁克记载蒙古人的游牧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婚姻习俗以及从欧洲掳来的法国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的生活情况。^①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元代西方来华的最著名的人物,他虽然不从事传教工作,但他一家三口来华却为天主教的东传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Nicolo Polo)和叔父马飞奥·波罗(Maffeo Polo)于1265年或1266年抵达上都(和林),晋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要求他们回报教廷,“派一百名熟悉基督教信仰的贤人,通晓七艺,长于辩论,……据理阐明基督教信仰比偶像崇拜之类的信仰更好”^②。1269年,他们回到欧洲,1271年11月,他俩带了17岁的马可·波罗以及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的信,于1275年夏再来和林觐见大汗忽必烈。在后来马可·波罗口述的那本东西方妇孺皆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他以一个侨居中国17年之久的欧洲人的眼光,描绘了中国社会的概貌,使西方人知道中国广阔的国土,“连绵不断的城市和色镇”,“幽美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佛教僧侣的许多庙宇”,大量出产的“织锦和许多精美的塔夫绸”,以及“一路上有的是为旅客设置的好旅馆”。这些描写,最初“引起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像力”。其间,他在中国“习汉语,旁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世祖甚

① 耿昇著、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183—184页。

②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48页,中华书局1984年。

爱之,任官十七年,屡请返国,不许”^①。他留下了关于蒙古大汗参加基督教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和圣诞节宗教礼拜的记录,也记载了大汗对于各大教派并行不悖、兼容并蓄的政策。他(大汗)说:

基督教徒说他们的上帝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他们的是穆罕穆德,犹太人说他们的是摩西,偶像崇拜者说他们的是释迦牟尼,这是偶像中的第一神;而我这四位先知皆敬奉,尤其是其中在天居长位而更真实者,受我敬拜可保佑我。^②

马可·波罗又记载,信奉基督教的乃颜部落举兵谋反,为大汗平息,当地的佛教徒、回教徒和犹太人均耻笑乃颜所持的十字架,甚至在大汗面前讽刺基督教徒,为大汗所斥责:

他(大汗)召来许多基督徒,安慰他们说,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乃颜甚对,因为不好的和错误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帮助。乃颜反叛他的主人是背信弃义,因此乃颜罪有应得,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未助他是对的,因为不应助逆是好事。^③

蒙古帝国囊括从太平洋伸展到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广大国土,境内儒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人群居各处,蒙古的原始萨满教不能够提供精神统一的象征,正如蒙古部落的组织不能为帝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518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55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同上书,第154页。

国行政提供基础一样。然而,蒙古的统治者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行着一切宗教受到尊重的普遍宽大的政策与法令。

三 蒙王阿鲁浑遣巴扫马赴欧洲及教廷

13世纪,中国景教出现了两位著名人物,一是巴扫马(Bar Sawma),他于1225年生于北京,其父西旁(Siban)是景教的视察员。巴扫马30岁时入隐修院,后在北京城外山洞里过着隐士生活。另一位叫马可斯(Markos),1245年生于山西霍山,其父为景教主教裴尼尔(Bainiel)。马可斯有志隐修,拜巴扫马为师。

在1275年至1276年,巴扫马与马可斯决心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们从北京出发,经山西霍山、敦煌、和阗、喀什噶尔、呼罗珊,抵达巴格达。他们在马拉加城(Maragh,今Tabriz)取得聂斯脱里派宗主教(Patriarch)马屯哈(Mar Denha)的介绍信,前往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北部遇着战事,不能前行。1280年,马屯哈在统辖波斯的蒙古大将旭烈兀的妃子托古思可敦的支持下,委任马可斯为驻中国的契丹总主教,而巴扫马则为总视察员。^①

1281年,马可斯和巴扫马在回国途中,听到马屯哈去世的消息,折回送葬。然后,在选举继任的总主教时,各地主教竟一致推举马可斯为“东方教会宗主教”,法号雅八拉哈三世(Yabalaha III),其辖区从东方的中国至西方的巴勒斯坦,北至西伯利亚,南至锡兰。^② 11月,举行了祝圣典礼,马可斯时年才35岁。

当时,蒙古统治波斯的西域宗王阿鲁浑(Arghon Khan,元宪宗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1—32页,(台)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②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与开封犹太人》第107—10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

蒙哥之子)倾向景教,宣称如能克复“圣城”耶路撒冷,他便入教。为联络西方的教廷和欧洲各国君主,他请景教宗主教雅八拉哈三世即马可斯推荐人选,马可斯立即推荐了巴扫马。

1287年3月,巴扫马及其随行人员从黑海的一个港口出发,乘船至君士坦丁,两个月以后抵那不勒斯,然后到了罗马。此时教宗奥诺利伍五世(Honorius V)刚刚去世(1287年4月3日),巴扫马无法向教宗呈递阿鲁浑及宗主教雅八拉哈三世的信,于是在新教宗登基之前,于9月间抵达巴黎,晋见了法王腓力四世(Philip le Bel IV),瞻仰了耶稣的茨冠和十字架的真圣木^①。阿鲁浑致法王腓力四世的信至今仍存巴黎古今文牍官库内。阿鲁浑在信中对法王说,听说“伊儿汗(И-Kan,即波斯汗)出征埃及时,汝应派兵接应。有志如是,甚堪嘉尚。余虔信天气,将于豹儿年(1290年)冬末月杪出师。春季第一月驻兵大马斯(Damos),汝如预定地,践约兴师,大福荫助里,耶路撒冷可克,余以之畀汝。否则会军之时约无定,吾人之行动不一,则无利益之可言矣”。^②同年11月,巴扫马离开巴黎来到波尔多(Bordeaux),晋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英王请求巴扫马主领圣餐,用的是景教礼仪。

1288年2月,新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holas IV)继位。巴扫马及随从回到罗马,受到教廷的欢迎。巴扫马呈上了阿鲁浑及雅八拉哈的信。教宗邀请巴扫马按景教仪节主领圣餐,巴扫马也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天主教弥撒。人们观看了巴扫马的主礼后说:“虽然语言不同,但是礼仪相同。”巴扫马还向教宗请求赦罪并领受圣体。^③在巴扫马启程回去之前,教宗尼古拉四世赐给他基督的一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2页。

② 《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

③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3页。

小片衣服、圣母玛利亚的一小片头巾和罗马宗徒们的一些小块遗物；教宗给雅八拉哈宗主教的礼物是他自己的镶有宝石的纯金三重冠、金线织紫服、袜子和佩有珍珠的便鞋以及一个指环，此外还有一项特许证书。巴扫马给教宗的信现已不存，但教宗的回信仍在，教宗在信中感谢雅八拉哈宗主教对在近东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的照顾，并申明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教义。在致阿鲁浑的信中，教宗嘉许了阿鲁浑收复耶路撒冷的计划，并劝他“即刻接受洗礼，切勿迟延，以颂扬天主，并加速拯救自己”^①。

1289年，巴扫马回去向阿鲁浑复命，阿鲁浑应许建造教堂。就在同年，阿鲁浑又派了一个使团前往欧洲。使团由一个欧洲世俗人比斯卡莱带着三位绅士、八个马夫、一个厨子及六个仆人组成。使团在复活节后出发，数月后抵罗马，后去巴黎和伦敦，未获成果。1290年，阿鲁浑又派了一个使团，该使团的活动不为人知，但教宗于1291年8月21日和23日回信尚存，都规劝阿鲁浑早日受洗入教，并通报英王爱德华将远征耶路撒冷的消息。

但此时阿鲁浑已经去世(1291年3月7日)，其弟凯卡图即位。在其后一年中，凯卡图去世，其堂兄拜都即位，不久又去世。阿鲁浑的长子合赞继位，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由此转衰。^②

巴扫马晚年管理军营教堂，1294年1月在阿尔伯拉去世。雅八拉哈三世先在巴格达管理教务，后回到马拉加，晚年的雅八拉哈受到穆斯林的攻击。1304年5月，他在给教宗的信中承认“罗马教宗为全世界基督徒之父，圣彼得的继承者”；但是在教会事务方面，这位东方宗主教一直独立于罗马。^③

①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32—137页。

②③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37—141页。

四 蒙高维诺与中国第一个传教区

1294年,罗马教廷派遣的第一位正式的宗座使节(Legatus Apostolicus)约翰·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抵达元大都。

蒙高维诺于1247年生于意大利南部萨莱诺(Salerno)地方的孟高维诺·洛勿拉(Montecorvino Rovella),是方济各会修士,早年曾在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1289年,亚美尼亚海屯二世(Hation II)委任他为代表,晋见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教宗特命他任教廷使节来中国。蒙高维诺经亚美尼亚、波斯和印度,从海道来到中国。他登陆的口岸不详,很可能是泉州。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抵大都,觐见元帝,并受元廷的礼遇,准在大都传教。[●]

教宗尼古拉四世去世后,宗座三易其任,至克勒门五世(Clementus V),教廷移驻法国亚未农城。虽然经常收到蒙古境内其他方济各会士的报告,惟独没有蒙高维诺的片言只字,大家以为他不在人间了。但在1307年教廷忽然收到了他的来信。实际上蒙高维诺共寄回欧洲三封信:第一封约写于1292年或1293年间,寄自印度马八儿;第二封信写于1305年1月8日,发自汗八里,这是教廷收到的一封;第三封写于1306年2月的复活节前第五旬主日。这三封信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献,从中可以获知一些重要的讯息。

其一,蒙高维诺说,他觐见大汗时,请他改宗天主教,“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对基督徒颇宽厚”,说明元代虽待基督教比较宽容,但无改宗之意。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8页。

其二,当时聂斯脱里派在元朝有频繁的活动和不小的势力,蒙高维诺初到中国时,曾受他们的排挤,甚至被诬下狱,历经艰辛,方得昭雪。“其人造作诽谤,谓余乃侦探匪徒,而非由教宗派遣。稍后,其人又伪造证据,谓教宗实有大使派来东方,赠礼物甚伙,至印度时,余暗杀大使,而窃其物也。余尝受法庭传审,几受死刑。最后乃得天主怜助,有某君作证,启发大汗之天心,使知余实冤枉无罪,告者诬妄。”当时中国境内的聂派教徒共有3万人,雄于资产,建有华丽的教堂,足与天主教抗衡。

其三,在1305年的信中,蒙高维诺说他在汗八里建立了三座教堂,已付洗六千多人,如果不是聂派的阻挠,付洗3万人也是可能的事。他还收养了40名7岁至11岁的幼童,教以拉丁文和教会礼仪,又组织圣诗队,并将《新约》及《旧约圣咏》译为方言,不过他没有说是蒙文或维吾尔文。^①

其四,蒙高维诺在信中说,他抵达中国的第一年,即劝化了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其子术安即约翰的转音,因由蒙高维诺为之施洗而得此名。汪古部分布在河套地区五原县包头镇诸地,由于蒙氏敦劝,他们放弃了聂斯脱里派而归依天主教,还营建了自己的教堂。那座教堂离北京有二十天路程,但蒙氏没有时间去视察。^②

1307年,罗马教廷鉴于蒙高维诺在孤军奋斗中取得的优异传教成绩,特设汗八里(即北京)总主教区,委任蒙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及教务。远东教

① 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第265页。

② 高唐王阔里吉思为蒙古族汪古部首领,此部在唐末以后一直归信聂斯脱里派。蒙高维诺称阔里吉思为“长老约翰王”的后裔。他在蒙高维诺劝说之下,放弃聂斯脱里派信奉,接受天主教的小品(天主教神职中低级部分),并营建了华丽的教堂,称为“罗马教堂”。蒙高维诺还与阔里吉思合译了全部的拉丁文日课经,并以方言和当地文字举行弥撒。

区也归蒙高维诺领导,并拥有简擢主教和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宗,只须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从教宗处领取总主教授带,但授带的传袭,须由教宗的认可。● 同年7月22日,教宗克勒门五世祝圣方济各会主教七人,命由海道来华,协助蒙高维诺,但只有哲拉得(Gerardus)、佩里格林(Peregrinus de Castello)和安德烈(Andreas de Perugia)三人抵达中国,他们在1308年来华祝圣蒙高维诺为总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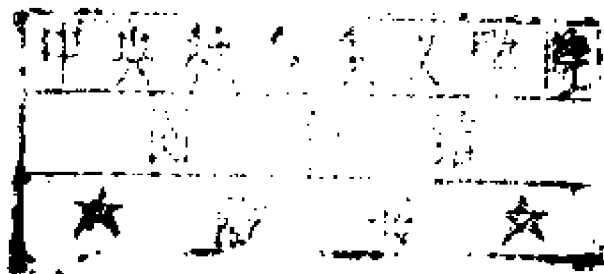
五 元顺帝与教廷互遣使节

1328年,蒙高维诺在中国工作了三十余年之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教宗约翰二十二世(Joannes XXII,1316—1334年在位)五年以后才知道蒙高维诺去世的消息,曾派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Nicolas)为继任主教。但他是否到任,史无明文记载。

蒙高维诺任主教期间,曾劝化了一些外来的部族信仰天主教,包括从俄罗斯和西方来的军人,其中最重要的部族是从黑海高加索地区来大都的阿兰人(Alans)●。他们在蒙高维诺去世以后,请求元顺帝遣使教廷,以通往来。同时,阿兰官员也上书教宗,请求委派主教和传教士来中国。阿兰人的上教宗书这样写道:“吾等恳求圣上(教宗)遣一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和有聪明才智之使者东去慰吾国人身心,并请催其就道,……因吾主(元顺帝)盼能开辟一条迅捷而完好之通道,以便圣上与吾主之间经常互派使节,建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8页。

● 阿兰人,史书称为满洲民族的一支,为匈奴所征服,并随匈奴人远征欧洲。匈奴失败以后,阿兰人退居高加索。蒙古窝阔台西征时,阿兰人投降。窝阔台选一部分阿兰人随军征战。于是阿兰人在元朝任官职。(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41页。)



立友好。”^①

1336年,元顺帝所派遣的使节携带着顺帝致教宗书及阿兰官员上教宗书,从大都出发西行。使团正使安德烈·弗兰克(Andrew the Frank),副使为威廉(William of Nassio)。两年以后,使团抵达法国阿维农^②,觐见教宗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II),呈上书信和礼物。元顺帝致教宗书辞意和气,且求教宗祝福,不合元朝皇帝文书格式,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次使团系误传。但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考证出安德烈所携阿兰官员上教宗书上签名的人,在元史里都可以查证。^③至于顺帝致教宗信的译文,很可能译者迁就教廷的习惯自行改定。教宗本笃十二世盛礼接见了来使。安德烈于当年启程回国,顺路拜谒了威尼斯国诸侯、匈牙利国王及西西里国王。^④

教宗在1338年10月30日写了致元顺帝的回信,并且谕令组成一报聘元帝的使团。使团由四名方济各会士组成:(1)Nicolas Bonet;(2)Nicolas da Molano;(3)Giovanni da Firenze;(4)Gregory of Hungary。当年12月,他们离开阿维农,不久抵达意大利那不勒斯;次年3月,渡海抵君士坦丁堡,从这里再渡黑海至克里米亚的喀法,由中亚细亚进入阿里麻里城^⑤,然后来到大都。

① 此信写于1336年7月11日,见A.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83—284页。

② 14世纪法王腓力四世与教宗卜尼法斯八世争权。卜尼法斯死后,在法国压力下选出的新教宗克雷芒五世于1309年将教廷迁至法国阿维农。迫于法王压力,他同意国王向神职人员和法国教会征税,解散拥有大量财产的圣殿骑士团。在他之后任教宗的有:约翰二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克雷芒六世,英诺森六世,乌尔班五世和格里高利十一世。他们都是法国人。枢机团中法国人亦占大多数。1377年,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

③④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42—43页。

⑤ 其城遗址在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

该使团中第三人(Giovanni da Firenze)留下了出使的历史记载,此人姓马黎诺里(Magnolli),圣名若望(约翰),按当时方济各会会规,以地名或修院名字称会士,所以他被称为“圣老楞佐的若望”(Giovanni da St. Lorenzo)。他于13世纪末出生于意大利的历史名城佛罗伦萨,幼年入该城老楞佐修院,成为方济各会修士。

马黎诺里在1342年抵达上都,受到元顺帝的盛礼接见。在这年的8月19日陛见中,马黎诺里向元帝呈献了一匹骏马。这是轰动朝野的大事。元史记载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又说献马地点在慈仁殿。“二十一日敕周郎绘图,二十三日以图进……马黎诺里之献马,时人叹为盛事,揭傒斯作《天马赞》(《文安公文集》卷十四)、欧阳玄有《天马颂》和《天马赋》(《圭斋文集》卷一)、周伯琦有《天马行》(《近光集》)、陆仁有《天马歌》(《元诗选乾乾居士集》)、秦约有《天马歌》(《草堂雅集》卷十二)●。元顺帝极看重这匹骏马,譬作人中的英杰●。

马黎诺里自己也记叙了觐见元顺帝时的隆重场面:

“大汗看见战马、教宗礼物和用金箔密封的国书,极大喜悦,赞不绝口。对我们尊重备至。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精美的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惟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的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然后我们被送至官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87页。

● 权衡作“庚申外史”,记祈后对顺帝说:“‘脱脱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领之。会佛朗国进天马,黑色玉明,其顶高如下钩,置之马群中,若橐驼之在羊队也。上因叹美曰:‘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皆世间杰出者也。’”(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33页。)

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①

马黎诺里在元朝的宫廷住了四年之久，备受尊敬，丰衣足食。他于1346年离开上都，经杭州、宁波，由泉州从海路经印度返回欧洲，于1353年回到阿维农复命；次年5月12日被升任为皮西尼亚尼(Bisiniani)主教。当时，波希尼亚王查理四世到罗马行加冕礼，晋为日耳曼皇帝，他在听说马黎诺里出使远东的事迹以后，任命他为皇室顾问、皇宫神长及宫廷史官，并奉命撰写《波希米亚史》，书中略述他出使中国的经过。其卒年不详。^②

此时，蒙古帝国已是日薄西山，蒙古人震慑欧亚两洲的武力，将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之下，退出历史的舞台。1362年，汉军攻入泉州，泉州最后一位天主教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斯(James of Florence)被杀。1369年，元顺帝从北京逃亡漠北，信奉基督教的阿兰人也随之流亡，在元朝一度兴盛的天主教终于在中原销声匿迹了。

① A.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86—287页。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34页。

第二章 明清之际中国的天主教

一 地理大发现与葡萄牙的保教权

15世纪以后的欧洲诸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寻求市场的需要变得越来越迫切。然而,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原先欧洲与东方贸易的商路,已为土耳其人所扼。同时,十字军东征以后从东方流入欧洲的丝绸、香料、珍珠等奢侈品刺激着欧洲人向东方追求富源的决心,而从阿拉伯传入西方的罗盘、观象仪、分度仪等先进的技术,使得欧洲人的航海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大大丰富了。在伊比利亚半岛新兴的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取代了传统上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的海上霸权。接踵而来的是北美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整个世界的历史由此改观。

1492年,热那亚籍航海家哥伦布(Cristobal Colombo)在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及王后伊沙贝尔的资助之下,抵达美洲的西印度群岛。以后又在1493年、1498年和1502年三赴美洲。另一位西班牙探险家巴尔波亚(Balboa)则越过了巴拿马海峡,遥遥望见了浩瀚无际的太平洋。

葡萄牙人是欧洲另一个梦想从海路前往东方的民族。早在15世纪初,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王(Henry the Navigator)即设立航海学校,航海家们渐次沿着非洲东海岸蜿蜒航行。

1486年,葡人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抵非洲最南端,因遇风

暴,把该地命名为暴风角。葡王约翰二世更名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1498年,另一位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在阿拉伯领港人的指引之下,横渡印度洋,抵印度马拉巴(Malabar),并在登陆地点加利库特(Calicut)立石柱纪念。1510年,葡人以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为根据地,侵略印度东海岸及锡兰岛。当时葡萄牙在印度的总督阿尔伯奎克企图建立一个囊括从非洲直到东亚的帝国,不久,葡军即攻克了马六甲。1513年,葡萄牙的船只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广州湾^①。

在那个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海上的强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展开激烈的竞争。他们都在各自发现的岛屿和陆地上,竖立各自的国旗和国王的纹章,视为本国的属地。应这两个国家的请求,1493年5月3日、4日以及9月25日,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划分了西、葡两国的势力范围,以威特岛以西(Verd Islands)360海里之经线为界,东半球属葡萄牙势力范围,西半球属西班牙势力范围。但两国的争端,并未因此平息。1494年6月,两国订立《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同意将此线西移270里格(1里格约合6公里)。两年以后,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II)批准此约。到1514年,教宗良十世(Leo X)则准许葡王在任何未知地域一旦有新地发现,都有权占领。1529年,西、葡两国又订立《萨拉戈萨条约》,规定在摩鹿群岛以东17度处划一条线,线西和线东分别属葡、西两国势力范围^②。

在初期殖民时代,罗马教廷认为葡、西两国殖民扩张势力有助

① (美)斯塔夫瑞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译本)第136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郭圣铭、孙道天主编:《世界历史词典》第20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于天主教的传播,因此加以支持和鼓励。1443年,倡导葡萄牙航海事业的亨利亲王出任“基督骑士会”(Ordo Militiae Jesu Christi)长官。同年,教宗欧杰尼四世(Eugene IV, 1431—1447)颁发“Etsi Suscepti”通谕,赐予“基督骑士会”进占一切海岛的权利,并赐该会长官亨利以“保教权”(Patronage)。1452年,教宗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颁发“Dum Diversas”和“Divino Amore”谕旨,无限期给予葡萄牙王征服异域的权利和护教权:“希望阿方索国王、王子及继承人以独有的权利占有上述岛屿、港口和海洋,所有虔诚的基督徒未经许可不可侵犯其专有权。”^①天主教的传教士跟随着西、葡两国的船只,到了所有新发现的陆地和海洋,在北美的丛林,在印度的西海岸,非洲的内陆和东亚的岛屿上,建立了教堂,矗立了十字架。1522年,教宗良十世在教廷的公文中,首次将“中国地区”(Regiones Sinarum)列为传教的范围^②。1534年,罗马教廷在葡属印度的果阿成立总主教区,统辖远东的传教事务。当时中国并没有传教士,果阿总主教所辖的地区,只限于最初来东方的耶稣会士开教的地方。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并盘踞了澳门,于是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工作乃以澳门为中心。1576年1月23日,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ary XIII)颁谕“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成立澳门教区,辖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所有毗连岛屿,并任命耶稣会士贾耐劳(D. Belchior Carneiro Leitao)为署理主教,将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升格为主教座堂。澳门教区本身则隶属于印度果阿总主教区。^③

葡萄牙人认为,历代教宗颁布的通谕赋予葡萄牙国王拥有东

① (美)斯塔夫瑞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8—139页。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970页。

③ 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第18页,澳门基金会出版;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300页。

亚的“保教权”(Royal Patronage):(一)任何从欧洲出发的传教士前往亚洲,必须取道里斯本,并获得里斯本宫廷的批准。传教士除效忠教宗以外,还须宣誓承认国王的保教权;(二)教宗任命主教的人选,须得到葡王的认可。葡萄牙有权在传教区建筑教堂,派遣传教士和主教掌管传教区的教会。[●] 在此情形之下,罗马教廷只能通过里斯本政府间接地管理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教务。

“保教权”是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一种优惠特权,它起源于 5 世纪。当时教会召集天主教信徒帮助修建教堂及其他宗教设施,教会也赐予他们种种特权作为回报,其中之一就是教徒有指定当地的主教、教区神父或任命修道院院长的权利。15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试图利用西、葡两国殖民主义势力以赞助其在海外建立教会和派遣教士,于是赋予西、葡国王以保教权,时称“皇家保教权”(Royal Patronage)。于是,这个在欧洲已经衰落的“保教权”,却在非洲、印度、巴西、中国和日本等地兴盛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西、葡王室经常运用保教权来干预主教任命等宗教事务,教廷这才感到这个曾被利用扩大教会势力的手段已演变成为一种障碍。

二 耶稣会士开教中国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最早来到远东开展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是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士。

耶稣会于 1534 年由西班牙人罗耀拉(1491—1556)创建于巴黎,其宗旨是反对当时正在欧洲崛起的宗教改革,维护天主教的权威和正统地位。1540 年,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正式批准。与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本笃会等相比,耶稣会是一个新兴的修会,具

● (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译本)第 174 页,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有自身鲜明的特征:(一)耶稣会的西班牙文为 *Campaña de Jesu*, 意为“耶稣连队”, 该会仿军队编制, 组织严密, 纪律森严, 强调会士对会长、总会长及教宗的绝对服从精神。正式会士须发三愿(绝财、绝色、绝意)并绝对效忠教宗。(二)耶稣会既有保守绝对的因素, 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非常注重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 其会士尝以文化学术为手段, 结交文士及达官贵人, 甚至深入宫廷以扩展其势力。它的传教士走到世界各地以后, 目睹身受世界各民族的风俗与文化, 竭力调查研析, 以适应传教的需要。^①

沙勿略(*S. Franciscus Xaverius*)是耶稣会士中第一个到达日本和中国的人。沙勿略于 1506 年生于西班牙, 1540 年入耶稣会。1542 年他从欧洲起程, 历经印度、锡兰、满刺加、新加坡、摩鹿加群岛中的安那波和干那地等地。由一位名叫弥次郎的日本教徒引领, 他曾去日本传教并获得初步的成功。正是在那里, 他看到了“汉唐遗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由此产生了去中国传教的想法。他写道:“已在那里(日本)的葡萄牙人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国)。我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碰到的中国人, 也远比日本人更有教养, 更有学问, 而且都是勤劳者”。^② 在 1546 年 5 月和 1552 年的 1 月、4 月致欧洲的信中, 他都称赞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文化高深, 建筑精美, 国富民强, 表示了要前往中国传教的强烈愿望^③。1552 年 8 月, 他搭乘葡萄牙商船“圣十字号”到达广东外海的上川岛, 那里虽然距广州仅三十里, 但来岛上的中国人因为明政府的禁令无人敢违例送他去广州。数月之后, 他患了热病去

① 《耶稣会祖圣依纳爵传》光启编译馆节译第 107—155 页, (台)光启出版社 1983 年。

②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上列传(1552—1773)》第 1 页, 上海光启出版社 1998 年。

③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 62 页。

世,他对中国的议论和向往成为一种先期憧憬。

1578年,耶稣会东方传教团巡视员范礼安(P. Alexandre Valignani)^①在巡视了印度恒河流域的教会之后,在去日本途中在澳门逗留,范礼安在澳门对传教工作进行了如下规划:(一)必须改变目前在其他国家采用的传教方法,必须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二)要选派懂得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②

较早进入中国并尝试用中文传教的耶稣会士是罗明坚(Ruggieri),他于1580年入华,比利玛窦(Matteo Ricci)早两年,曾在广东肇庆、浙江绍兴等地传教。他首先用中文撰写了有关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天主圣教实录》(1584年),书中已出现了后来常用的“天主”、“三位一体”、“天主堂”、“礼拜日”等字眼。另一位在海外南洋传教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羨(P. Juan Cobo)于1583年在马尼拉出版了一部用中文写的《天主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不过他用的是闽南方言土话音译西班牙名词。

利玛窦是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者。^③他于1582年抵达中国,1601年进入北京,1610年逝世,在华28年。他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宫廷和士林,在上流社会中觅得知音,建立了以往任何传教士都无法比拟的、极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利玛窦致力于

① 范礼安,1538年12月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的Chieti城。早年获巴杜(Padoue)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566年5月在罗马入耶稣会。1574年作为耶稣会巡视员赴印度,1578年逗留澳门。后曾去日本筹划传教事宜。1606年1月卒于澳门。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42页,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

③ 利玛窦,1552年10月生于意大利安科纳边境的马切拉塔。1571年在罗马入耶稣会。1578年从葡萄牙起程来印度果阿,升神父。1582年4月,他奉命前往中国,次年从澳门进入广东肇庆。1589年至韶州,曾往南昌和南京。1601年抵北京,1610年逝世于北京。著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辨学遗牍》,合译有《几何原本》、《勾股义》等。

天主教本地化的努力：一方面，用中文著书传道，引证儒学与天主教教义并不相悖；另一方面，主张容忍中国教友祭祖祭孔的行为，使天主教在中国获得了一个进身之阶。

1603年，利玛窦出版其中文著作《天主实义》，引用中国古代先哲及儒家经典，力证“天主”即为六经所言之“上帝”，其证及的经典包括《中庸》、《诗》、《礼》、《易》、《商颂》、《大学》、《雅》等，并用先秦儒家经典来否定宋儒的“理学”，至于对佛道的批驳则不遗余力。[●] 在留给后世的《基督教远被中国记》（《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更提出了其重要的见解：

“中国哲学家最有名的叫孔子，他既以著作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人民追求道德……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敬他，孔子没有像神一样受到崇敬式的崇拜，中国人感激也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

又说：

“信奉儒学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人们藉此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尊敬，正如祖先生前要受到尊敬一样。他们并不相信死者确实需要摆在其墓前的供品，但人们说之所以要遵守这个习俗，是因为这是向已故先人表示自己深情的最好办法。……这种习俗不能指为渎神，而且不存有迷信色彩。”[●]

● 利玛窦：《天主实义》，清光绪三十年上海慈母堂刻本。无页数。

●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3页。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利玛窦对传教策略作了相应的调整,使天主教适合于中国传统的社会。他知道中国人不用脱帽、拥抱和吻手来表示尊敬,因此做弥撒时不叫信徒脱帽;中国礼教讲究男女有别,利玛窦去除了洗礼时的涂油仪式,在行必须涂油的坚振礼时,他让传教士用镊子夹着棉花,而不按教规用拇指涂油,终傅礼的涂油也加以变通。而最重要的是,他不认为中国信徒的祭祖祭孔是迷信,而视为对祖先和老师的尊崇。●

在利玛窦的倡导之下,耶稣会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着眼于天主教本地化的工作。1602年,利玛窦的同事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在广东韶州用中文出版了《圣教日课》,这是一部日常公诵经本。另一位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则用中文编纂了《弥撒经典》、《司铎日课》、《司铎典要》。在耶稣会士的请求之下,1615年3月20日,经教宗保罗五世批准,礼仪部颁令准许以中文实行弥撒圣祭,诵念日课,任用当地人士担任神职人员,并准许翻译圣经,举行弥撒时不必脱帽。●

除了在教义和礼仪方面的本土化措施以外,耶稣会士还将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方豪指出:“自利氏人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输入;而欧洲人之开始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及一般文化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

● (美)菲茨帕里克:《中国礼仪之争——中国社会和天主教制度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80页。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692页,岳麓书社1987年。

当时西学传播最重要的领域,集中天文、军事和舆地三个方面。

(一)天文学。中国历代王朝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之下,将天文历算视为通天和通神的重要工具,不仅有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含有择期营建宫室陵墓、推合皇室大婚及出师日期等重要的人文社会因素。利玛窦曾于1605年致信耶稣会总会长,敦请他派遣精通天文历算的修士来北京。^①1629年,著名政治家及天主教人士徐光启推荐汤若望(John Adam Shall von Bell)、龙华民等西教士入历局。明亡以后,汤若望于1646年制成新历,清朝加封汤氏为兼太常寺卿。至1657年,朝廷为表彰汤氏修历的功绩,授其为通政司通政史,晋一品赠三代,并赐号“通玄教师”^②。以后来华的教士,多以天文历算为晋身之阶^③。

(二)军事学。晚明之际,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屡屡犯边,京畿震动。明廷急需新式军事技术以作为与满族争战的利器。1618年10月,徐光启受命练兵。徐氏于1620年延请张焘及孙学诗两名教徒入澳门,求购西洋火炮。1629年,徐氏更请两广官吏往澳门购炮。澳门当局派葡将公沙的西劳(Gonzale Texeira-Corea)与耶稣会士陆若汉(Joannes Rodriguez Tçuzzu)将炮运往北方的涿州以御满族。^④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也为明清铸炮。1642年7月,汤若望为朝廷铸炮二十门,一次试放成功。汤氏还著有专门论述火炮技术的《火攻击要》(又名《则克录》)。^⑤到清朝入关以后,更有

① 罗渔译:《利玛窦全集》(四)第301—302页。(台)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17—218页,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③ 他们中有南怀仁、苏纳、恩理格、闵明我、徐日昇、李守谦、安多、白晋、张诚、诺若翰、李明、刘应、庞嘉宾、杨广文、麦大成、严嘉乐、仇天乐、徐懋德。黄一农:《清初钦天监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权力起伏》,《新史学》第2卷第2期,第90—91页。

④⑤ 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载《东方杂志》第40卷1号。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为康熙提供铸炮技术,并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发挥了作用。

(三)舆地学。中国历朝历代,均重视地域版图的划定。利玛窦一人中国,便知道此一问题的重要。1584年,利氏在肇庆制作了中国的^①第一幅世界地图,此图绘出经纬度数、赤道和五带,后屡经知识界翻刻,中国人由此获知地圆说及五带的观念。^②162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又作《职方外纪》,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鉴于耶稣会士在舆地学上所做的工作,清朝康熙皇帝起用大批传教士帮助朝廷测绘皇舆全览图。从1708年开始,康熙命雷孝思、白晋、杜德美、费隐、麦大成、汤尚贤、冯秉正、德玛诺等西教士,分别测绘长城、东北地区、朝鲜北部、山东、河南、浙江、福建、台湾、四川、云南、江西、两广、西宁、拉萨等地,历时十年,至1718年完成《皇舆全览图》。而当时欧洲各国的全国性地图绘测,或未开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已有此巨制,实为中西学术交流之大观。^③

在康熙统治的前期,大批传教士深得重用。南怀仁生前以钦天监监副之职,治理历法,后加太常侍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官居二品,卒后谥号“勤敏”。“荷兹异教隆恩,既叨荣于生前,又复蒙哀于身后,自古优恤远臣之典,从未若此巨盛也。”^④与此同时,另有西教士如闵明我、恩理格、徐日昇、安多、白晋、李明、张诚、刘应等等,踵至清廷任职。在1692年3月17日、3月19日上谕以及3月20日礼部奏疏以及3月22日康熙朱批之中,均重

① 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及社会的影响》,《辅大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53—354页,辅大出版社1983年。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866—868页。

③ 转引自林金水:《试论南怀仁对康熙天主教政策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1期。

申了天主教并非邪教,不应禁止:

“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使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这一系列文件,构成了完整的对天主教宽容的法令。这也是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以前在清朝“正教奉传”的惟一官方文件。

据统计,1667年,耶稣会所属信徒为256886人,共有会所41处,教堂159处;多明我会传教士自1650年至1664年共付洗三千四百余人,共有会所11处,教堂21处;方济各会自1633年至1660年受洗三千五百余人,会所11处,教堂13处。●

1670年,全国各修会统计所属信徒共273780人。●

此外,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于1619年和1626年先后在台湾登陆,在基隆、淡水、宜兰、三貂角等地原住民中展开传教工作,共发展教徒四千余人。此统计亦不包括澳门的信徒人数。●

根据当时反教人士如杨光先等人的章疏和信件,已知天主教已经流播到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开封及京都等大小城镇以及直隶、山东、浙江、福

● 《军机处档月摺包》(台)故宫博物院藏。第2751箱,7包,第48450号。“抄写得西洋堂内康熙三十年碑文”。载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宽容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4页,(台)辅仁大学,1992年。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974、981页。

建、江西、两广、四川、湖广、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份。

三 卜弥格以南明朝廷使节身份出使教廷

1644年,李自成率军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景山,明亡。不久,吴三桂开山海关城门引清军入关。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奉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改元“弘光”。但“弘光”朝廷内争不休,党争激烈,武将专权,疲弱而无抵抗能力。次年四五月间,清军在多铎率领之下攻破扬州,史可法殉国。六月破南京,福王被俘解北京,旋遇害。8月间,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建元“隆武”。又过一年即1646年,清军由博洛率领,渡钱塘江由浙东进入福建。九月,隆武帝由延平败退汀州,被俘遇害。^①同年10月,李成栋、瞿式耜等立明神宗之孙永明王朱由榔为帝,监国于广东肇庆。瞿式耜进吏部右侍郎,丁魁楚掌军国大事。不久,清兵破赣州,永明王避梧州,11月,朱由榔在端州正位,改明年(1647年)为永历元年。^②

南明政权与天主教传教士曾有联系。耶稣会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在开封传教时,曾与福王交游。后福王称帝“弘光”以后,曾命毕方济出使澳门,求葡兵援助。毕方济于1645年3月从南京出发,途中听说南京被陷、弘光遇害以后,他转而投奔唐王朱聿键,因早在十余年前,毕方济即与唐王有交谊。唐王以弘光委任之事委诸毕氏,并作书诏之曰:

“朕因万民之托而受命监国,誓复先帝所遗江山,并为万民谋福。尔毕方济,与朕相识二十载,堪称师友。曾

① (美)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第4—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82页。

三次遣书致意,欲委以武职,以襄大业。今先命尔为使臣,希有所教益,隆武元年正月初四。”^①

隆武帝被害以后,毕方济又为永历帝所挽留,任职于朝。在永历帝的朝廷中,天主教更具有影响。永历帝的司礼秉笔太监庞天寿为天主教徒,曾为崇祯宫监,受洗于汤若望之手,圣名“亚基楼”。明亡后逃到南方。另有大臣瞿式耜,江苏常熟人,受洗于艾儒略(Giulio Aleni)之手,圣名多默。崇祯年间,即升户部给事中,直言政事。永历帝任其为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后进文渊阁大学兼兵部尚书,1650年被害于桂林独秀岩前。瞿式耜麾下骁将焦璉,封新兴伯,抗清最力。永历元年清军攻桂林,“璉负创奋臂,呼督师、抚,按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马骑”。焦璉也是教徒,圣名路加,南京人。^②

德籍耶稣会士瞿安德(Andrew Xavier Koffler)也经常桂林出入永历的宫禁,向宫中后妃讲道。在庞天寿、瞿安德的劝化之下,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帝后王皇后及皇子慈烜,均受洗入教。皇子取圣名“公斯当定”(君士坦丁)。时永历朝据有两广、两湖、江西、云南等六省版图。

1648年10月17日,永历帝承太后旨意,遣庞天寿、瞿安德抵澳门耶稣会堂,献银香炉、银花瓶。澳门耶稣会副省会长曾德昭(P. Alvaro de Semedo)于10月31日举行大礼弥撒,葡萄牙行政长官亦设宴款待。此时耶稣会决定运动明廷遣使赴罗马,觐见教宗,并向教廷和欧洲各国求援。

① 费赖之著、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33)第163页,上海光启出版社1998年。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50页。

据罗光主教的分析：永历朝廷向教廷派使计划出自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因为他们具体筹划中国教务，而决策者则为在肇庆的庞天寿，因为身在桂林的瞿式耜并不与闻宫廷中的事。^①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Michael Boym)被指派为出使的使臣。卜弥格生于1612年，原籍为匈牙利人，家居肋阿波城(Leopol Levow)。他的父亲是波兰国王西吉斯蒙(Sigismond)的首席御医。早年的卜弥格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但在1629年，他却加入了耶稣会。完成学业以后，1643年从里斯本出发东来，1646年抵海南岛，在安定县传教。1650年抵澳门，被派往永历的宫廷。王太后、庞天寿等即决定上书教宗。庞天寿愿意前往，但年事已高，乃推卜弥格返欧一行。^②

卜弥格出使的名义为代表永历皇太后向教宗致敬，并携带太后上教宗书、庞天寿上教宗书及皇太后和庞天寿致耶稣会总会长书，此外尚有庞天寿拜会威尼斯共和国政要的名片。1650年11月，卜氏带了两名随从抵澳门。澳门主教和耶稣会副省长审查了上教宗书。而澳门地方行政长官此时见永历朝在军事上日益被动，清军节节获胜，虽不赞成卜氏的使命，但仍于1651年1月放卜弥格起程。

1651年3月，卜弥格抵印度马拉巴，然后改由陆路赴欧洲，经波斯、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到士麦拿(今伊兹密尔)，复乘船至威尼斯共和国，时在1652年12月初。12月16日，卜弥格受到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墨林(Francesco de Molin)的接见。当时耶稣会总会长尼格尔(P. Goswin Nickel)来信指责卜弥格擅自行动，命其前往劳莱多城(Loreto)听候训示。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52—53页。

② 费赖之著、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306—307页。

1653年春卜弥格抵罗马,时教宗英诺森十世在位,将此事交传信部审查。同年4月1日、7月22日、9月16日传信部各枢机开会三次。当时“礼仪之争”已起,枢机主教们对耶稣会抱敌视心理,甚至有人怀疑奉使事为骗局。另有人主张不当国的太后不能派遣正式国使。

1655年1月7日,新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即位。9月24日传信部召开特别会议,审查委员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枢机们认为如果教廷不复信明室,而卜弥格充使属于事实的话,将得罪明廷。波兰国王此时也致函教廷说情。教宗亚历山大七世于12月18日写了复南明太后和庞天寿的信。

卜弥格在完成使命以后,于1656年初从里斯本启程返航,同行者有柏应理、鲁日满、瞿安德等神父。此时中国国内的局势已发生急骤的转变。1649年,清兵下湘潭,次年1月破南雄,永历帝逃往梧州。12月,清兵入桂林,瞿式耜死。永历帝避走南宁,两年以后又避入云南。1658—1659年,清兵由贵州入云南,永历帝走腾越,皇太后病逝。6月,入阿瓦以北江对面的缅甸境内,居土著的茅屋之中。1661—1662年,清军向阿瓦推进,缅人于1662年1月将永历帝执送清军,同年4月永历父子在云南昆明被害。^① 庞天寿不知所终。

卜弥格先于1658年回到暹罗,澳门当局得知永历政权败退的消息,生怕得罪清朝,不允许卜弥格由澳门入境。改由暹罗赴安南,7月,由红河至安南,他想从安南边境进入云南,但永历的败亡已成定局。1659年8月22日,心力交瘁的卜弥格患重病逝世于安南与广西的交界处。^②

① 司徒琳:《南明史》第163—167页。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67—68页。

附：

南明永历王皇太后烈纳致教宗英诺森十世书内容如下：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

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阆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官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请入领圣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埃答报。每思躬诣圣父座前，亲聆圣诲，虑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遣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维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稣会士卜弥格，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之差圣父前，彼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

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王皇太后烈纳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如下：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予处官中，远闻天主之处，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遂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并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着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士卜弥格尽知我国事情，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①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致南明永历王皇太后复信内容如下：

明皇太后：教皇亚历山大问候亲爱的女信徒。在这一期间，你仍然沐浴在天主的恩泽里平安无事吧？请你领受我最崇尚的福祉。你写来的书信，文字优美，情思洋溢。皇太后领会了天主的慈善和全智全能，脱离黑暗世界，走向真理的光明大道，这个真理的根源在造物主天主那里。人们犯了罪，使天主感到震怒。但是，天主任何时候都以慈悲为怀，施恩于人们，使之结出真理的佳果。虽然皇太后在天主面前是一位卑贱的罪人，但是天主施与恩惠，正在保护着你。天主希望人人都把天主当做慈悲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95—297页。

的主加以敬拜,但不希望惧怕的人敬拜。过去不知道有偌大的你的国家,所以魔鬼占领了它,但是今天它信仰耶稣基督了。有谁知道天主的这种宏大的意愿呢?人们议论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官民信仰错误的宗教。了解这个大国的人毕竟是少数,不了解的人太多了。有谁敢于前往这个遥远的国家传播真经实道呢?这个国家是一个遥远而险阻的地方,远隔波浪滔天的重洋,层峦叠嶂,沙漠横亘,是一个似乎星星也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屹立着禁门的、外国人不能进入的地方,是一个虽然有需要拯救的灵魂但不能传教的地方。天主选拔了自愿献身的服务人员,命令他们到这个地方去传教。他们告别了留恋的故乡,不考虑家庭、名誉和利益,不畏艰险,前赴这个地方,传播真理。人们聆听传播真理的声音,领悟和信仰真理。应该永远铭记和感谢天主的这个恩惠,还要向子孙后代诉说这个恩惠,使他们恪守天主的诫命,坚定对天主的信赖。据悉,皇太子当定和宫闱中的许多人效法皇太后的榜样,也信仰天主,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将来随着信徒的增多,明帝国内部的错误的宗教会消逝的,当我预想到这一点时,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恳求天主应许受到祝福的皇太后、皇太子和皇后的诉请,并真诚祈祷皇太后的国土得到重新统一,享有和平,皈依信仰。

1655年1月18日^①

①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8页。(台)商务印书馆1968年。

庞天寿上教宗书如下：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餉，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膝伏因诺增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座前：窃念亚基楼职列禁近，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士，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宏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稍怠。获蒙天主保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礼圣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弗克遂所愿怀，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代请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禄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慈我大明，保佑国家，立即升平，俾我圣天子，乃大明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孙、主臣、钦崇天主耶稣，则我中华全福也。当今宁圣慈肃皇太后圣名烈纳、昭圣皇太后圣名玛利亚、中宫皇后圣名亚纳、皇太子圣名当定，虔心信奉圣教，并有谕言致圣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愚罪人，恳祈圣父念我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国，教化一切士民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邀大造，实无穷矣！肃此少布愚悃，伏维慈鉴不宣。永历肆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慎余。^①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致庞天寿复信内容如下：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 289—290 页。

亲爱的庞天寿：

亲爱的信徒，首先你将拥有信仰天主的人应得的福祉。能看到你的书信，我感到十分高兴。无论在东西南北的什么地方，天主都会恤悯你，施与大慈大悲。慈悲的天主以圣水的洗礼纯洁身躯，今天把你称为吾儿。你将由于耶稣的圣教，得到天国的欢乐。你在信中说，这个神圣的宗教，是中国人应当尊奉的楷模。如果认知天主，就会明白怎样采取一切行动。应该在你的大帝国里开展大事业（传教事业）。如果是这样，你的名誉得到提高，你的信仰不会动摇；爱心多如云彩，驾御万物。如果具有这种信仰和爱心，即使拥有世界大部分的帝国，也无所畏惧。今天我举双手表示欢迎的缘由是，即使在我们之间横亘着大海，出现任何困难，潜伏着任何危险，我对于你和你的国家的人民的热情不会减退，我将热心地施与你福音。

于罗马圣伯多禄殿

1655年12月16日●

耶稣会总会长答王皇太后的信，内容如下：

耶稣会总会长高斯温·尼格尔上大明中国睿智大皇帝书：

忆昔会士利玛窦赶赴大明中华，进呈天主图像及天主母图像于令先祖睿智万历皇帝，得蒙俯赐虔心收纳，并敬谨叩拜。嗣是中邦钜公，奉行天条者不乏其人。又有

●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9页。

帝王亲当敝会士多人,褒扬圣道。近皇太后遣敝会士卜弥格来此,得知寰宇对陛下崇敬圣像,均表敬仰。深信陛下不久必能师法皇太后,倾心圣教,恭领圣水。亟愿至尊天主赐四溟升平,止沸定尘,一如昔时唐太宗文皇帝、玄宗至道皇帝、高宗大帝、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时代,使大明皇图璀璨,德合天地。耶稣会全会为此祝祷,为此不断虔求天主。谨请敝会瞿、卜二会士与其他将赴中夏敷扬圣教者,托庇于陛下,并愿为大皇帝陛下竭诚效忠。1655年12月25日吾主耶稣基督圣诞瞻礼日肃。罗马。^①

四 传信部与宗座代牧制的创设

中国的天主教会,自1576年1月12日起,隶属于澳门教区,而澳门教区又受印度果阿总主教区的管辖。当时,澳门教区所辖的范围,包括中国、安南、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等地。由于葡萄牙享有保教权,果阿的总主教及澳门的主教是由葡萄牙政府推荐的,而且都是葡萄牙人。传教士前往传教区,必须向葡萄牙皇帝宣誓,并从里斯本出发,乘葡萄牙的船只并由葡政府提供保护,葡政府还提供交通费及传教士生活费用的资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会中的人上越来越感到这一制度存在的流弊。

1622年,罗马教廷创设传信部,专理全世界的传教事宜,有意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311页。

图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回处理宗教事务的权利。^①

耶稣会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最早提出这方面的主张。^② 罗氏长期在东方的印度、中国尤其是安南传教,精通安南的语言文字,了解东方的习俗和文化。1645年他被越南当局驱逐以后,从澳门取道印度、波斯,回到罗马。他向教宗和枢机院上书,认为必须培植本地的神职人员。他以安南为例指出:当时安南共有三十万教徒,需要三四百名神父,完全依靠欧洲籍神职人员是不可能的,惟一的方法就是从安南本地优秀的传道员中选拔人材,祝圣为神父。同时,罗历山认为西班牙、葡萄牙的保教权对天主教传教事业是一种妨碍,应由传信部以“宗座代牧”(Vicar Apostolic)的名义派遣代牧主教,直接受命于传信部和教宗,并由这些代牧主教在传教区培植本地的神职人员。^③ 罗历山尝试在意大利和瑞士寻找赞同他主张的人士,最后在法国遇到了赞同他的教会人士。罗历山在法国参与创建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并征求到一批学有专长的传教士。^④

早在1608年,教宗保禄五世即已声明,“乞食化缘的修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会士前往远东传教,不必经过里斯本;1633年,教宗乌尔班八世又申明,一切修会的传教士前往远东,都不必遵守葡萄牙王所作的由里斯本上船的规定。^⑤ 1634年,传信部委

①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载《中国天主教史论集》第301页,(台)1968年。

② 罗历山(P. Alexandre de Rhodes)1591年生于法国阿维农。1612年在罗马入耶稣会,1623年抵澳门,后长期在安南传教,精通越南语言文字,编有《越葡字典》、《越南语与拉丁语对照》,也曾到广东传教。1660年卒于伊朗伊斯法罕。

③ 穆启蒙:《天主教史》(第3卷)第224—226页,(台)光启出版社1990年。

④ 费赖之著、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11—212页,(沪)光启出版社1998年。

⑤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77页。

任方济各会士安多尼(Antonius de Sancta Maria)和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 B. Morales)为中国宗座监牧。又在 1637 年委任方济公院会士墨尔衔总主教(Franciscus-Antonius Frascella)兼理中国教务。^①但这两次委任都没有划分区域,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委任。

1658 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颁布敕谕,为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设宗座代牧制,委派直接属于传信部的主教,以教宗代权的名义治理传教区。初次任命的代牧有三位:(1)陆方济(Franciscus Pallu),为安南东京宗座代牧,兼管中国滇、黔、湘、桂、川五省教务;(2)郎莫(Lambert de la Motte),为交趾宗座代牧,兼理中国浙、闽、赣、粤四省教务;(3)1660 年,又命高多林第(Ignatius Cotolendi)为中国南京宗座代牧,管辖苏、豫、晋、鲁、陕各省和高丽教务。^②其中郎莫始终没有进入中国,后死于暹罗;高多林第在尚未到达教区之前即已去世。陆方济仅于 1684 年即临终前数月抵达中国福建省。

1659 年,罗马教廷圣职部对上述三位宗座代牧下达了一个特别指令,指示他们基督徒在如何适应中国本地习俗的问题上应采取灵活的态度,应该尊重当地的习俗与文化。该指令这样说:

“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良善道德,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有什么事情

①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 301 页。

②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 301 页。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 6 页。

陆方济(1616—1684)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之一。早年为法国图尔圣马力诺议事司铎。1658 年祝圣为主教,1661 年来远东马尼拉。1684 年进入中国,不久逝世。

郎莫(1624—1679)原为里昂最高法院推事,1660 年在巴黎被祝圣为主教。后从欧洲赴暹罗,死于当地。

高多林第(1630—1662)1658 年升神父,1660 年祝圣为主教(代牧)。

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输入中国更蠢的呢？不要把国家而是要把信仰输入中国。信仰不是要反对和摧毁任何民族的礼仪习俗，相反，只要这些礼仪习俗不是邪恶的，信仰要把它们保持下去。”^①

葡萄牙政府对于宗座代牧制，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当时葡王彼得二世(Peter II)为此派使节前往教廷交涉。1680年9月，教廷枢机团经讨论得出如下看法：一、教宗在以往的通谕中没有将整个亚洲的教会宗教机构交给任何一位葡萄牙君主，只是证明葡王可在他所捐助、支持和保护之下的教堂行使保教权；二、先前为阻止从菲律宾去亚洲传教，教宗曾下令教士从里斯本宫廷领取证书，再前往亚洲。但后来由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在印度均拥有殖民地，教宗乌尔班八世已取消此禁令，传教士可从最方便的道路去亚洲；三、不能同意葡王管制他不能保护的异教国家的天主教会；四、葡属印度总主教的权利，不会因教宗创设代牧制而受损害；五、派遣宗座代牧，不见得对葡王的权利会有损害。^②同时，传信部再下部令，将中国教务和安南分离，交趾宗座代牧不兼管中国教务，安南东京宗座代牧陆方济主教则改任福建宗座代牧，管理浙、赣、粤、桂、湘、川、滇、黔八省。^③

但葡萄牙政府并不因此放弃原先的立场。葡王彼得二世于1689年11月致信教宗，要求在中国设南京、北京两教区。传信部力争不可，但是，1690年4月，教宗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作出了妥协，决定成立北京、南京二教区，葡王仍享有推荐主教的

① Donald F. St. Sure, S. J. S Ray R. Nou: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PP.6.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no date

② (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75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③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301页。

权利。于是中国有了三个教区：一是澳门主教区，兼辖广东、广西；二是北京主教区，兼辖直隶、山东、山西、蒙古、河南、四川；三是南京主教区兼辖江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云南。三主教区均隶属于果阿总主教区。^① 同时又任命葡萄牙籍的加匝(Joao de Casal)神父为澳门主教，中国籍罗文藻为南京主教，意大利籍的伊大仁(任)(Bernardinus della Chiesa)为北京主教。葡萄牙王的用意，是将当时中国所有的宗座代牧主要人士，升为正式教区的主教，从此将宗座代牧制取消，而以澳门、南京、北京三主教，分治中国教会。

但这三主教中，只有澳门主教正式上任视事，罗文藻主教于1691年去世，伊大仁主教则是在九年以后才正式就任北京主教，且因当时形势不能驻北京，只是在山东临清县城寄住。

从此以后，中国天主教会的行政，混乱不清。澳门主教挟果阿总主教委任的代理权，在中国擅派神职人员。中国各代牧则群起反对。1695年，传信部再度下令划分三教区的辖域：北京教区管辖直隶、山东及辽东；南京教区管辖江南及河南两省；澳门则如前不变。除三教区所辖六省之外，其余各省分隶九个宗座代牧。1696年8月9日，传信部正式成立九个宗座代牧区：福建、江西、浙江、湖广、贵州、云南、陕西、山西。^② 葡王很不满意传信部的举措，于1711年建议添设福建、武昌、西安三教区，分治上述九代牧区的领域，但此建议被教廷拒绝。^③

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内部行政的混乱和矛盾还表现在传教士的宣誓问题上。1680年1月，传信部采纳陆方济主教的建议，命令宗座代牧区内的传教士一律宣誓服从宗座代牧。这个部令在中国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6页。

②③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303页。

传教士中掀起一场风波。陆方济于 1684 年进入福建,立即派卜于善神父(Philippe Le Blanc)赴广州,公布传信部命令。2月 11 日,卜于善公布此令,要求广州的传教士宣誓服从宗座代牧,^① 拒不服从者不能举行圣事。在广州的有些耶稣会士宣誓服从,但其他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则拒绝服从,因为他们都是西班牙人。当时西班牙在马尼拉的教会首长指示他们拒绝宣誓,否则西班牙政府将停止给予教会津贴。他们决定离开中国。10月 29 日,陆方济去世,继任者为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颜瑯主教(Charles Maigrot),他在福建境内雷厉风行,要求传教士必须宣誓。^②

当时,北京主教伊大仁深感宣誓问题的争执将有损于传教事业,他曾上书传信部,认为过错在各修会会长,至于传教士是否要宣誓可以便宜行事,采取灵活的态度。^③

这一时期法国的传教士在本国政府支持之下也来到中国。那时,深受康熙皇帝信任的南怀仁致信欧洲,要求派遣富于科学学识的教士前来中国。法王路易十四为削弱葡国的保教权,扩张法国势力,决定派耶稣会教士来华。1687 年,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udovicus Le Comte)、张诚(Joannes-Franciscus Gerbillon)、刘应(Claudus de Visdelou)来到中国。他们不按惯例从里斯本登船,而是从布列斯港登船,抵暹罗以后再搭中国商船从宁波登陆。法王路易十四嘱咐他们不得宣誓服从非法国人的宗座代牧。^④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 7 页。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 7 页。

③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 78 页。

④ 1680 年传信部颁布部令时,法国巴黎总主教 De Harlay 认为有损法国教士自由,于是由法王路易十四下令禁止法国教士宣誓。时耶稣会总会长 Gian Paolo Oliva 劝法王的告解神师 La Chaise 进谏路易王,后才收回成命。但法王仍命令法国教士在宣誓时应申明已获法王准允。

五 罗文藻主教的任命

在上述错综复杂的情势之中,产生了第一位中国籍的主教——罗文藻。这是中国天主教会历史上的特殊事件。

罗文藻,字汝鼎,号我存,1617年生于福建福宁府福安县南福安河西岸罗家巷村。当地村民多为教徒。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cta Maria)到福建传教。这年9月,罗文藻在利安当手中领洗入教。

1635年,罗文藻与利安当及多明我会贾神父(Francisco Diaz)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汇报中国教会内部发生“礼仪之争”的情况,后又在北京和福建传教。1644年,罗文藻再度赴马尼拉,入圣多玛斯学院就读,习拉丁文、西班牙文及哲学,以后往返于福建和马尼拉之间从事传教活动。1650年,罗文藻加入多明我会成为该会修士。1654年7月,在马尼拉晋铎,当地华桥曾为之庆祝。●

1655年,马尼拉省会长派遣罗文藻与另外几位西教士回国传教。1665年5月,罗文藻又一次回到菲律宾。●

这些年中,天主教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南明和郑成功的抵抗一度非常激烈,各地民众的起义也是如火如荼。清政府为了隔绝这些抵抗力量与海外的联系,厉行“禁海政策”,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沿海人民内迁数十里,片板不许下水。外国籍传教士几无潜入中国的可能。再加上1664年杨光先在北京朝廷发动“历狱”,导致次年1月清廷禁止国人信教,并命全国教士集中北京,然后迁往广东。散居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146—149页。

各省的教士,或者被捕,或者藏匿起来。^①

当时全国的传教和教务巡视工作,几乎由罗文藻一人承担,因为各修会的外国传教士无不托付罗氏一人视察。1667年前后,罗文藻的足迹遍历闽、浙、赣、粤、晋、鲁、湘、川、江南及直隶,仅福建及沿海各岛屿上,经他付洗的就有556人,其他各省有二千余人,较当时全体教士在30年中所付洗者为多,充分显示出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才具及重要作用。^②

1673年7月31日,传信部讨论通过决议,提升罗文藻为代牧主教,同时作出相应决定:(一)每年资助罗氏传教经费200银元;(二)祝圣他为带衔主教,与以前各代牧有从属关系,允许他与另三位法国代牧凭良心划分教区;(三)奉行罗马天主教公开礼仪(即不行多明我会特殊仪式);(四)由三位法国籍代牧选择适当的地点为他祝圣。10月2日,传信部再次举行枢机会议,请求教宗委任罗文藻为“教外地区”(Patribus infide libus)主教。^③

1674年1月4日,教宗克莱门十世(Clementus X)颁布的《宗座至上》(Super Cathedram)通谕说:“现在我们接受可敬的弟兄在中国、越南各地宗座代牧主教的建议。他们切愿你惟一的中國司铎,因着你(罗)出众而又正统的信德,以及对基督敬爱的热诚,……为此我们以宗座的权力任命你——多明我会菲律宾玫瑰省会士,为巴希利衔(Basilitanensis)主教。”^④罗文藻同时兼任宗座代牧,分管直隶、晋、豫、陕、鲁五省及高丽教务。

罗文藻在三年以后即1677年方才获知教宗的任命。他深知此项任命未经葡萄牙国王的同意,必然会遭到澳门当局的反对和

① 萧致治:《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114—1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149页。

③④ 张奉箴:《罗公文藻晋牧三百周年纪念》第16—20页,闻道出版社印行。

阻挠。如果得不到葡萄牙保教权治下的传教士的支持,将无法展开传教工作。因此,他通过陆方济上书教廷,辞去该项职务,同时指出了葡萄牙保教权的专横。传信部记录说:

“他(罗)无论如何不能负担这个责任而祝圣为主教。他谦辞自己资格不够,并且葡萄牙人会讲话,说他们是全远东保教权的主人。在那里,没有他们(葡人)的参与和同意,不能派遣任何主教等职务。”^①

其实,除了葡萄牙人以外,西班牙人也深表反对。当时菲律宾多明我会省会长嘉德朗(Antonius Calderon)即表示,如果罗文藻敢接受宗座代牧职务,即开除其会士身份以示惩罚,召回所有在华西班牙籍教士并断绝一切接济。因为在西班牙人看来,此项任命也违背了西班牙的保教权。在此情形之下,罗文藻被教会当局派往华侨集中的“洞内”地区传教。

在1678年和1684年,罗文藻曾屡次上书传信部,历述他迟迟不能接受祝圣为主教的原因。

1684年11月,陆方济主教在福建去世之前,曾希望罗文藻到穆洋去接受祝圣,不料在罗文藻抵达前两日,陆主教已经去世。直到1685年4月8日,罗文藻才在广州由方济各会士伊大仁(任)主教祝圣为代牧主教。自任命颁布到接受祝圣,延迟达十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作为中国天主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华籍主教,罗文藻十分重视华籍神职人员在传教事业中的作用。升任代牧主教以后,罗文藻曾经祝圣三位中国修士为司铎:(一)吴历,字渔山,常熟人,生于

^① 郑天祥编:《罗文藻史集》第82页,高雄总主教公署1962年。

1632年,自幼领洗,多才多艺,被称为“中国天主教史上元明以来能兼琴、棋、书、画的惟一人士”^①。1681年,50岁的吴历随柏应理神父去欧洲,后滞留澳门,入耶稣会修道。晋铎以后,他很少作画,一心传道,晚年一直在上海浦东地区传教。(二)刘蕴德,湖广人士,曾任钦天监右监副,与传教士过从甚密,曾被派往山西开矿,受诬革职,遂觉世荣虚幻,由南怀仁付洗入教。(三)万其渊,江西建昌人士,在杭州入耶稣会,在传教士的指导下读完伦理神学,在上海、南京和淮安担任传教工作,这三人均通晓拉丁文及教会礼仪。^②1688年8月1日,罗文藻祝圣以上三人为司铎。罗文藻还主张选拔年长的教友来充当神父,1685年1月他在致传信部的信中说:

“那些上了年纪、经过训练的好教友,知道重视神品圣事。这些人天主保佑,在合适的时候,我会祝圣他们。”^③

当时教会内部有关“礼仪之争”的裂痕已经非常明显。赞成和反对利玛窦传教方式的意见十分对立。作为一个中国籍的代牧主教,罗文藻主张争执的双方摒除意气,平心静气地加以调查研究,之后再由教廷加以裁决。他不赞成某些罗马的所谓“高层有资格的神长”(Patres Qualificatores)仅凭一些下层不完整不全面的肤浅报告,就武断地匆忙地下结论。^④他于1686年8月在南京向传信部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来源

①② 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读吴渔山遗著札记》第225—255、259—264页。
《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3月。

③④ 张奉箴:《罗公文藻晋牧三百周年纪念》第80、76页。

和意义,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对此的记载,历代先王的具体做法等等。他认为在敬拜孔子时并没有固定的祷词,即使皇帝向孔子敬拜时也没有这样做。他不认为祭孔有所谓宗教意义:

“至于有关祭孔部分,不只古人即现代人从没有承认自己向孔子祈祷,有指望他赏恩赐惠的意思。我曾听说几年前在福州城,有道教某派信徒,强要推孔子为神,编印祈祷小册子,后经发现遭到取缔。”^①

罗文藻主持教务的年代,教会内部对于传教士是否要向宗座代牧宣誓的问题争执不休。罗文藻主张采取灵活的态度。他请求传信部各枢机不要按字面执行命令,不宣誓的教士,也应准许他们施行圣事。对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来的五位耶稣会士,罗文藻以数学家视之,而不视同为教士,准许他们虽不宣誓,亦可施行圣事。对于这种先斩后奏、便宜行事的态度,罗文藻曾作比譬:古代中国各地有义仓,但未奉皇帝圣旨不得开仓。但某年该省大饥,如等朝廷钦准开仓,则必有多人饿毙。地方官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开仓分发粮食,事后受朝廷褒扬。罗文藻以此自比所作所为。^②

1690年4月10日,教宗亚历山大八世颁谕成立澳门、南京和北京教区,任命罗文藻为南京教区第一任主教。教宗在通谕中说:“我们任命你为南京教区的主教并牧者,把该教区的一切神形管理权完全托付给你,我们信赖恩宠与赏报的天主,使上述南京教区,获益而顺利地得以发展。”^③

① 张奉箴:《罗公文藻晋牧三百周年纪念》第140页。

② 1688年10月3日罗文藻在上海上传信部书。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53—154页。

③ (台)《恒毅》第16页,第34卷第10期。

晚年的罗文藻一直在江南地区传教,奔波往返,辛苦备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因他就任代牧和正式主教而对他忌恨和不满,他们都认为罗文藻的所作所为触犯了葡、西两国的保教权,更认为中国籍的神职人员没有资格胜任主教的职位。菲律宾多明我会圣玫瑰省驻马德里的代表明确表示不再照顾罗文藻,视罗氏为多明我会的敌人。此时的罗文藻一直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传信部于1688年3月两次指示他可以自由选择代理主教作为继任者。于是罗文藻推荐了意大利籍副主教余神父(Juan Francisco de Leonissa),他深知如由中国籍神职人员继任,必将导致教会内部的分裂,同时也不愿由葡、西两国神职继任,所以选择了意籍的余副主教。罗文藻对教会内部的殖民主义色彩和争权夺利非常失望,他在报告书中沉痛地说:“我看到了每个国家都为自己争利。”^①

罗文藻于1691年2月27日逝世于上海,享年75岁。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58—160页。

第三章 中国“礼仪之争”

一 双方的争执与教廷的裁决

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在康熙帝统治的后半期,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其原因是在教会内部爆发了“礼仪之争”。罗马教宗为解决这种纷争,先后派两任特使出使中国,并公布了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的谕令。这种违背晚明以来利玛窦传教方法的做法,引起了康熙皇帝和中国朝廷的疑忌,对天主教的好感在上层社会中渐渐消失。康熙帝在晚年已有禁止天主教传行的想法,到了雍正继位以后,终于在1724年颁布了禁教令。

“礼仪之争”的核心是关于天主的译名以及祭祖和祭孔。

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他所倡导的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的某些因素,诠释基督教的宗教观念。他所著的《天主实义》,尽可能引用儒家先哲的言论,证明基督教的天主乃“六经”所言的“天”和“上帝”：“吾天主乃古经书所言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言上帝也。朱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者也，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

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生,克绥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并断言“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①。以上寥寥二百余字,引证含有上帝的段落达十一处,而引征之文,包括《中庸》、《诗》、《易》及《礼》诸多经籍。利玛窦曾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拥护孔夫子,所以可以对孔夫子著作中遗留下来的这种或那种不肯定的东西,作出有利于我们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的人就可以博得儒士们极大的好感。”^②另外,利玛窦还容忍中国信徒的祭祖和祭孔行为,认为祭祖只是中国人表达对先人怀念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在于教育下一代孝敬家族的长辈;而祭孔只是知识分子表达对老师的尊敬,都属于社会性的而非宗教性的民间礼仪。

利玛窦的这些主张,在其生前并没有遭人反对,而且对于传教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当他去世以后,便在教会内部发生了争执。

最早的争论爆发于耶稣会内部。1610年利玛窦去世,继任利氏为中国省会长的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即提出意见,反对利玛窦使用的“天”和“上帝”。他的理由是,当时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巴范济(Francesco Pasio)得到日本耶稣会士的报告,日本人用理学家朱熹的思想去解释“天”和“上帝”,不能代表基督教所称的创造万物的尊神。^③龙华民命中国的耶稣会士对此问题加以研究,并征求徐光启、李之藻等奉教学者的意见。徐光启和李之藻都同意

① 利玛窦:《天主实义》清光绪三十年上海慈母堂刻本。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上)第90—104页。

③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80、81页。

利玛窦的主张。1612年,巴范济去世,继任的视察员是卫方济(Francisco Vieira),龙华民联合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向耶稣会中国日本区区长 Valentim Carvalho 上书,请求禁止使用“天”和“上帝”两个名词。此后在1617年、1618年龙华民两度上书,坚决要求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名词,一律采用拉丁文译名。那时,赞成这种主张的还有先在日本传教、后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陆若汉(Juan Rodriguez);而赞成利玛窦主张的则有庞迪我(Diego Pantoja)和高一志(Afonso Vagnoni)。1621年,耶稣会在澳门召集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赞成利玛窦主张的一派获胜。

由于龙华民等人不服,耶稣会视察员 Andreas Palmleiro 于1628年在上海嘉定召开会议,与会的耶稣会士约有九人或十人,徐光启等中国奉教学者列席了会议。会中讨论了38项问题,大半有关中国信徒的祭祖祭孔以及天主的译名。讨论结果多数人主张采用利玛窦的方案,认为祭祖祭孔并非迷信,但译名则采龙华民的主张。视察员还将议案携往北京,征询在北京钦天监工作的汤若望等西教士的意见。^① 1633年,耶稣会再度集会,决议仍采用以往习惯上的译名,赞成利玛窦主张的李玛诺(Manoel Diaz, Senior)继任为视察员,遂准许会士自由采用“天”与“上帝”。耶稣会内部关于译名之争,告一段落。^②

“礼仪之争”的扩大,源于耶稣会以外的会士抵华之后。

1632年,多明我会士 Angelo Cocchi 到福建福安开教。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也到福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是欧洲古老的修会,其会士在欧洲、非洲和美洲有着传统的传教方式,他们的方法是手持十字架,直接向信众讲解基督救难的故事,指责外教人愚昧深重,劝其皈信。他们认为耶稣会学术

①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82—83页。

传教方式过于曲折,而且这两个修会蔑视耶稣会向官绅传教的做法,主张向平民百姓宣讲教义。他们对当地信徒作了调查,写成一份“通讯”式的报告,作为向教廷控告耶稣会的基础。1643年,黎玉范抵罗马,他向教廷提出的指控包括了如下一些“可疑问题”：“守斋”、“女人领洗和终傅”、“放债重利”、“捐资修庙”、“敬城隍”、“敬孔子”、“敬祖先”、“事死如事生”、“祖宗”、“牌位”、“向望教者应解释中国礼仪为迷信”、“敬皇帝”、“圣字的称呼”、“参加外教亲戚丧礼”、“宣讲耶稣受难”等。

当时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将此提案交教义专家研究,1644年审查完毕。是年乌尔班八世去世,新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继位,教宗和圣职部(掌管教义)偏听一面之辞,作出了支持黎玉范、谴责耶稣会的裁决。传信部于1645年9月12日颁布了部令:(1)中国城镇乡村里为庙会、新年、供祭时经常向民众摊派捐款,如不违背教义,信徒可以接受摊派;(2)基督徒在敬城隍时可带一个带苦相的十字架,表面上敬拜城隍,内心却应崇拜十字架;(3)信徒不得参加祭孔活动;(4)信徒也不得参加祭祖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先人立祭坛和牌位。^①

耶稣会得讯以后,派遣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到罗马申辩。卫匡国于1654年抵罗马,向圣职部解释中国人的祭祖祭孔只是民间的礼节而非宗教的礼仪。奉教的学者可以在孔庙里参加领受登科的仪式,因为那里没有祭司在场,也没有崇拜偶像的设施制度,只是用政治和文化的礼仪,承认孔子为先师。至于祭祖,卫匡国认为,应将下层民众的迷信活动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举行的仪式分

① 诺尔(Ray R. Nou)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1645—1941) Edited by Ray R. Nou.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pp.2—4.

开考虑。天主教知识分子在祭祖时供奉果子、肉类和丝绸,奉祭如在,敬死如生,并不真想死者会来享受,只是用以表达内心的孝思和感恩。

在卫匡国的申辩之下,教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给圣职部指令,要求他们研究卫匡国的决定。1656年3月23日,圣职部给中国传教士下部令,做出了有利于耶稣会的决定:

“圣职部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以后,规定中国的入教者可以进行纪念祖先的仪式,甚至可以和外教人一同纪念,只要他们不做任何迷信的事情。甚至当外教人做迷信的事情时,只要没有颠覆的危险和否则不能避免他人的憎恨和敌意时,中国信徒在公开表明其信仰以后也可以在场。”●

1659年,传信部在给越南、东京和交趾支那三位宗座代牧的指示中重申这点,并嘱咐他们尽可能地适应当地的习俗。●

1669年11月13日,圣职部再度发布部令,指出以前颁布的有利于多明我会的第一个决定(1645年9月12日)以及有利于耶稣会的第二个决定(1656年3月23日)都是有效的,即由传教士根据当地客观的情况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判断。●

然而,自此以后,事态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耶稣会。

1664年,杨光先在北京掀起反教风潮,当时有19名耶稣会士、

●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1645—1941)” Edited by Ray R. Nou.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pp. 6.

● 此一重要部令引文见第二章第四节。

●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33页,(台)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三名多明我会士以及一名方济各会士被禁押在广州。他们利用相聚的机会,于1667年12月18日开了一个关于传教方法的研讨会。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关于祭祖祭孔应遵守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所批准的圣职部部令。1668年1月26日,与会传教士一一画押遵守。方济各会士利安当不同意条文,没有签字。另一位多明我会士那槐莱(Dominic Navarette. O.P.)也有异议,他潜至澳门,最后返回欧洲。1676年,他在马德里出版了《中国历史及宗教风俗概观》上册,三年以后又出版下册。这位对中国文化仅略知一二的传教士,拾取中国乡村风俗,历述中国祭祖祭孔为迷信,后被译为法文,成为在当时法国流行的“扬森主义”者攻击耶稣会的重要口实。^①一时间,许多不通神学而又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人,都参加辩论,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了。^②

另一位反对利玛窦传教方法的重要人物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继陆方济为福建代牧的颜珰(Charles Maigrot)。

1693年3月26日,颜珰忽然发布一条文告,宣布在福建代牧区禁止祭祖祭孔的礼仪。该文告宣称,那种认为祭祖祭孔只是民间性而非宗教性礼仪的说法,是“似是而非、错误百出”的。该指令严厉地指出:

“如果某个传教士——但愿此事不会发生——没有按照我们的指令在两个月内把他们的教堂里或他管辖的

① “扬森主义”,“Jansenism”,十七世纪天主教反正统派神学家扬森(Cornelius Otto Jansen)创立的学说,主要根据扬森的著作《奥古斯丁书》发展而成,主张极端虔诚而严守教会法规,反对耶稣会主张的或然论;还主张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宗而属于公会议。后被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斥为异端,遭到禁绝。当时在法国、荷兰等地拥有甚多信徒。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87—88页。

屋子里的牌位和条幅拿掉的话,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努力把我们的准则带进当地习俗,现在即可撤销我们及任何其他宗座代牧和代理宗座代牧给他的权力,并且在上述指定时间里宣布。”^①

次年,颜珰又派两名传教士将文件和上书带往罗马。教宗将来文送圣职部审查。当时圣职部并不十分注意,直到1697年颜珰升任福建主教,圣职部才指定四位枢机主教组成审查委员会。1700年,教宗英诺森十二世去世,继任新教宗为克莱门十一世(Clement XI),他将此事交给四位神学专家认真讨论。他们是本笃会前总会长、现任罗马枢机艮布雷尔(John Marry Gabrielli),前任奥古斯丁隐修会总会长萨拉诺(Nicholas Serrano),前任加尔默隐修会总会长尼古拉(Philip of St. Nicholas),重振小兄弟会的总代表瓦列索(Charles Francis Veresio)。教廷圣职部为宗教裁判所演化而来,其职责在于保全天主教教义,该部认为凡有损教义的学说和举动,必予禁止,且宁可过严,不可失之过宽,因此中国祭祖祭孔的礼仪在他们看来是有损教义的。1704年11月20日,圣职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并作出决议,教宗当天即加批准,并决定议案各款在欧洲不许公布,全文交教宗派往中国的特使并由特使在中国与当地主教们商议后而定。该决议比颜珰的主张更为武断和严厉,其要点如下:

“一、西洋称呼天地为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语,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

●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1645—1941)” Edited by Ray R. Nou. pp.9—10. 这里的牌位指上面书有“敬天”、“神主”、“灵位”的字样。

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并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则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当取下，不许悬挂。

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等，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

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中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人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都是异端之事。再者，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神，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六、凡遇他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尚可使得。

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文指牌位之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做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中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①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决议案中批复，任何传教士必须无条件地遵

①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禁约》1932年版（一）。

守上述规定,否则按教会法处罚。^①

二 多罗出使清朝及康熙皇帝的回应

早在决议尚未公布的 1701 年 12 月 5 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举行御前大会时,便声明将派使节出使中国。当时教宗并没有说明派使的目的,但人们都知道这件事与执行对中国礼仪的决议有关。事实上,决议直到三年以后才作出。

教宗指定出使中国的特使为多罗蒙席(Msgr.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使节另加安底奥基亚(Patriarch of Antioch)宗主教衔。多罗于 1668 年 12 月生于意大利都灵,父为当地望族。多罗早年在耶稣会办的大学读书,晋铎以后在罗马各法院实习,后为教宗宫廷宫长钱启(Baldassarre Cenci)枢机的随员,参加教宗选举会,为新教宗克莱门十一世所赏识。在宣布多罗为特使以前,教宗曾召见他,告知将委以出使中国特使事。多罗向教宗坚辞,理由是其身体虚弱,不宜长途跋涉,并且对远东传教问题毫无所知。但教宗不许他推辞。1701 年 12 月 21 日,教宗亲自在圣彼得大教堂祝圣多罗为主教。^②

当时教廷已创设传信部,与葡萄牙政府经常发生有关传教事务的冲突。教宗克莱门十一世赞成传信部的主张,决定多罗不从里斯本出发,也不坐葡萄牙船。同时,教宗修书葡王彼得二世、西班牙王菲律甫五世、法王路易十四以及清朝康熙皇帝。多罗本人则于 1702 年 1 月 6 日致信葡王,通告出使一事。两个月以后,葡王复函教宗和多罗,对任命一事先未同他商量表示遗憾,但亦不

①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 24 页。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 94—96 页。

反对,并告以远东的葡萄牙官员按礼迎接特使。●

1702年7月2日,教宗颁上谕“*Speculatores Domus Israel*”,申明多罗为教廷出使中国、印度及附近各国的巡阅使,加上等特使衔(*Legatus a latere*),具有指挥和解决教务问题的全权。7月4日,使团从罗马出发赴热那亚,以后又至马赛,再到西班牙西维利亚(*Siviglia*)港。1703年2月,使团从西维利亚港启程,2月17日抵*Canarias*群岛中的*Tenerife*岛。三个月以后,换乘法王路易十四所派的两只大船,于11月6日抵达印度本地治里城。●

当时印度天主教会中也存在所谓“马拉巴礼仪问题”(Quaestio rituum Malabarensium)。印度天主教由沙勿略开创,但仅限葡属殖民地。印度在婆罗门种姓制度之下社会等级森严,因此天主教的传播很困难。1605年,耶稣会士诺比利(*Roberto de Nobili*)抵印度以后,倡导了一种与利玛窦相近的传教方式,即尽可能适应印度本地的社会与文化。他本人接受婆罗门的习惯和礼仪,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其他传教士及果阿主教并不同意,上告到教廷。1623年1月31日,教廷指令在没有正式决议之前,传教士可以通融,当地传教士争执更加激烈。多罗抵本地治里以后,于1704年7月4日签署公函,按教廷给予的指示,禁止迁就婆罗门的礼仪。这份布告引起当地教会人士极度不满,果阿总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the Annunciation*)在马达拉斯和本地治里的教堂里散发文告,宣布教廷特使的指令为无效。● 最后,教宗克莱门十一世于1707年1月1日颁布通谕,支持多罗,印度礼仪问题才告一段落。●

1704年7月14日,多罗从印度启程,9月20日抵马尼拉。12月29日,第一批使团前往中国,多罗则于次年3月抵澳门。4月5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96—98页。

●●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24—27页。

日,多罗进入广州。不久,多罗集会使团成员开会,决议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奏明康熙皇帝,并请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稣会院安多(Antoine Thomas)代奏,请朝廷确定觐见的日期。多罗在广州即表示出对于耶稣会的成见,他不愿听取耶稣会会士的意见,而选定一名遣使会会士毕天祥(Luigi Antonio Appiani)担任翻译和秘书,对他言听计从。^①

当时清朝方面临朝当政的是圣祖康熙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励精图治、睿智英武的帝王之一。康熙于1661年登基,1667年十四岁时亲政。两年以后与索喀图合作逮捕鳌拜。以后,他不顾多数朝臣的劝阻,撤销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军权,并平定了随之而来的三藩之乱。1684年又从郑氏手中夺回台湾。接着又在北方边境派军队清除了不断骚扰的俄国人,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1696年,他率军亲征蒙古,击败反叛的厄鲁特部。^②在内政方面,康熙帝躬自节俭,讲求实效,坚毅忍耐,勤于政事。他一直关注治理黄河的工程,勉力增加大运河的运输量。曾六次南巡(1684年,1689年,1699年,1703年,1705年,1707年),亲自视察水利工程,敦促官吏廉洁从政,并编定《圣谕广训直解》,以儒家的道德教诲人民。^③在康熙皇帝统治的前期,他对于耶稣会士传播的西学,采取了十分宽容和开明的态度。他尤其信任南怀仁,视其为“他信赖的密友”,希望“他(南氏)不离开身边”,“当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情绪立刻转过来了”。^④南怀仁以钦天监监副之职,治理历法,后加太常寺卿、通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官居二品,卒后赐“勤敏”,为惟一得谥号殊荣的教士。此外,康熙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06页。

②③ 恒慕义:《清代名人录·玄烨》见《清代西人见闻录》第289—295页。

④ 南怀仁:《鞑鞑旅行记》,《清代西人见闻录》第71—81页。

帝对于徐日昇、张诚等教士协助订立《尼布楚条约》的努力，亦十分赞赏。在此前后，一大批教士如闵明我、恩理格、徐日昇、安多、白晋、李明、张诚、刘应、洪若翰，踵至清廷任职，深蒙恩泽与重用。康熙皇帝本人经常向这些教士请教有关天文、数学、舆地、机械工程学方面的知识，也通过他们了解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政情风俗。法国传教士白晋曾著《康熙帝传》，书中高度评价了康熙帝对于西方文化的开明态度：

“皇帝以其特具的伟大胸襟非常热情地接待俄罗斯、荷兰、葡萄牙来朝使节。在这方面，皇帝的才智和习惯显然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中国人长期蔑视外国民族，认为不值得与任何外国民族交往；即使接待外国的使节，也无非把他们看做来朝贡的。……皇帝识见超人，早就看出了中国这种错误的偏见。长期以来耶稣会士介绍给皇帝的有关欧洲各国及世界其他各民族的知识，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精美艺术品，尤其是我们传授给他的艺术、科学知识，使他确信，文明的、擅长科学艺术的人才不仅仅中国才有。”^①

对天主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康熙皇帝有所闻。早在1700年11月30日，康熙皇帝即应耶稣会士的请求，作了关于祭祖祭孔只是爱敬先人和先师而不是宗教迷信的批示。黄伯禄撰《正教奉褒》一书，摘录耶稣会的申辩及康熙帝的批文如下：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阳历1700年11月30

① 白晋：《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1辑，第20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日)治理历法远臣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谨奏,为恭请睿鉴,以求训诲事。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祐、聪明、爵禄也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祐之义,惟尽忠孝之念而已。虽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效天之典礼,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智训诲。远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本日奉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

耶稣会士将其申辩及康熙帝的批示,派人分别从四条不同的路线,分送罗马。

当多罗离广州北上之时,康熙皇帝正在热河行宫。耶稣会士闵明我、徐日昇等联名上奏,报告此事。1705年7月20日,康熙批示准多罗入京觐见,并命沿途官员,如礼迎接。当时多罗在广州动身时忽患风湿,半身不遂。康熙帝得此消息以后,颇为惦念,特派亲王到山东临清迎候,谕令换由陆路进京。12月4日,多罗入京师,居住在北堂。康熙特派内大臣到北堂问候,颁赐珍馐。事实上,康熙对于多罗来华的使命,心中存在怀疑,在礼节上照顾周到

●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317页。

的同时,也留心观察。这时,使团中一随员外科医生悉哥底(Sigotti)忽然患疾病,于12月12日去世。康熙钦赐葬地,同时乘机派人观察特使团员的殡礼,是否与耶稣会所习者相同。据报,殡葬不合中国礼仪,也不合耶稣会惯用的礼仪,康熙帝便起了疑心。●

1705年12月31日,康熙皇帝第一次召见多罗,当时多罗生病,康熙帝特差官到北堂用肩舆迎入皇宫。入畅春园以后,在殿前下舆。多罗由两随员扶近御座行礼,康熙见其如此病态,命免跪拜,并赐座。康熙帝感谢教宗遣使问安的盛意。多罗请求任命一们教务总管,康熙帝则属意耶稣会士,这是多罗决不愿意的。康熙帝命特使指定一员,携带清朝的礼物,前往罗马答聘。●在整个觐见的过程中,康熙帝十分和蔼,款待也很周到。四天以后,康熙召多罗前往狩猎,多罗因病派团员一人代行。中国新年元宵节时,康熙招多罗往城外御花园观灯及看烟火。

1706年3月中旬,多罗从马尼拉方面得到消息,得知教廷已经在上年11月20日作出禁止中国礼仪的决议,多罗于是禁止中国各修会传教士再加讨论。当时,北京的天主教教徒曾派代表面见多罗,陈递请愿书。多罗的秘书毕天祥居然当面扯碎他们的请愿书,并加以严词责骂,激起了教徒及耶稣会士的愤怒。从此,多罗不再接见北京的教徒。3月21日,京城外一百余名教徒面见多罗,其中有五名教徒高举请愿书,多罗疑是耶稣会士的指使,竟将请愿书掷于地上。毕天祥还大骂教徒,并禁止他们再进多罗寓所。●

康熙皇帝本人对于多罗的秘书毕天祥甚不信任,因毕氏以前在四川曾被四川地方官驱逐过。同时,康熙皇帝想选几名教士携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0—111页。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6—117页。

带礼物报聘教宗,命白晋为正使、沙国安(Mariani)为副使。多罗因白晋为耶稣会士,必欲沙国安于白晋之上。康熙帝此时已极为不快,6月22日御批曰:“览多罗奏,朕知道了,无用再谕。但白晋已与沙国安不和,叫回白晋如何?”^①两天以后即6月24日,康熙帝再次下一道御批,严正表明了朝廷的立场:

“前日曾有上谕,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今闻多罗言,我未必等到皇上回来的话,朕甚怜悯,所以将欲下之旨晓谕。朕所欲言者,近日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者,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谕,命后来之人谨守法度,不能稍违方好。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的人,许他内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居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况且多事。更有做生意,做买卖,此等人亦不可以留住。凡各国各会皆以敬天主者,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争竞矣。为此晓谕。”^②

6月29日,康熙帝第二次接见多罗,礼仪不如上次隆重,态度亦不如上次和蔼。康熙帝谈话中屡次追问多罗的使命,多罗避重就轻,答以问候皇上。康熙让多罗呈报教宗,不可更改中国礼仪,况且这些礼仪并不反对天主教教义。次日,康熙邀多罗游览畅春园,又一次要多罗转告教宗,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孟之道,西洋人自利玛窦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322页。

②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二)无页码,1932年版。

来华以后，一直奉公守法。将来有人反对祭祖祭孔，西洋人就很难再居留中国。多罗不敢正面回答，只说有一通晓中国事务的颜珰主教，即将来京。

7月22日，康熙皇帝命颜珰前往热河行宫觐见。事实上，颜珰对中国文化毫无了解，但既然皇帝召见，不得已前往。随行者有毕天祥、耶稣会士安多、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等。康熙帝此前早已对颜珰有所反感，因为他已阅览过颜珰所写的半文不白的书籍，并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六月初四日作如下批示：

“……由此观之，半半落落，无头没尾，止以其略知之非事与天主教比较而已，何无一言赞扬五伦之义为是耶？此人心浅窄，即如我此处拟定诉状之人，只以能定罪得胜，为其大乐，亦不论是非。此辈之小气之处，书之未穷。总之见之，也许知之矣。”^①

正因为此，当8月初颜珰在热河觐见康熙时，皇帝问他御座后匾上“敬天法祖”四字为何，颜珰只认得一“天”字。在此之前，康熙已谕示多罗，觐见时皇帝将不问中国礼仪是否可行，因为此事应由教宗最后定断。皇帝只问颜珰如何解释中国经书上的文句。然而颜珰竟不识字。^②8月2日，康熙帝批示，指斥颜珰：“愚不识字，妄论中国之道”。次日又下谕曰：

①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2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6—117页。

颜瑫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些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①

1706年8月13日(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十日),康熙帝作了一个重要的谕批,指责了多罗掩盖出使使命真相,在中国教会中拨弄是非,制造混乱,并申明皇帝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西洋人拥有管辖之权,并命地方官吏查问来自西洋的教士:

“朕以尔为教化王所遣之人,来自远方,体恤优待。尔于朕前屡次奏称并无他事,而今频频首告他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随意偏袒,以此观之,甚为卑贱无理。尔自称教化王所遣之臣,又无教化王表文。或系教化王所遣,抑或冒充。相隔数万里,虚实亦难断。今白晋、沙国安将赏物全行带回。嗣后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方准入境耳。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再者,尔若自谓不偏不倚,先后奏言毫无违悖,则敢起誓于天主之前乎?朕所颁谕旨,及尔所奏行诸事,尔虽隐匿不告知教化王,然朕务使此处西洋人,赍书尔西洋各国,详加晓谕……我等本以为教化王谅能调和统辖尔等教徒,原来不能管理。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

^①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323—324页。

则我等管束何难之有。”^①

数天以后,多罗请求离京。康熙对他既生厌恶,立即照准。8月20日,多罗离开北京南下,12月17日抵南京。同时,康熙下令驱逐颜珞出境,并将毕天祥遣送四川,令地方官就地拘禁。并命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领票,申明遵守利玛窦规矩。黄伯禄撰《正教奉褒》记曰:

“康熙四十五年冬,驻京西士齐趋内殿。上面谕云:‘朕念你们,欲给尔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遂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给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兼满汉字。将千字文编成号数,挨次存记。将票书成款式进呈。’钦此!”^②

1707年1月25日,多罗在南京向在华的传教士发表公函,宣布罗马教廷已经决定禁止祭祖祭孔的礼仪,公函指出:

为了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决定建议、公布和建立一个明确的法规,以便使大家将来共同遵守。我们作为全权代表,有很高的权威,我们有权建议、制订、命令、要求所有传教士执行,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各修会的传教士

①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324页。

们,甚至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都要遵循以下要求,来回答我们已经被问到的,或者正要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他们被问到有关中国传统教导、法律、礼仪、一般习俗,他们是否同意这些东西,或者答允不攻击它们,不在口头上或以书面反对它们时,他们都必须答复如下:如果它们是和基督教法律相容的,或者可以与之合法及恰如其分地相符的,答复是可以的,否则不行。

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神律中是否有与中国传统的教导的不同之处,他们必须回答:有许多不同。当要求他们举例说明时,他们可以尽他们所能想到的,阐明算命、祭天、祭地、祭太阳、祭月亮、祭其他星宿和神灵等视之为人文学科和艺术的发明者的意义。基督徒只能祭万物的创造者天主,他们从天主那里得到祸或福。

当他们被问到敬祭孔子和祖宗的焦点问题时,他们应该作如下回答:不行。我们不能奉献这样的祭品。我们不允许听从神律的人们祭孔和祭祖。

同样地,关于中国人习惯使用牌位以尊敬死去的祖宗,回答是:不行。

当他们被问到“上帝”或者“天”是否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天主时,回答:不是。

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想时,他们应回答:因为这些事情和对真天主的真崇拜不相容,因为这个决定是圣座作出的,而在信仰领域内,圣座是基督徒的没有谬误的导师。

当被问到圣座决定是哪一天作出的时,他们可以说:众所周知,这个决定是1704年11月20日发出的。

然后,当问到“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决定的?”时,他们

可以回答：我们是从我们的上级，即安底奥基亚的宗主教所陈述的声明中得知的。根据他的职权，他亲自传达教宗的指示，我们一定得相信他。

我们就这样告诫并命令你们遵守。

本人不才，但蒙教宗给予宗座权力及全权代表之权力来处理问题。我们要求每一位主教，宗座代牧，各地的正权主教，传教士和司铎，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修会司铎——甚至耶稣会的——现在中国的传教士，以及将要来此地的传教士都有服从的义务。否则就遭自动绝罚的处分，除在临死前的情况外，只有教宗和我们保留其赦免权，任何人不能借口教宗们给予的特权而逃避这种绝罚，即使耶稣会的神父们也如此。必要时，由于我们为此目的而享有的特别权力，有权吊销或撤销任何与之相违背的特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回避此教令或者对它另作解释，比如说：求助于教宗亚历山大七世 1656 年发出的教令，或者借口会引起某种重大的危险。

根据罗马的特许，教廷把解释、宣布宗座宪章之权委托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声明，不管亚历山大教宗的教令如何说的，或者不管会引起任何严重危险，所有愿意留在中国传教区或者进入该传教区的人，必须以此教令为准来布道和回答问题，否则就会受到上述的自动绝罚。●

这时，康熙帝正作最后一次南巡，在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临清等地，均曾接见教士。一些耶稣会士自愿领票，永居中国，遵守利玛窦成规。另一些传教士如巴黎外方传教士的赫宣（Pierre

●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 8—10 页。

Herve)和多罗使团成员施体仁(Francesco San Giorgio di Biandrate)等拒绝领票,康熙命地方官一律将他们押往广州居住。1707年4月19日,康熙在苏州向西洋教士发布谕旨曰:

“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教化王若说你们有罪,必定教你们回去,朕带信与他说,徐日昇等在中国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回去,朕断不肯将他们活打发回去,将西洋人头割回去。朕如此带信去,万一尔教化王再说,尔等得罪天主,杀了罢。朕就将中国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来,尽行将头带回西洋去。设是如此,你们教化王也就成个教化王了。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①

1707年3月19日,多罗离开南京,5月24日抵广州。康熙帝派两名官员赴广州,命多罗出示教宗派遣他来华的委任状,多罗抗拒不交,结果被押解澳门。以后,康熙帝又叫回白晋和沙国安,并将赠送教宗的礼品收归国库。至此,康熙帝与多罗完全决裂。

6月29日,多罗被押抵澳门,居方济各会院。澳门的葡萄牙总督 de Pinho Texeira 立即派士兵看守多罗的寓所。同时,总督发

^①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四)1932年版。

表一文告,要求多罗在果阿总主教区未有新的命令之前,在澳门不得行使任何职权,澳门主教加匝(John de Casal)也在文告上签字。7月10日,多罗拒绝了这些要求。当时葡萄牙政府认为,多罗未经葡王同意,在葡萄牙属地行使职权,是为非法。澳门主教则怀疑多罗出使的真伪,要求将其委任状,交葡王的文书大臣验证。但多罗均置之不理,于是葡总督一直将其软禁。^①

教廷得知此消息以后,一方面向葡政府提出抗议,另一方面,教宗克莱门十一世于1707年8月1日,册封多罗为枢机主教,传信部同时派马国贤(Matteo Ripa)、德理格(Pedrin)、山遥瞻(Bonjour)、庞克修(Cerw)、任掌晨(Amodei)和潘如(Perroni)等六教士将枢机的小红帽送往澳门。1710年1月6日深夜,他们在澳门呈多罗以枢机小红帽及册封诏书。1月17日,多罗在其寓所举行正式的接受红帽礼。4月25日,多罗病势加重,卧床不起,6月8日,终于去世,^②年41岁。

三 嘉乐使华及1742年《自上主圣意》通谕

1715年3月19日,罗马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颁布一重要的通谕《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该通谕确认了1704年11月颁布的有关禁止祭祖祭孔典礼的禁令;同时,也再度重申了1707年1月多罗发布的公函所严格规定的禁令。在《自登基之日》中,教宗以极为严厉的口气武断指出:

“这些谕令足以根除敌人在田野里播下的莠草。
……(然而)我很遗憾地听说,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回

①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6—128页。

避,至少是长期拖延本教宗如此坚定规定的答复。这对宗座的权威是严重的损害,对信徒也是坏表样,并有损于拯救灵魂的工作。……为了完成传教的职责,天主委托本教宗必须完全清除和结束这些困难、迟疑、逃避和借口,以使我们为信徒的灵魂拯救工作带来安宁。因此,在枢机们和本教宗的倡导之下,在了解确切情况和经过成熟考虑之后,运用本教宗完全的宗座权力,公布了现在的宪章。凭藉着神圣的服从,本教宗命令以前公布的每一项答复,以及其中包括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准确地、完全地、无可逃避地和坚定地加以执行和遵守。”^①

在该通谕中,教宗还要求传教士宣誓服从,不得违背。1716年8月,《自登基之日》文件送到广州,由驻广州的传信部办事处秘密送往全国各省。11月,在北京公布,激起康熙极大的反感和愤怒。

虽然诏书公布以后,中国的传教士们都宣誓服从,但是一般教徒并不完全遵行。有不少士大夫因禁止祭孔而无法参加科举考试,自动离开了教会;有些教徒无法不去祠堂敬拜祖宗,也不愿意再进教堂了。1719年10月7日,北京主教伊大仁在致传信部的信中指出:

“这边的传教情形很衰败,一切的事,都悬于一条线上(看将来教廷特使是否可准敬孔敬祖),同时又常受各方打击,也因为许多人是自己的教友,希望圣座允许中国礼节。将来真真告诉他们一切都禁止了,他们必定不愿放弃这礼节。因此,许多地方的教友已像裂教人了。本教区的耶稣会士至今仍旧不执行圣事。去年,1718年,

①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48—50页。

我因他们视察员纪理安不断地要求,已经让他们写出实际的办法。他们仍旧不行圣事,只有几个在教友临终时,才给临终教友行圣事,行圣事前又不问教友违背了禁令与否,而且根本不提教宗的禁令。”^①

传信部为处理中国礼仪问题的善后事宜,于1719年向教宗建议派遣新的使节前往中国。教宗克莱门十一世于1719年9月18日的秘密御前会议中,决定派嘉乐(Carlo Mezzabarba)为出使中国及附近国家的特使,并加亚历山大宗主教衔。

嘉乐为意大利北方巴委亚(Pavia)人,生于1682年。早年晋司铎,攻读法律,曾考取民律、教律两科博士。任宗座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后升教宗国内多提(Todi)和撒皮纳(Sabina)两省省长,接受出使中国特使委任时,年仅37岁。此次在嘉乐出使中国之前,教宗曾致信葡萄牙王通报此事,并允许特使由里斯本起程,搭乘葡船去澳门。葡王复信答应将待之以礼,并提供旅费。^②

出使中国的使团阵容庞大,有无会籍神父7人,修会会士13人,教徒7人,其余还有侍役、厨子。他们都有一技之长,被选到中国皇帝的宫廷当听差。同时,嘉乐先派遣费理簿(Philippus Maria Cesati)、何济各(Onorato Mana Ferrari)二人,先期来华,携带教宗致康熙手书。^③

1720年3月25日,嘉乐由里斯本起程,直至9月22日已遥见中国大陆。26日进澳门,受到澳门当局的欢迎。10月7日,由水路前往广州。当时,两广总督府派员询问嘉乐:(1)特使来华的使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41页。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44页。

③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328页。

命是什么？(2)康熙帝派往罗马的四个西洋教士为何不见回来？(3)嘉乐特使是否另有使命？嘉乐答称：(1)来华使命为向皇上问安，并携有教化王致皇上信一封；(2)皇上所派遣的西洋教士，三个去世，艾若瑟因病不克前来；(3)特使携有教化王礼物献呈皇上，并请求皇上开恩，保护天主教。

12月25日，嘉乐抵北京城外窦店。康熙帝再次派员询问嘉乐来华使命。嘉乐答曰：“远臣嘉乐，实是教王所使。教王使臣请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两件事：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中国人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

12月26日，康熙帝派伊都立等四位官员，向嘉乐传旨：

“尔教王所求二事，朕俱俯赐允准。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此即准尔教王所求二事。此旨既传，尔亦不可再行乞恩续奏。尔若无此事，明日即着尔陛见。因有此更端，故着尔在拱极城且住。再严瑄原系起事端之人，尔怎不带他同来？钦此。”^①

康熙的批示显示出他十分愤怒，因为嘉乐对他来华使命的描绘前后不符。在广州时，嘉乐说是向皇上请安，现在却要求实行教化王

①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45—47页，（台）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

的禁约。12月27日,康熙再传谕旨:“朕之旨意,前后无二。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教王表章,朕亦不览。西洋人在中国行不得教,朕必严行禁止。本应命尔入京陛见,因道理不合,又生事端,尔于此即回去。明日着在京众西洋人于拱极城送尔。”^①从此谕旨可知,康熙已准备下逐客令了。

嘉乐见事紧急,恳求来官代奏,希望皇帝降恩准许将教宗的文件翻译出来进呈御览,有合中国道理者请准予执行,不合者即禁止。同时,嘉乐拟定了八项有关礼仪问题的八项妥协办法,史称“八项准许”或“八项特准”:

“一、准许教徒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妣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应是非宗教性的社会礼节。

三、准许非宗教性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

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菓蔬。但应申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

七、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

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菓蔬。但应声明不从流俗迷信。”^②

①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45—47页,(台)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

②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57页。

康熙获知这八项通融办法以后，态度稍微缓和。12月30日，遣伊都立、赵昌、李国屏、李秉忠等官员通知嘉乐，准备觐见。

1720年12月31日，康熙帝第一次接见嘉乐特使，并赐宴。“上亲赐酒一爵，问嘉乐云，朕览尔西洋图画内有生羽翼之人，是何道理？嘉乐奏云：此系寓意天神灵迅，如有羽翼，非真有羽翼之人。上随谕中国人不解西洋字义，故不便辨尔西洋事理。尔西洋人不解字义，如何妄论中国道理是非？朕问即此意也。”^①当时天气寒冷，康熙见嘉乐衣服单薄，赐嘉乐貂褂一封，随行西洋人各赐酒一爵。

1721年1月3日，嘉乐进宫进呈教宗赠送康熙帝的礼物，康熙遣官员赐嘉乐鼻烟壶、火镰包各一，珫琅碗四口，葫芦瓶一只。后又赐嘉乐貂冠一顶，青袍一件，里衣两件，靴袜全份。

1月10日，嘉乐前往宫内清溪书屋第三次觐见康熙帝。康熙帝面谕嘉乐：“尔当于随尔来人中，出二人回西洋去，传谕朕恩。朕旨意无多语；（一）教王遣尔来谢恩，朕深嘉念；（二）教王遣尔来请安，朕躬康健，尔等目所睹；（三）教王所贡方物，朕念远人胥服之情，俯赐存留。只此三事当写出。与尔以便，尔译西洋字寄去。”

1月14日，康熙又在宫中召见嘉乐及随员。当时有德理格和马国贤任翻译，又有四位耶稣会士李若瑟、白晋、穆敬远、冯秉正任助译。全体在京教士亦出席，嘱“直言无隐”，又说：“朕今日旨意语言必重”，又谕：

“尔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即如利玛窦以来，在中国传教，有何不合尔教之处？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如有悖尔教之处，尔当带回

①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嘉乐来朝日记》，（影印本）无页数。

西洋，照教律处分”。

针对嘉乐所说“供牌上称天为上帝不合教处”，康熙指出：

“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说。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皇上。”

1月17日，康熙阅览了教宗禁约的译本，十分愤懑，朱批曰：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可如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

次日，赵昌等奉旨，捧康熙的朱笔批示给嘉乐看。御前太监陈福又传旨：“朕前日已有旨意辩论道理，语言必重，以后也不令尔陛见。尔有回奏，可写字奏，朕先前亦曾面谕，尔当执定主见，不可动摇。尔今如此偏信坏事小人之言，欲传此悖理之条约，中国断使不得。”^②同日，德里格、马国贤二人被捕。

1月19日，伊都立、赵昌等押德里格与马国贤，会同耶稣会士，传示康熙帝看了教宗禁约和嘉乐所拟八项准许以后的批示：

“朕理事最久，事之是非真假，可以明白。此教条都是严当当日在御前，数次讲过使不得的话。他本人不识

^{①②}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嘉乐来朝日记”》（影印本）。

中国五十个字,轻重不晓、辞穷理屈,敢怒而不敢言,恐在中国致于死罪,不别而逃回西洋,搬弄是非,惑乱众心,乃天主教之大罪,中国之反叛。览此几句,全是严瑯当日奏的事,并无一字有差。”

同时,康熙又命伊都立、赵昌口传旨意给嘉乐:

“尔教王条约内,指中国敬天拜孔子诸事有异端之意。尔不通中国文理,不知佛经道藏之言。即如尔名嘉乐,乃阿旋里,喇嘛之言。先来之多罗,系佛经多罗摩诃萨内之言。称天主为造物之主,乃道藏内诸真诰之语。朕无书不览,所以能辨别。尔等西洋人一字不识,一句不通,开口非佛经即道藏小教之言,如何倒指孔子道理为异端?殊属悖理。”

又说:

“在中国之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者,惟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亦尚未通。既是天主教不许流入异端,白晋谈中国书,即是异端,即为反教。尔系教王使臣着尔来中国办事,尔即当将白晋拿到天主堂,聚集鄂罗斯国人并京中大小人等,同看着偏信之德理格和马国贤动手,将白晋烧死,明正其反教之罪。再天主堂内,因当人旧西洋人汤若望曾在先帝时效力,因曾赐匾额,朕亦赐有匾额。既是与尔教不合,尔亦当将额毁坏,方为办事。”●

●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嘉乐来朝日记”》(影印本),无页码。

康熙帝出此谕旨，言语讥讽，用词颠倒，但亦可见其心中的愤懑。

此后康熙帝仍接见嘉乐八次，每次都重申自己的立场。其间，嘉乐曾请求皇上准允在北京购地建堂，被康熙婉拒。康熙请嘉乐转达对教宗的问候，并说他本人不写信给教宗了，一切均由嘉乐转达。同时将赠送教宗及葡萄牙王的礼物也交嘉乐带回。在1721年2月20日的召见中，康熙帝出示了《嘉乐来朝日记》，请他转呈教宗。该日记上有苏霖、郎世宁、穆敬远、戴进贤、严加乐、倪天爵、巴多明、冯秉正、费隐、马国贤、莫大成、雷孝思、罗怀忠、张安多等18人的签名。为防止教宗偏听偏信，康熙还敦请另一名耶稣会士Giamprimo携带《嘉乐来朝日记》于3月13日离开北京，由莫斯科赴罗马。●

2月26日，嘉乐进宫至太和殿，观看皇上所赐的礼物。27日，进宫接受新的赐品。此两次康熙帝均未出见。3月1日，康熙帝盛仪接见特使，准他动身前往罗马。3月3日，嘉乐离开北京动身南下，5月23日抵澳门。

1721年11月4日，嘉乐向全国主教和神圣人员发布了一份牧函，它详细地谈到了“八项准许”，并要求传教士们摒除成见，精诚团结，服从教宗的旨意。该函最后指出：

“八项特准只有必须和有用的时候，才能谨慎地让人获知。无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以口头或书写的方式透露这份文件。无人可以将这份信函译成中文或其他东方语言文字。如果违反此项禁令将受绝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66—167页。

罚。”●

12月9日,嘉乐离开澳门返回欧洲,并将多罗的灵柩运往罗马。嘉乐回到欧洲以后,升为枢机主教,于1741年去世。

嘉乐离京以后,中国各省传教士的态度仍不能一致。本来反对祭祖祭孔的传教士,也反对嘉乐的“八项准许”。至于耶稣会士,他们不但接受“八项准许”,而且予以广义的解释。罗马教廷的态度先后也不一贯。

1730年8月6日,山西和陕西的代牧主教 Francesco Saraceni da Conca 向本教区信徒发出告示,一概禁止供奉祖宗牌位。传信部接到报告以后表示谴责,并敦促他收回成命。●

1733年7月6日及12月23日,北京方济各主教(Francisco da Purificao)为统一教区内的礼制,两次发出告示,要求信徒遵守嘉乐的“八项准许”。1736年9月26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发布一简函,申明方济各主教的两份告示为完全无效。同时,教宗下令圣职部调查嘉乐“八项特准”的由来及性质。最后,1742年7月5日,教宗本笃十四世发布了著名的《自上主圣意》(Exquo Singulari)通谕。该通谕重申了《自登基之日》通谕的全部内容,废除了嘉乐的“八项准许”,宣布禁止祭祖祭孔的一切活动,并令所有在华及来华传教的各修会教士,宣誓遵守教宗的禁令,并严格禁止教内人士讨论礼仪问题。该通谕的最后部分武断而又严厉地指出:

“禁令针对所有的传教士,包括本地司铎和任何修会、团体、机构,包括耶稣会的司铎。如果他们在履行其

●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58页。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71页。

神职和司铎权力时迟缓不决,那将受到失去神权的处罚。这种处罚将自动发生,无须申明。最后,只有本教宗和将来的教宗才有赦免的权力。此外,只有临死的人才能被赦免。除此以外,修会司铎如有违反,将被剥夺主动和被动的发言权。……

天主禁止任何修会、组织、机构甚至是耶稣会的传教士拒绝服从本教宗的在宪章中准确地、完整地、绝对地、无可回避地和严格地规定的内容。如果有任何人拒绝,本教宗将以服从神圣的名义命令他的省会长和总会长,毫不迟疑地将这些顽固、罪恶和反叛的人们逐出传教区。他们的神长应该立即将他们召回欧洲,并向我们作出报告,以便我们根据他所犯罪恶的严重性加以惩罚。”^①

自此,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终于告一段落。反对祭祖祭孔的主张在中国天主教会之内完全占了上风。从原因上来分析,罗马教廷在此问题上保守僵化的态度与欧洲当时的政治和宗教情势有关。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压力;作为回应,天主教会于1545年至1563年召开了重要的脱里腾大公会议,此次会议固然对天主教会的种种弊端作出改革,另一方面在礼仪及教规上也作了巩固和调整,严肃纲纪,重申教宗的权威,并使用宗教法庭的力量巩固教会的权力,铲除“异端”。教廷圣职部本来即从宗教裁判所演化而来,所以在教义教规审查方面力求从严,不能容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所作出的妥协和解释,欧洲的“扬森主义”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终于导致“中国礼仪”的禁止。中国天主教历史学

①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61页。

家方豪从另一方面指出：耶稣会与方济各会、多明我会本来即有神学上的分歧，而且在中国不同地区传教。耶稣会士主要在各省会城市及京师与士大夫及官吏周旋，士大夫比较理性，所行的礼仪迷信色彩较少；而方济各和多明我会主要在福建一带下层民众中从事传道工作，那一带民间宗教盛行，他们的礼仪中很自然地带有迷信的成分，由此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时，罗马教廷开始时依靠葡、西两国保教权推动传教的发展，后来觉得保教权过于干涉教会事务而创宗座代牧制以图摆脱葡、西两国的控制，又造成了葡、西两国支持本国教士以推行其殖民势力，教廷的首尾两端及葡西两国的插手干涉使“礼仪之争”的局面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原本对天主教颇具好感的康熙皇帝下决心驱逐教宗的使节并产生了禁止天主教的意念。

四 雍正帝禁止天主教

1722年底，康熙帝突然患病，在畅春园卧床不起。12月16日，皇四子胤禛前往天坛代皇上冬祭。12月20日，康熙晏驾，官方文件宣告胤禛继位，是为清朝入关以后第三代皇帝雍正。^①

雍正帝对于天主教传教士有着特殊的厌恶与仇视。

现在一般研究清史者，大都认为雍正并非康熙帝本人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原来，康熙共有子35人，并立皇二子胤礽为太子，后因胤礽行为常逾宫制，终被废黜，自此以后不再立太子。康熙在位日久，皇子们长大成人，且受良好的教育，又因康熙帝亲近那些耶稣会传教士，常指派他们为皇子们的师友。康熙晚年不立皇储，年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胤禛》，《清代西人见闻录》第300—3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长且有才能的皇子们当然免不了各怀继位的图谋。^①。他们所亲近的耶稣会士们,也有参与或知悉其图谋者。例如皇九子胤禔的拥护者即有一名热衷参与图谋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穆敬远(Joannes Nourao)。据事发以后株连的情形看,雍正对穆敬远的忌恨在于他教授胤禔习西洋字(拉丁文),认为其间必有不可告人之事,同时雍正获知他俩在西宁的住所之间有墙洞以俾往来。最后穆敬远被押回西宁,有人在饭食中投毒致其死命。^②此外,宗室中支持胤禔的还有与天主教会非常接近的苏奴及其众子。苏奴是雍正帝的堂兄弟,曾任纂修玉牒的总裁官,职衔是“辅国公都统”。苏奴有子11人,其中信天主教者凡9人,苏奴之妻临终前领洗,他本人未及领洗便谢世了。雍正帝即位以后,苏奴全家获罪,被抄家流放,几至灭门。^③雍正因忌恨与天主教会接近的胤禔及苏奴父子,而萌生禁教之念,这是十分自然的。

1723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上疏,奏陈西洋人在各省建造天主堂,潜住传教,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都效力以外,余均遣送澳门。1724年7月11日,雍正帝批准礼部发布禁教令通谕各省:着国人信教者应弃教,否则处刑罚。各省西教士除供奉北京宫廷以外,限半年内离境,前往澳门。当时各省西教士共有五十余名,其20人留居北京,30位赴广州再往澳门的传教士中有16人逃往。^④全国当时共有教徒30万人,有人背教,也有人坚持信仰;教堂有300个,均被没收,改为谷仓、关帝庙、天后宫、公廨或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胤禔》,《清代西人见闻录》第300—3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58页。

③ 甲凯:《清初宗室与天主教会的关系》,载《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01页,(台)辅仁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④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54页,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

书院。当时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对中国天主教会遭查禁的情景十分悲观失望,他这样写道:“我来中国只有几个月,当我看到传教工作不久前还充满希望,竟然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教堂已成废墟,传教士被驱逐并集中到广州——中国惟一开放的口岸,不许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几乎遭到禁绝。”^①

当雍正帝刚继位之时,罗马教宗并不知道新皇帝对天主教会的态度。雍正刚继位后,即颁布大赦,释放教士德理格。同年北京地震,雍正帝同意建修北京西堂。于是德理格向教廷写信,报告雍正帝对教会怀有善心。当时在位的教宗为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II),他于1724年派使节来中国,向雍正帝报聘。^②教宗的两名使节都是圣衣会士,一名葛达都(Gotthard Plaskowitz de St. Maria),一名易得丰(Ildefonso de Nativitate),他们于当年十月中旬离开罗马,于次年(1725年)7月24日抵达广州,两广总督孔毓珣立即向雍正帝作了报告,并准二位使节进京觐见雍正。10月22日,葛达都、易得丰抵北京,呈上教宗的国书及礼物。^③教宗在第一封国书中盛赞了先帝康熙对于传教士的眷顾,并对雍正帝的登基表示了祝贺,同时通报了教宗本笃十三世继位的情况。在第二封国书中,教宗请求雍正帝释放计有纲(Antonius Guignes)、毕天祥(Appiani)两位教士。在第三封国书中,教宗感谢雍正帝释放了德理格,并请求雍正帝照顾在华的天主教士。^④雍正得到国书以后,立即释放在押广州的毕天祥、计有纲二位教士,并于11月7日接见了教宗的使臣,并命其即日返回西洋。次年1月,两使节乘船回到了印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帝对天主教的反感日益表露无遗。

① C. A. Allen: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pp. 168, Shanghai, no date.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68—169页。

③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8—39页。

④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8—48页。

1727年7月21日,雍正召见苏霖、费隐、戴进贤、雷孝思、巴多明、宋君荣、朗世宁等教士时说:“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任用西藏喇嘛,这两名君主因此受到中国人的憎恶,先皇让尔等在各地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满洲人,曾极力反对。”[●]在另一个场合,雍正帝则向巴多明、冯秉正等西教士进一步直言道:“……既然你们有办法欺骗我的父亲,你们休想欺骗我。你们想把中国人变成教徒,这是你们道理所要求的。但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岂不很快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教友只认识你们,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现在虽然不必顾虑及此,但等到万千战舰来我海岸之时,则祸患就大了。”[●]这种直率的语言,比诏书中崇正学、黜异端的体面话,更能表现出秉政者对天主教会的忧患和担心。

从1724年雍正帝下令禁教到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弛禁天主教为止,其间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天主教一直处于被查禁的地位。然而,由澳门及其他口岸潜入内地的传教士,以及在各省山藏林窜的教徒,宵聚昼散,绵绵不绝。同时,川楚白莲教和华北天理教蓬然而起,“官军剿捕降斩,以千万计,户部传输,至于万万。”天主教也被官府目为与白莲教和天理教、天地会一样的会党。1769年(乾隆四十三年),福建兴化府的布告曰:“为此示仰府属军民人等知悉:凡误从无极教、罗教、天主、白莲、无违(为)、回回等教者,俱著即速自行出首,将所传经典,作速缴官,以凭汇集销毁、本人亦免治罪。倘尚不悛改,……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官府派出的兵丁和巡捕、暗探及伪装的教徒,四处查访

● 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145页。

● L. W. Allen: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pp. 262—265. Shanghai, no date.

●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986—987页。

和捕抓从教者。尽管如此,官府文件依然记载:“民人陷溺蛊惑于天主一教,既深且久,自查拿以后,稍知敬惧,然革面未能革心,节次密访各村从教之家,……不祀祖先,不拜神佛,仍复如故。民间坚心信奉天主教之锢习,始终不能尽除。”^① 不过,在官府的查禁之下,再加上教会本身由于“礼仪之争”等等因素,天主教会毕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到 1793 年,一位在北京的神父对英国使节马戈尔尼(Lord. Macartney)说:教徒人数锐减,北方只剩了 5000 人,全国只有 15 万人。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从 1707 年的 107 位降至 1810 年的 31 位。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曾如此描绘西教士来中国以后的情形:“其初至中国海口也,则深藏舱内,不敢露面。至夜深人静,则改入教友之小船。黎明,开船入河,仍深藏舱内,往往数月不敢出。夏日溽暑,蒸热难堪。及过关卡,则扮作病夫,蒙头盖脑,僵卧不起。昼则隐伏,夜则巡行。所遇艰险,多为后人所不知,无从记载。”^②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 986—987 页。

②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 272—273 页,上海书店 1990 年版。

第四章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

一 法国在华的保教权

自19世纪上叶以来,中西关系发生了急骤的变化。1840—1842年,英国发动了对清朝的鸦片战争,战败的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对外通商。法国和美国接踵而来,在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中,它们获得了与英国几乎相等的特权。与继起的英法相比,原先拥有远东保教权的葡萄牙已经国势衰微。到1857年2月,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禁教令使天主教无法获得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葡萄牙的海上霸权已为英法所夺,且国内又多政变,无暇顾外,葡政府遂与教廷订立政教公约,放弃它在华的保教权,只留澳门教区由葡国管辖。^①

当时清朝已经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正在进行之中。英、美、法等西方列强一再运用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并

①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303页,台中版;谭永亮著:《天主教来华成立圣统及建立外交的经过》第20页,《鼎》第54期,1989年。1857年2月21日,葡萄牙和教廷订立政教公约,规定广西和香港不再受澳门主教管理,葡萄牙在中国的保教权,只留于广东和海南岛,其余所谓南京和北京两教区,都不包括在内。实际上,在签约以后,广东和海南岛并未划入澳门教区,仍属于以前的两广监牧区。因此,葡萄牙在中国的保教权已事实上废除了。

在这些条约中加入了传教的权利。由此,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事业,获得了条约的肯定和保护。法国进而据此声称取代葡萄牙获得在华的保教权。

最早在不平等条约中写明传教内容的是 1844 年 7 月由美国外交使团团长顾盛和清两广总督钦差大臣耆英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该约第十七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或殡葬之处……。”^①毫无疑问,这样的条款是出自美国外交使团中传教士们的建议。^②

中国与英、美相继订约的消息传到法国以后,在法国国内工商界和政界的推动之下,1843 年 11 月,法国也向中国派出了以拉蓴尼为首的外交使团。次年 8 月,使团在澳门登岸。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兼港督德庇时转交给拉蓴尼有关中英订约的全部外交文献;正准备回国的美国使团团长顾盛也向拉蓴尼讲述了与耆英会谈的情形,并赠送《望厦条约》的副本。拉蓴尼在给法国总理基佐的报告中说:

“今天我们不但要把在巴黎我动身以前了解到的英国取得的让步和各项保障写进我们的条约,而且还要明确地争取到《望厦条约》中为美国规定的利益。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深入研究、比较和探讨这两国外交家所做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54 页,三联书店 1981 年版。

② 顾盛在澳门时,曾聘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伯驾(Peter Park)为中文秘书,后增聘另一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帮办中文函札事宜。顾盛在写给美国国会牧师塔斯廷信中说:“事实是,此次和中国谈判,美国传教士特别是裨治文和伯驾,所提供的服务,若非不可缺少,亦是最重要的。”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pp. 130—134.

的工作,然后再把《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中重要的条款集中起来,另立一项条约,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

1844年10月24日,法国全权代表拉萼尼与清钦差大臣耆英分别在中法《黄埔条约》上签字。该约并没有规定“传教自由”字眼,但条约中有三项条款是与天主教有关的:

“第二十二款: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照例严拘重惩。

第二十三款:凡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来经游,听凭在附近处所散步,其日中动作一如内地民人无异,但不得越领事官与地方官议定界址,以为营谋之事……佛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因(应)解送近口佛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佛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第二十四款: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意雇买办、通事、书记、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请士民人等教习中国语音,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帮

● (法)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第2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各等工阶,束修,或自行商议、或领事官代为酌量。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话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①

拉萼尼之所以未将“传教”、“传教士”、“传教自由”等字眼写进条款,是基于两个原因:(1)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国内盛行政教分离原则,如将“传教士”开列条款并为其争取特权,将受到国内舆论的批评;(2)当时清政府还没有解除禁教令,也为了避免中国人怀疑法国人有意触犯禁教令。拉萼尼争取到的是: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从事文化活动,换句话说,传教士可以在从事文化活动的名义之下,以普通法国侨民的身份,建造教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和教会的周急院(慈善事业)。这些宗教性活动,是与普通外侨建屋建行混为一谈的,拉萼尼认为用法国侨民的概念,可以涵盖法国传教士,并同样赋予他们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拉萼尼承认,规定传教方面的权利是《黄埔条约》的一个特色。他说:“本使团在精神方面的成就将远远超过英国人和美国人得到的一切。他们考虑的仅仅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被他们忽视了。”事实上,法国在19世纪初叶以来,天主教势力已渐渐恢复,拉萼尼起程时,法国七月王朝王后玛利亚·阿美利曾命令他带耶稣会士六人一同来华,^②他们的到来,标志着近代天主教重新开始了在中国的活动。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在《黄埔条约》签订后不久,拉萼尼进而要求耆英奏请道光皇帝准允弛禁天主教,道光在耆英奏本上朱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页。

② 这六人是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鄂尔壁(Joseph Gornet)、笄良仁(Louis Taffin)、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辛斐禄(Pamphile Sinoquet)和瓦尼(Adame Vanni)。瓦尼因中途生病折回。

批“依议”，并于1845年1月21日颁谕耆英知悉。拉萼尼进而要求清政府发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于是道光皇帝于1846年2月26日发布上谕，不但准免查禁天主教，还同意给还天主堂旧址。这两道上谕的公布，标志着自雍正以来“百年禁教”的结束。

道光皇帝的两道谕旨称基督宗教为“天主教”，这是中国人对罗马公教的专称；同时，上谕说其教的特征是供奉十字架及圣像。在中国，为区别“天主教”，新教称为“耶稣教”。1807年，新教伦敦会牧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标志着新教在华传教史的开端。新教宗派很多，也以十字架为标记，但上面没有耶稣被钉的苦像，也不供奉圣人的雕像或画像。当时，在华的新教传教士认为他们也应享受天主教获得的特权，上海圣公会的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主教以及伦敦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牧师要求英使巴富尔与清方交涉，巴富尔没有答复。但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布士却自告奋勇，与耆英交涉。1845年12月22日，耆英答复：“本大臣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别，本不各晓，今已知之较多，故再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至规矩之或异或同，断无分拒之理。”^①由此，新教获得了与天主教一样的权利。

从1856年到1860年，英法对清朝发动持续四年之久的“英法联军之役”，战火从东南沿海蔓延到京师一带。1850年和1860年，清朝分别与法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及中法《北京条约》（又称《天津续增条约》），传教权利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肯定。《天津条约》第十三款云：

① 《中国丛报》1845年11月至12月，第14卷，第549、587页。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如处，概行宽免。”●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云：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拏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劄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其法文本之原文为：

Conformément à l'édit impérial rendu le 20 Mars, 1846, par l'auguste Empereur Tao-Kouong, les établissements religieux et de bienfaisance qui ont été confisqués aux Chrétiens pendant les persécutions dont ils ont été les victimes, seront rendus à leurs propriétaires par l'entremise de son Excellence le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auquel le Gouvernement Impe-

●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7页。

●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7页。

rial les fera délivrer avec les cimetières et les autres édifices qui en dépendaient.

译成中文为：

“按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慈善堂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法文和中文出入颇大，特别是中文本中“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一语，是有人作弊添加的。美国著名教会历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和耶稣会历史学家史式徽(J. de Laservière)都认为作弊者是充任译员的法国传教士艾嘉略。^①根据“租买田地，建堂自便”之句，1864年当法国传教士与浙江会稽地方官因购买地基发生争执时，法国公使柏尔德密乘机于次年年初与总理衙门商定一项补充规定，^②此即所谓“柏尔德密协定”。直到1895年，南洋大臣张之洞请人翻译美国国会文件时，发现法文本《北京条约》中并无传教士可在内地“租买田地，建堂自便”之句，他将此事报告总理衙门，总署据此照会当时的法国公使施阿

① 艾嘉略(Louis Delmarre, 1810~1863)，生于法国鲁昂，1883年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1834年升神父。1836年抵澳门，1837年潜入四川，在四川传道23年之久。1860年去香港，曾为法使葛罗当译员。《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返回四川，发现“条约没有得到执行”，遂拟重返北京到法国公使馆指控中国官吏，中途在汉口暴卒，有人怀疑他是被人毒死的。见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卷)，第666页。

② “柏尔德密协定”的内容为：“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买置田产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与奉教人之名。”

兰,施回复以柏尔德密协定为据,总理衙门只得不了了之。● 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权利,并没有因为张之洞发现其作弊而受丝毫损害,此诚为中国教会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

法国政府正是根据《天津条约》第十三款,声明在华拥有保教权。法国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条约上允许中国人民信奉天主教,这种信仰自由,不仅有中国国法的保障,而且又有国际条约的保障。如果中国皇帝或地方官吏禁止信教时,法国政府可根据条约向中国政府交涉,提出抗议。《北京条约》的第六款,实际上是运用了《天津条约》第十三款的保教权取得的结果,因为第六款所定的是具体的事项:第一,清朝皇帝发布上谕允许人民信教;第二,处治迫害奉教者的官吏;第三,偿还充公的教会产业。这三点都是运用保教权所得到的权益。当时清政府并不懂得保教权的意义,也不知道法国保教权的历史背景。

法国保教权起源于法国与土耳其所订的条约。土耳其原为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且因巴勒斯坦圣地的归属问题与西方十字军战争数百年。但自16世纪以后,土耳其国势衰微,法国在欧洲势力强大并向近东渗透。1535年,土法两国订约,允许通商等事。后1569年、1597年、1640年逐次修订条约。直至1740年增订土法条约,这个条约法文称为Capitulation(即分章条约)。该约规定,在土耳其境内的法国人及信奉天主教的人民俱受条约的保护。法国因此自视为近东天主教的保护者,要求教廷予以承认。教廷允许近

● 施阿兰照复称:“查咸丰十年续约第六款中法各文两歧一事,本因当年深知情形,且恐两国文字因出两歧,或致将来误会生事,正所以法国驻京大臣会同总理衙门,于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另行商定章程之故,所谓柏大臣章程是也。”参见:教档档通行教档,同治四年正月十六日总署收法国柏尔德密函,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八日总署致美公使函,与八月初九日总署给法国公使照会。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1966年,第124页。

东等地教会和土耳其政府如发生问题,由法国政府代表教会向土耳其政府交涉。但是对教会内部的宗教问题,教廷则派宗座代表常驻君士坦丁堡,直接代表教宗予以处理。因此法国在华的保教权,是仿效法国在土耳其的保教权而设的。● 不过,在以后长时期内,法国并不允许罗马教廷向中国派驻任何宗座代表,这点和土耳其又很不相同。

二 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务的态度

虽然葡萄牙、西班牙被教廷委任有保教权,法国在华的保教权在当时教宗国势衰微的情况下也被默认,●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罗马教廷越来越趋向排除保教权,直接统理中国的天主教事务。

早在 1840 年,东北的宗座代牧以马内·维罗勒(Emanuel Verrolles)就曾在教廷传信部建议,在中国建立由教宗直接领导的圣统制(又称“教会体制”Hierarchy),将全国教务分由北京、四川、安南东京三总主教区管理。传信部对这种建议,曾加以研究。●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弛禁的消息也传到了罗马。1847 年,日本宗座代牧兼香港监牧夥尔加助(Augustinus Forcade)于 10 月 14 日向传信部部长呈送了一份建议,主张召集在华主教、宗座代牧、各修会代表及邻国主教在香港举行会议,讨论中国教务问

-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 178 页,(台)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最初罗马教廷对法国的保教权曾予默认,传信部秘书雅各比尼(Mgr. Jacobini)曾训令在华的意大利教士尽量求助于北京的法国主教。

H.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e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Ancienne Librairie Germer Bailliere, Paris, V. II pp. 744. 1902.

-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见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 305 页,1976 年台南出版。

题。传信部于1848年5月11日批准该项计划,并指令15名主教和宗座代牧汇聚香港。6月20日,传信部训令驻华办事处专员费利切尼(Antonius Feliciani)指示在将举行的中国主教会议中,要研究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的议案。^①但是各教区的负责人对于是否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意见不一。法国的宗座代牧尤其反对,并将此事报告法国政府。法国政府驻教宗国的使节科尔塞尔向教廷提出了照会,表示支持本国代牧的意见。另外,葡萄牙政府也向教廷驻里斯本特使表示反对召开此次会议。在法、葡两国政府的压力之下,教宗庇护九世于1850年10月作出了放弃开会的决定。^②

1851年11月17日,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天主教主教会议,出席的宗座代牧和宗座监牧有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安若望(Jean Henri Baldus)、夥尔加助、赵方济(Francois Maresca)、孔神父(Florent Daguin)和徐类思(Luigi Celestino Spelta)。传信部训令会议研究34个问题,其中有一项即为在中国建立由教宗直接统辖教务的圣统制是否合宜。会议研究的结论认为合宜,并拟以中国行省制为中国教省制。^③然而,这次会议在另外一些问题反映出教会内部严重的殖民主义色彩:(1)会议规定,中国教会的总主教必须由欧洲人担任,中国人虽然名义上可当选为主教,但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选票,而且必须全部是欧洲传教士的选票;(2)关于国籍教士的培养,年轻的修士不得谋取科举考试中的学位,中国修士仅可以到那不勒斯中国公学进修,除此以外不宜到欧洲其他地方读书。^④关于中国的天主教事务是否要向法国请求帮助,会议发

①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见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178页,1976年台南出版。

② 卫育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卷),第612—613页。

③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305页。

④ 卫育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卷),第614—615页。

生了分歧。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写了一份请求书，其中说到：“对这个国家（中国），我们也有经验，在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说话和坚决强硬的词句，什么事都可以解决。”^①这份呼吁书没有得到全体主教的同意，特别是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徐类思主教拒绝在上面签字。

1859年，罗马教廷传信部为了详尽了解中国的传教情况，将时任湖广宗座代牧的徐类思召回罗马述职。1860年1月24日，教宗下诏书任命徐为中国天主教教务巡阅使。徐类思于5月抵香港，7月抵上海，8月视察江南教区，12月视察河南教区，次年2月视察湖南教区。^②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再视察其他教区。在巡视过程中，徐曾将一份问题和意见书分送各教区负责人，请求他们答复，其中有是否在中国要设立由教廷直辖之教区等问题。另外，教宗庇护九世还让徐类思向中国清朝同治皇帝呈递书信一封，请求同治皇帝召见其代表徐类思，并请求皇帝承认宗座代表有保护传教士的权力。^③教宗在信中还说：

“我们恳请皇帝陛下保护在贵国辽阔土地上生活的所有天主教徒和所有福音传播者——欧洲传教士，使天主教教义和信仰得以自由传播。天主教信仰可以给贵国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安宁，因为它可以教人寻求和平、友善、仁慈为己任；把遵从君主和朝臣作为对天主承担的

① 卫青心著、黄庆华译：《罗马教廷与中国》，杨高坚译，涂世华、黄道胜校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资料室、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资料室，1987年11月（非公开出版），第18页。

② 徐类思呈传信部报告见教廷“传信部议事记录”第19卷。

③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306页。

首要任务来完成。”[●]

教宗是以中国天主教信徒和在华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之精神领袖的口吻来写信的,同时,对于中国皇帝亦表示出相当的尊重。事实上,教宗欲借此机会,试探与清廷接洽通使的可能性。然而,徐类思在动身出发去北京之前,因病于1862年9月逝世于武昌。

1869~1870年,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几乎所有的中国教区代牧和主教都聚集罗马开会。中国教区的主教们对大公会议重申的教宗首席权均表服从。新的教会法典指出:教宗通谕之所以永无谬误“是由于教宗的本职而非教会的承认”。传信部部长巴尔纳博(Barnabo)乘中国代牧主教几乎全数汇集罗马之机,在传信部官邸举行多次会议,商讨如何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1869年12月24日,传信部通令中国各教区主教对建立圣统制发表意见,结果争论十分激烈,赞成与反对参半。1870年7月14日,最后一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圣统制的时机尚未成熟。[●] 关于是否要派一名宗座代表常驻北京,几乎全体中国教区主教都表示反对,理由是“人们不会接受,因为看到在中国还缺乏传教必须的独立和自由”,另外,中国政府也不会对宗座代表表示尊重。关于培养本地神职人员问题,与会者大多表示悲观。他们不相信中国籍神职人员能够很好地管理教会事务,并请求传信部上级在信札中不要过分夸奖本地神职人员的才具,他们还要请传信部相信“在欧洲培养中国神职人员,反不如在中国本地培养好”。大会还讨论了一些其他问题,如本地神职的学习课程,各级学校内中西修女共存共管,全国统一瞻礼单和大小斋期的规定,传教士的服饰和生活经费、圣

● 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卷),第696页。

●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169页。

事的良心问题等等。● 关于保教权,有些主教主张在 1860 年《北京条约》换约时,应向清政府要求新的权利,而多数主教认为不应当再加新的条款,而要向中国官吏强调必须普遍遵守条约而不是避不执行。江南教区主教兼法国耶稣会士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竟然领头起草了一份中国代牧主教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请愿书,感谢法国对远东教区的保护。这封在 1870 年 3 月 10 日会上通过的请愿书写道:

“1860 年的条约为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开辟了新纪元。现在我们能自由地深入久闭的中国内地,在那里可以讲道、造堂、建设慈善机构,取得这个自由应归功于陛下的大力保护,归功于在北京的密切注视条约执行的公使……由于陛下明智规定,条约必须定期复查,这就为条约不断完善提供了良机……我们的教友已知道爱戴使他们得到信仰自由的法国了。”●

几天以后,拿破仑三世复信中国的主教和教士说:

“诸位在中国传教的主教先生:看到在华的主教和教士们深切领会 1860 年远征的意义,我感到欣慰。他们如此努力献身于传教事业,使我们在宗教信仰上和欧洲文化上结出了硕果,对此我深表感谢,我也将努力使他们的事业得到顺利的发展。”●

● 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下卷)第 194—197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下卷),第 196—197 页。

从以上事件可见,在 1869 年到 1870 年梵蒂冈举行的多次关于中国教务的讨论中,惟一得出肯定结论的是将要在 中国设立五大教区。至于建立圣统制,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向北京派驻一名宗座代表等事宜,均遭到否定。由于参加会议的主教中法国籍占了大部分,他们竟向法国皇帝写信,感谢法国运用保教权对中国教会的“保护”。那时中国的代牧主教共 31 位,其中 16 名为法国人,他们都反对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亦反对教廷向中国派驻使节以及推进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运动。[●] 这表明,罗马教廷要直接管理中国天主教的愿望以及向中国派遣一名宗座代牧的意见,遭到了否决。1870 年 10 月,普法战争爆发,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无限期延迟,与会的中国代牧主教纷纷返华。

1874 年 9 月 24 日,传信部枢机委员会开会讨论,分中国代牧区为数大区,预备日后设立教省。讨论后议定,由传信部部长询问当时在罗马的香港代牧,意见如何。1879 年 6 月 25 日,传信部颁发部令,划分中国为五大区。第一区——直隶、东北、蒙古;第二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第三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广东、广西、福建、香港。传信部训令各区主教于部令颁布一年以内,举行区会议,但直到 1880 年,五大区主教才分别举行会议。[●]

五年以后,中法战争爆发。当时在位教宗良十三世,恐怕中国因与法国开战而迁怒于受法国保教权庇护的传教士,乃于 1885 年(光绪十一年)2 月 1 日,致函光绪皇帝,感谢清朝皇帝保护传教士,并声明在华的各国传教士们,无论原籍属哪一个国家,俱系罗马教廷所派遣,他们的传教使命,也是由罗马教廷委任的。教宗信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 182 页。

● 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第 306 页。

中说：

大清皇帝陛下：

由于近期贵国一些地区出现了战争，我们不得不做出一切努力。赢得皇帝陛下的同情和宽恕，以避免战乱给天主教带来不幸。我们正在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尽最大努力保护天主教。我们的先驱曾不止一次地为保护欧洲传教士和教民恳求过皇帝陛下的先辈，我们现在也在这么做。

使我们感到极大安慰的是，即便在这种非常时期，您也为教徒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从而证实了您的善意。其实，在战乱出现的初期，陛下就曾降谕，要尊重教徒，不得伤害法国传教士。

皇帝陛下，在这方面，传教士无不感激您的公正和仁慈，何况在繁荣昌盛的中华帝国居住并传播福音的教士都是受罗马教皇委派的，教宗赋予他们使命、重托和一切权力。这些人不是从一个国家招募的……这完全符合基督教的性质，因为基督教不是某一民族的宗教，而是所有人的宗教；基督教不分国籍和种族，通过博爱，把全人类联合起来。

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人，他们的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对国家、政府也是同样有益的。他们不应该过问政治，而应专心宣教和捍卫耶稣基督的教义。基督教的基本戒律之一就是敬畏天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彻底地、真诚地主持正义。因此，他们也应该服从法官，敬重国主。当然，这种敬重不应该是因为害怕触怒国王，而是要发自内心尊重。从劝人为善和维护治安的角度看，具备上述

美德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强盛的中华帝国履行使徒的职责,根本没有给官府和百姓招惹任何麻烦,相反地,任何人都可以证明他们帮了许许多多忙。他们最初到中国,是宣传基督教的精神,接着便是传播文化艺术,即西方的文明。既然现在这些人也是本着同一想法和愿望,从基督教教义方面入手,对中国人进行教化,您就不必怀疑他们是否始终情愿和忠实地顺从陛下了。

大皇帝陛下,一系列事实证明,您对他们是非常仁慈的。我们向您表示万分感谢。同时,在目前局势下,我们恳请皇帝陛下大发慈悲,关怀和保护这些传教士,使他们免遭不幸,并能在陛下的支持下,充分享受履行职责的自由……”^①

教宗致光绪皇帝的信,虽然没有明白地否认法国保教权,但他以教主的身份,向清政府表明在“中华帝国居住并传播福音的教士都是受罗马教宗委派的,教宗赋予他们使命、重托和一切权力”。同时,教宗也向清帝表示,传教士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律,敬重所在国的国主。良十三世致清帝函,由意大利传教士(今属米兰外方传教会)的久里亚耐里(Francesco Giulianeli)带来中国。久神父抵北京以后,往谒北京主教达里布(Tagliabue),请他转荐于总理衙门,北京主教竟拒不受理。久神父只得通过英国驻华使节向总理衙门呈送教宗致清帝函,总理衙门在接奉教宗信函以后第三天,函复久神

● 原信为拉丁文,发表在“Osservatore Romano”,23 MCRZO 1885(《罗马观察家报》)法文译文在1885年4月3日于《公教教务杂志》上发表。

父。[●]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罗马教廷具有强烈的愿望,要从法国手中收回对于中国教务的管辖,并向中国派遣使节或宗座代表。但是,由于那个时代中国教区的领导人中法国人占了很大部分,他们更愿意由其本国政府实施对中国教会的保护,他们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与教廷之间的联系。在那个时代,教宗国的国势衰微,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尤其在1870年,法军因普法战争撤出罗马,意军进驻罗马,教宗国只剩梵蒂冈一角,在这种困难的情势之下,教宗要越过法国的保教权直接统管中国的教务,可谓障碍重重。

三 李鸿章拟与教廷通使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保教权的运作,教案渐渐增多,尤其是1870年6月间爆发的天津教案更使中外震惊。当时天津流传的谣言说:教士用药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制造药剂。天津人民愤而焚毁教堂多处,杀死法领事丰大业及随员、译官夫妇、中国及法国神父各1人,修女10人,法商及俄商各1名。[●]法国为此调集舰队于大沽口外,气势汹汹,准备开战。时直隶总督曾国藩奉谕接办,他将天津知府及知县查办充军,并处死“凶犯”二十余名。曾国藩作了详细的实地调查以后认为:“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言有眼盈罈,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蕃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81—182页。

● 马士恣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第27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行。倘残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①但是，曾国藩认为，在法国保教权庇护之下，教士到处惹是生非，激起民愤，是引发教案的原因：

“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吃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②

不久，曾国藩因右目失明及晕眩症离职，清廷改派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于两年后去世。1871年，总理衙门向各国驻华使馆提出《传教章程》，要求裁撤育婴堂、中国妇女不准入堂、传教士不要插手诉讼、传教士应持执照在固定地点传教、传教士不可收有劣迹者入教、传教士不可擅用关防印信照会官府衙门等等。^③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该章程完全置之不理。对于法国的蛮横，某些西方外交官和为清廷服务的洋务专家亦颇表不满。英国领事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早在1857年就曾写了一篇名为《对基督教的容忍》的文章，指责某些传教士干预词讼的做法，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还说：“一个列强执拗地保教，同中国政府订立有保护优待传教士的条约。”他甚至说：“基督教会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者的西方强国。”^④天津教案

① 李刚己：《教务纪略》卷四第3页，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

② 于安定撰：《曾国藩事略》第116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 李刚己：《教务纪略》卷三，第4—12页。

④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下卷)，第200页。1869年阿礼国回国以后，他将自已的看法向克拉兰教伯爵汇报。克拉兰教再将这些意见上呈英国上议院。阿礼国还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一再引用恭亲王同他会谈时讲的一句话：“倘若英国能把我们从鸦片和传教士中拯救出来，我们同英国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方殿华：《南京今昔》，转引自《江南传教史》下卷，第201页)

发生时,阿礼国已经离任,但其思想在英使馆人员中有一定影响。有迹象表明,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出自英国人的建议。1871年9月15日和9月29日,天主教北京教区宗座代牧田嘉璧(田类思 Louis Delaplace)向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报告说:

“在法国遭受极大灾难时,一位英国重要人物向总理衙门大臣说:‘你们在传教士问题上要和法国商谈,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不可错过良机。这就是那份《备忘录》(指《传教章程》)的由来。’”●

田嘉璧曾想撰写一份文件,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名义,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但罗马教廷传信部没有批准他的做法。传信部部长巴尔纳博枢机写信给中国各教区负责人,询问他们对清政府《传教章程》的意见,并请作书面汇报。● 这些报告都汇集罗马。1885年中国与罗马教廷拟通使时,教宗良十三世曾以很大的关注加以研究,以作为判定教廷对中国政策时的重要参考。●

从1870年以后,清廷的洋务外交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他对于总理衙门恭亲王及前任曾国藩等对教案及保教权的看法,自然是十分了解。同时,由于他本人接办了天津教案,对教案的处理亦有直接的经验。在1881年,李鸿章就请英国驻香港前任总督赫耐斯(John Pope Hennessey)致函转达教廷国务卿雅各彼尼枢机(Card. Jacobini),表示意欲和教廷通使订约。在《星轺日记类编》中,薛福成曾记录此事曰:“查旧卷光绪八年十月曾侯咨呈

●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下卷),第207页。

● 同上书,第202页。

● 卫育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在华传教政策》(下卷),第670页。

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云,英国前任香港总督亨乃西密交其写呈罗马教王之外部神父札克毕尼节略之稿,内称上年与北洋大臣会晤,谈及华民与耶稣教民相处情形,始终不能和洽,欲复康熙年间之旧,必须教王遣使驻京。按照接待各国驻京公使之礼一律接待教王之使等语,甚有远虑。”薛福成也谈到了法国保教权和教案的危害,他的结论是:“若与教王径相交涉,不令霸国干预其事,不以兵戎商贾之事杂其间,则遇事可以理析,亦可以情商,未必非交涉之一助也。”^①

从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教宗良十三世曾致信光绪皇帝,感谢光绪皇帝对传教士的保护,并声明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受教宗遣派来华的。李鸿章是闻知此事的。从那时起,李鸿章就预备正式与罗马教廷通使。引发这次通使的契机是为了呈请教廷同意迁移北堂。^②李鸿章明知法国不会赞成他的计划,所以他请英国人代为转达教廷,他选派的外交代表是天津税局英籍洋员敦约翰(John George Dunn)。敦氏为爱尔兰人士,信奉天主教。李鸿章首先命敦约翰调查中国天主教情况,同时也向北京传教士询问有多少国家和教廷互派使节,教廷驻华使节及中国驻教廷使节的身份。由英国代达教廷很可能是出于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的主张。德氏于1864年进中国海关任四等帮办,以后迁至天津海关税务司。中法战争期间,他是《李福协定》的牵线人,深得李鸿章的信任,1885年,英国拟任赫德为总税务司,

① 《星轺日记类编》云问丽泽学会,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卷七四教宗(上),五页。

② 北堂,其址最初在北京三海的中海西畔,名蚕池口天主堂。为康熙赐给耶稣会传教士的一块土地上建成,1703年开堂。道光初年没官。1860年重新开堂。1885年左右,西太后欲将其迁出官禁之地,派李鸿章派使与罗马、法国交涉,1887年,北堂迁至西什库,并另建大堂及主教公署,它一直是北京的主教座堂。

李鸿章曾极力保举他为总税务司^①（另有一种说法：德氏任职期间，曾按月秘密从开平矿务局支取几百两银子“车马费”，实际上是受雇于李鸿章的洋人“眼线”，1904年，他因此事被披露而辞去海关职务）。在李鸿章与罗马教廷的交涉中，德瑾琳负责电信联络和翻译。同时，李鸿章聘用英人出使教廷，也是由当时国际形势决定的：法国既然反对通使，德国国内俾斯麦正发动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意大利正在吞并教宗国的土地，因此只能请英国人代达教廷了。早在1881年，前香港总督赫耐斯就曾致函教廷国务卿，转达清廷李鸿章意欲和教廷通使的计划。但是事后清廷并没有动静。1885年李鸿章拟派敦约翰出使罗马之际，另请驻英公使曾纪泽遣驻英使馆洋员马格理(Sir Samuel Halliday Macantney)往见英国总主教马宁枢机(Card. Manning)，请他代转清朝愿与教廷通使的意愿。马宁枢机于1885年8月14日致函教廷国务卿雅各彼尼枢机，陈述马格理来访的谈话，希望教廷对中国的建议加以善意的考虑。^②

据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件，他此次派使出访罗马，其目的在于以中国与教廷建交来否定法国在华的保教权：

“至与教王商办教案，彼此派使互驻一节，亦系欧洲通行之例，借可潜移奉教各国包揽挟制之权……教王兵饷两缺，断不能因教案兴戎，近日明白洋务时局者，多持此论。”^③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1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83、185页。

③ 《致译署遣英士教约翰赴罗马》，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吴汝纶编：《李文忠公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一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另外,李鸿章与敦约翰有如下的问答:

李:尔见罗马教王及教王外部商议,日后遇传教案件,中国与其商办,不由法国经理可乎?

教:如中国果有此意,罗马教王无有不悦之理。近闻各处天主堂教士言中国待教士可谓厚矣。然传教之案,由法国公使与总理衙门商议,屡次插入他事,借端为题,诸多要求,实非教会所愿。若中国派一使臣常川驻扎罗马城,该教王亦可派一员驻扎京都,彼此通气,遇有教案,易于商办,可无庸由法国经营。至法国悦与不悦,其奈我何。盖从前天主教民,由法国保护者,恐国家不允设法保护耳,今中国若特再申明保护教民之意,使天下人皆知之,自无庸法国保护,万一遇有教案,由教王所派之人妥办,则法国不得过问矣。●

敦约翰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由上海动身赴欧洲,他先到英国伦敦,在本国马宁枢机的引荐之下,于次年正月初三抵罗马。他首先拜会了教廷国务卿雅各彼尼枢机,呈上李鸿章的文书,一封给国务卿,一封给教宗。教宗良十三世于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四日接见敦约翰,垂询清廷意欲与教廷通使的理由和目的,敦答以清廷愿与教廷直接商谈传教问题,不愿再有第三国干涉,教宗欣然允以最同情的考虑,并请枢机团加以考虑并作出回答。二月八日,敦约翰上书教廷国务卿,正式声明中国政府与教廷通使的行为,是中国

● 《与敦约翰问答节略》,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政府自动的提议,不受任何外来政治势力的影响,中国的目的在于求得国内的和平。中国政府建议的另一目的,虽为取消法国在华的保教权,但不能因此视为对法国有何敌意和仇视。中国政府理解法国政府保护传教事业的好心,但中国传教士却因法国保教权,常被误视为法国政府的爪牙,反而受中国人的歧视。中国和教廷通使以后,这种歧视心理可以冰消,法国政府也应当视为好事。●

教廷国务院枢机委员会于二月中旬举行会议,讨论和中国通使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是否应该接受中国政府的提议,其次讨论了和中国通使的方式。方式可以有四种:(1)派宗座代表进驻中国,该宗座代表不含有外交使节身份;(2)派宗座大使驻中国,在必要时,请法国政府执行保教权;(3)由中国政府先与法国政府谈判修改保教条约,然后教廷才与中国通使;(4)教廷派大使驻华,同时向法国政府声明不放弃其保教权,中国政府如不愿接受时,教廷决不放弃其本身固有的权利。委员会会议最后呈请教宗采用第四种通使方式。● 敦约翰电告李鸿章说:教廷国务卿和多数枢机,都赞成中国政府的提议。但在原则上,教廷和中国彼此有冲突,中方的目的为取消法国的保教权,教廷则要同时保留法国保教权。但事实上两方面都知道,教廷大使到中国以后,传教问题自然而然由教廷大使和中国政府商谈,法国的保教权将名存实亡。所以中国对于通使的方式并不反对,反对的是法国政府。

教廷希望法国反对通使的态度,能因教宗声明保留法国的保教权,而有所缓和。教宗于8月14日接见法国大使面告教廷将派使驻华。教廷当时任命的驻华大使为阿里雅底(Antonio Agliardi)领衔总主教,曾任当时教廷国务院非常教务副国务卿两年,又任宗座驻印度宗座代表。清朝原来声明驻教廷公使为驻英伦公使曾纪

●● 转引自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86、187页。

泽兼,而不会以驻意驻法驻德公使兼,以免各方误会,后决定另派刘姓大员驻教廷。

法国自始至终强烈反对中国与罗马通使事。事实上,法国在此事动议之初已经探知。对于法国政府的干扰,李鸿章早有所料,他初次向敦约翰面授机宜时,即再三嘱咐:“此次委尔办理此事,必须秘密,勿稍张扬,务要小心,慎始慎终。”^①在给醇亲王信中也建议,应“飭令恩道(恩佑)速赴总税务司赫德公馆,密询德璀琳,到京后如有成议,即会同密往蹠看地基(指北堂),随时禀候裁示,密为布置。”^②连说三个“密”字,可谓谨慎之极。但是这件事一开始就走漏了风声。敦约翰在受命以后即往见遣使会驻华办事处主任文和温神父(Francois Wynhoven),请他帮助。文神父为法国人,他于1885年6月27日,向法国驻华大使巴特纳密告:中国拟和教廷通使,英、德、意、西诸国公使在旁附和。^③文神父还呈上了一份密件,这是敦约翰和李鸿章的谈话记录。在这项记录中,敦说中国政府有诚意保护传教士,也想研究最适当的保护方法,李鸿章的幕僚则说最适当的方法,是教廷和中国互派使节。巴特纳立即将这些报告呈送法国外交部,并在批语中说此系确切的事实。法国政府在得到这些报告以后,决定在开始时不表示意见,静观其变,直到时机成熟以后,才断然声明反对。

1886年2月17日,教廷驻法大使拜谒法国总理,通知教廷和中国通使事,法总理声明决不放弃保教权。4月15日,教廷国务卿行文法国外交部,这项文件包括:(1)教廷本身有独立的接使和派使权,教廷不能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2)教廷感谢法国所予在

①② (与敦约翰问答节略),转引自翁飞《李鸿章与蚕池口教堂迁移案》,载《近代中国教案新探》第230-244页,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

③ 转引自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81页。

中国传教士的一切帮助；(3)教廷所派往中国的大使决不侵犯其他国家与中国所订的条约；(4)教廷在没有得到法国回复以前，不正式答复中国政府。●

从那时起，法国公开声明反对教廷派全权大使驻华，约在五六月间，法国公使贝合尼先是发函，继而亲往教廷外交部，与雅各比尼争闹不休。他所持的论点有四：“第一，要保护各天主教会之在中国者；第二，要保护在中国之传教者；第三，要监督在华各教会事件；第四，天主教与地方衙门大小官员交涉之事，法均要管”●，即紧紧抓住法国在华保教权不放。法国进而提出，如果教廷坚持派使节来华，只能仿效土耳其之例，“须按驻土耳其小公使之式，专理教门内事。如与中国有交涉要务，由该小公使，禀候法公使与中国办理等因。”● 对此，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坚决予以抵制，因中国与罗马互派使节的目的本来就是否定法国的保教权。李鸿章电示敦约翰三赴罗马外交部，向教廷申明中国不可动摇之立场：“一、中国无论何时，永远不承认法国为保护在华天主教会及天主教人，且静以待时，思有以绝其保护之志；二、教皇所派驻华公使，与各国使臣一律，若仍由别国管辖，则中国不与共事；三、中国决不允罗马公使照土耳其使臣由法国节制。”●

5月23日，教宗良十三世召见法国大使，肋弗尔伯爵(Count Lefebvre de Behaine)重新申明愿意保留法国的保教权，并认为法国国内舆论反对教廷派使驻华是不合情理的。法国大使则建议教宗所派的使节是为一非常宗座代表，不具有外交身份，并当面请求教

● 转引自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91页。

● 《译敦约翰罗马来函》，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到。转引自翁飞《李鸿章与蚕池口教堂迁移案》第236页。

● 《译敦约翰致罗马外部总办加尔贝林氏函》，转引同上。

● 《译敦约翰罗马来函》，转引自翁飞《李鸿章与蚕池口教堂迁移案》第36页。

宗应允,以便电告法国政府,但良十三世不愿当面答复。

7月10日,法国总理训令法国驻教廷大使再次向教廷说明法国政府的态度:(1)法国在华的保教权系由中法条约所得,不容许第三国家予以改变;(2)教宗有权派使中国,但所派者不能具有外交身份,● 否则将与法国保教权发生冲突。与此同时,法国方面又在巴黎、伦敦、罗马等地大造舆论:“法朝廷声言,法国传教人在中国仍归其保护,惟派阿里雅底为驻京教务大员之事,当为(惟)教王是问。”● 接着,法国外交大臣于7月20日又再出面,“力劝教皇改派主教大员前往中国,不可派教务公使”●。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索性派遣敦约翰在罗马、伦敦等地游说,争取英德意俄西诸国的同情,欧洲各国对法国的蛮横本就不满,此时便纷纷表示支持教宗遣使来华,并笑法国挟制教宗无理取闹。

8月1日,教宗正式任命阿里雅底总主教为驻华大使。8月14日,教廷将此项任命通知法国驻教廷大使,至于教廷驻华使节上任之期尚未确定。8月17日,法国政府又照会教廷国务院坚持说教宗驻华使节不应有外交身份,并威胁说,如果不接受法国的建议,法国将撤回驻教廷的大使。教宗良十三世并不接受法国政府的要挟与恐吓,命令阿里雅底总主教于9月25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船“Saghalien”号起程前往中国。

法国政府于9月12日,向教廷发出最后通牒,声明如果教廷派使赴华,法国政府将撤回驻教廷大使,法国与教廷所有的订约都将作废,还要停止法国政府每年拨给法国教会的津贴费。据敦约翰来电,如果教宗向中国派使,“则法与教皇所守条约全行撤毁,国中教士每年俸银五十万兆佛郎概停不发。各教士恐绝生路,因而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92页。

●● 《译伦敦电报》,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环求教皇,切勿遣使赴华。教皇闻之,心甚踌躇,拟设法能免此难,虽未改初心,暂且不派公使”。● 教廷接到法国的最后通牒,迫于强大的压力,乃决定驻华大使阿里雅底总主教改期赴任。所谓改期,实际上是“无期”。

1885~1886年中国拟与教廷通使,中方是主动提议者。主持通使事宜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多年办理洋务和教案的经验,认识到“中土交涉之案,教务最为隐患,教皇权令能行,教士必不敢无理取闹,则裨益远矣”。● 而且,李鸿章已经了解到,教宗国虽有世俗的主权和对天主教会的管辖权,但它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教王兵饷两缺,断不能因教案而兴戎”,如果教宗派使节常驻中国,“则法人不得借教务持我短长,而教务归罗马专管,亦不致挟以为变,似是息纷弭衅之策”。●

就罗马教廷而言,教宗良十三世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事实上,早在中国遣使以前,教宗已经以教主的身份致函光绪皇帝,向中国表明对在华天主教的统理之权。教廷要从法国手中收回此一权利的意愿十分强烈而且明显,因为法国曾经表示如按土耳其之例派驻只具宗教身份不具外交身份的宗座代表(即“小公使”),将不予反对。但教宗并不同意。显然教廷就是希望向中国派驻具有外交性质的宗座使节以否定法国的保教权。最后,当宗座使节即将动身的紧要关头,法国以惩罚其国内的天主教会和断绝其对教会的经济资助相威胁,才迫使教廷屈服。那时,教廷已失去在意法境内所有原教宗国领地,偏处于梵蒂冈一隅,无法对付法国如此强大的压力,以至于通使一事,终于功败垂成。我国著名天主教历史学家

● 《译敦约翰来电》,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 《朋僚函稿》,第二〇卷,第六十五页。

● 《致译署论罗马派使管教》,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方豪神父追述此事时感慨系之：“法国千百年来，即以‘教会长女’自豪，但就此事观之，法国为教会之‘爱女’欤？‘逆子’欤？！”●

四 意、德等国攫取保教权

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虽然能够阻止中国与教廷的通使，但不能排除其他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远东扩张的趋势及利用教会影响而达此目的的野心。事实上，欧洲国家的教会和政府，对法国垄断在华保教权，已多有不满。

首先是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在华的主教中有人上书教廷，建议遣使派驻北京，统理中国教务。如河南主教 Simeone Volonteri 于1881年上书传信部长，香港的意籍主教 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 于1885年5月12日，也向教廷呈送一份详细报告，都建议由教廷与中国直接通使以解决教务的争端。●

那时的意大利政府在民族统一运动中与教廷处于对立的状态，更想借机将在华的意籍教士置于政府的保护和控制之下。1884年，中法在安南发生战事，意大利驻华公使卢伽（de Luca）亲赴汉口，将36份意大利文的证书分发给意籍教士。他在返回上海以后，于11月15日致信总理衙门通报此次行动。●当敦约翰在罗马的时候，意大利政要与他也有接触。1885年4月30日，敦氏往见意大利外交部长，未遇。那天意外交部头等秘书葛洛比阿讷伯爵接见了，葛氏请敦约翰转告李鸿章如下意见：（一）意大利传教

● 方豪：《迎教廷公使北上——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1947年8月9日，天津《益世报》社论。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82页。

● H. Cordier, 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57—58, histoire diplomatique, notes et documents, Felix Alcan. Paris, 1903. VII. pp. 642—643.

士今后将不再受法国保护；(二)意大利愿意见到教廷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三)意大利认为教宗使节地位不在别国之下,更不在法国之下。意大利驻华公使和领事可以为意籍教士申请到内地游历传教的护照；(四)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如遇教士申请护照,可代为申请,这是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非其传教士身份。如意籍教士请求法国保护,意政府不会干涉,但不为其提供保护；(五)如中国朝廷下谕旨命各国教士向本国请领护照,意大利会予以协助；(六)意政府感激中法战争时期中国对意籍教士的保护。^①可以看出,意大利排斥法国保教权的意愿十分明显,而且鼓励清政府这么做。

德国是另一个强烈要求摆脱法国保教权的国家。当法国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攫取保教权并得到教廷承认的时候,尚未统一的德意志诸国只能作为既成事实予以默认。直到1877年,德国驻华公使勃兰德(Von Brandt)才向德国政府提出,要求联合意大利和西班牙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削弱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地位。这个建议被德国首相俾斯麦否决。俾斯麦否决这一提议的原因,在于德国国内由他领导的“文化斗争”尚未结束。^②1879年4月,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Johann Baptist von Anzer)到达中国。1882年他在山东的鲁南地区成立传教点。同年,德国正式向

① 译教约翰致罗马外部总办加林贝尔氏函附,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② “文化斗争”是德国统一以后爆发的一场皇权和教权、政治与宗教之间的斗争。1869年,教宗庇护在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上宣布教宗无谬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认为这是对世俗国家权力的挑战。1870年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成立,它要求恢复教会在国家中的世俗权力,并以法律保护教会在国家中的独立性。1871年,俾斯麦下令撤销普鲁士文化部天主教处。1872年颁布《学校监督法》,以国家而非教会监督学校教育。1873—1875年颁布实行《五月法令》,取消宪法中关于保护天主教会独立的规定,停止国家对天主教会津贴。从1872年起,先后有1300个教区的教士被解职。1878年有一半的主教被解职。至70年代,教廷首先作出和解姿态。1885年,德国天主教会恢复自治。

法国提出,准备对在华的德籍天主教传教士行使保教权,但这份通知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也没有要求与法国谈判。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安治泰以担心德籍教士为由,曾试图寻求德国政府的保护,勃兰德要求他去寻找临时照管法国在华利益的俄国使团。直到1886年,德国颁布《和平法令》,“文化斗争”告一段落。1887年12月,1888年1月,勃兰德两次写信给俾斯麦,建议德国效法法国,将传教士问题作为在华展开活动的“主要手段”。“为了干扰正在损害我们利益的法中关系”,保护德国传教士“是我们具有充足理由又不很惹人注意的一招”。[●]同时,在1888年1月,勃兰德亲赴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清政府与德国旋达成关于宗教问题的两项协定:(一)凡德国政府发给德国在华人士(无论教士或俗人)的护照,清政府视其效力不亚于法国护照,且持护照人享受最惠国待遇;(二)清政府对于德籍人民所持之护照,如非德国当局所发者,概不签字。[●]1889年,由于安治泰及所属之德国圣言会在山东境内大肆扩展其教会势力,引发与当地民众日益频繁的冲突,他们最后作出了应该接受德国保护的决定。1890年,俾斯麦被解职,德政府正式宣布结束“文化斗争”,取消驱逐天主教教士的有关法令。这些决定在德国天主教会中引起重大反响。8月,安治泰等人接受了德国护照。当时教廷也同意他们自行选择保护国。[●]

在同一时期,罗马教廷仍未放弃统理中国教务的努力。1891年7月5日,从欧洲返华的安治泰在天津登陆,他携有教廷主管外交的郎博拉(Card. Rampolla)枢机主教致李鸿章的一封信,说明:(一)罗马方面除非通知法国,将不拟有所举动,(二)询问如果教廷

● 李乐曾:《文化斗争、殖民政策与德国在华取得保教权问题》,载《近代中国教案初探》第153—162页,黄山书社1993年。

● 张天护:《法国之护教政策》第84—86页,《外交月报》第9卷第6期,1936年。

● 李乐曾:《文化斗争、殖民政策与德国在华取得保教权问题》第161—162页。

在中国建立“圣统制”，● 清政府是否会在原则上同意？后来李鸿章就此征询樊国梁主教的意见。樊国梁详细地介绍了天主教会中教宗、总主教、主教的职权。李鸿章认为建立“圣统制”纯为宗教事务而非政治事务，对统一处置教务很合适。但又以此事属宗教事务，故无答复的必要。● 事实上，李鸿章没有看出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的真意仍然在于由教宗、总主教和主教来处置中国教务，以排斥法国的保教权。到 1892 年 10 月 1 日，李鸿章致函罗马教廷主管外交的枢机主教，“请此后传教悉由教皇与中国径行商办，并先派总主教一人驻直隶地方督办教事。”● 但这一次罗马方面却没有回音。

1894 年，当法国新任驻华使节施阿兰来华前，曾去梵蒂冈拜谒教宗良十三世。此举并不意味着法国与教廷关系的改善，而是法国礼节性的举动。1 月 30 日，教宗接见法使时，一方面表示不与法国协商不会有所举动，另一方面，教宗明确表示他仍念念不忘派宗座代表前往中国，并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的意愿。“因为（教宗）作为彼得的继承人，有责任在非基督徒中促进教会的发展。”●

此时的中国朝野，仍然有向罗马派使的呼声。1893 年，洋务派官员杨毓辉在《整顿中国教务策》中，指出为平息教案，“宜由钦差大臣就近与各国外部会商，请罗马教皇简派名望使臣来华，各国教堂胥归统制，将教士严行管束。”● 尤为著名的是 1905 年 4 月

● “圣统制 Hierarchy”：天主教会在传教事业不太成熟的地区设宗座代牧、监牧加以管理，而在传教事业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则建立“圣统制”，划分教省、教区，设正权的总主教和主教管理教务，并服从教廷的统理。

● 方豪：《李鸿章与教会体制问题》第 663—664 页。载《上智编译馆馆刊》第 2 卷第 3 期，1947 年。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第 850—852 页。

● （法）A. 施阿兰：《使华记 1893—1897》第 6 页，商务印书馆 1989 年。

● 《教案奏议汇编》卷 4，第 15 页。光绪辛丑上海书局石印。

12日及1906年4月14日吕海寰两次向朝廷的上疏,都建议向罗马派使节。吕海寰,山东掖县人,字镜宇,1842年生,1927年卒,历任清政府驻德、荷公使,了解国际事务。归国后任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津浦铁路督办。在第二次上疏中,吕氏提出如下建议:(一)考察他国教律,以为参考。“飭下考察政治大臣就近采辑各国教律,各会教规,以便研究各国教士教民不守教规应按何律惩治及平日如何保护约束之法,以为日后办理教案张本”;(二)改订中外商约,因为商约中含有教会事务专条;(三)另立教务专章专条;(四)联络罗马教廷。这年(1906年)发生南昌教案,吕氏奏请:“由外务部秉议办南昌一案,诘问法国驻使:现在法国既不保护教权,是案应否径与罗马教皇直接商办?若照约保护,将来必须派员另行商订详细教约,以便彼此遵守,而弭教衅。”(五)采用日本明治政府做法,先与罗马教廷建交排斥法国,以后再辞退教廷官员。“再查日本当明治之初,与各国交涉教案亦复不少,后经请由教皇选派教务官驻扎其地,专理教案,民教始就安谧。自明治三十一年收回治外法权之时,教务官亦即撤回,其办理亦有成效,不妨采取仿行。”^①但这两份上疏都被朝廷留中,未见回应。

^① 《教务教案档》第7辑第750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版。

第五章 20 世纪初期中国 天主教的本地化

一 民初中国拟与教廷通使及失败

在 1900 年“庚子事变”中遭受最严重的打击对象，就是在华的天主教会。然而，在 20 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中，天主教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00 年，中国信徒人数为七十四万一千余人，1907 年，达到一百万，1910 年增至一百二十九万余人，1920 年增加到一百九十九万，1921 年约略超过二百万。^①二十年间，信徒人数增加了近两倍。1901 年，在华天主教有一千余名外国神父，五百余名中国神父；到 1920 年，外国神父有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中国神父有一千人。^②

在 1900 年，中国全境的天主教教区，由十个传教会分别担任传教工作：奥斯定会、多明我会、耶稣会、方济各会、遣使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米兰外方传教会、罗马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修道院。^③

①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 93—94 页。（台）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②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 178 页。

③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第 1056—1057 页。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1900年以后,其他欧洲的修会也纷纷来华。1902年,慈幼会抵澳门;1904年巴尔玛外方传教会抵河南;1917年,伊苏登外方传教会抵贵阳;1918年,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抵广东江门;1920年,圣·高龙庞外方传教会抵汉阳;1921年,苦难会抵达湖南辰州;1922年,比布斯二心会到达广西琼州、圣心司铎会抵达云南大理;1925年,本笃会抵达北平,并于次年到达四川西山。● 还有相当多的女修会来华传教。

从整体上,1920年以前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区域上可分为五大主教辖区:第一主教辖区包括直隶(7个宗座代牧区)、东三省(2个)、蒙古(3个)、豫北(1个);第二主教辖区包括新疆(1个宗座代牧区)、甘肃(2个)、陕西(3个)、山西(2个)、山东(3个);第三主教辖区包括苏、皖(1个宗座代牧区)、河南(3个)、湖北(3个)、湖南(2个)、江西(4个)、浙江(2个);第四主教辖区包括贵州(1个宗座代牧区)、四川(4个)、云南(1个)、西藏(1个);第五主教辖区包括福建(2个宗座代牧区)、广东(3个)、广西(1个)、澳门(1个)、香港(1个)。当时全国共有54个宗座代牧区,另有1个监牧区(在新疆)。每代牧区均有一个主教座堂,一般也有一所修院、几所高级小学,一所中学及医院诊所。每个代牧区还有数目不等的总本党。上海和北京是天主教人士最集中的地方,在一些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建筑有规模宏伟的天主教主教座堂。●

1903年,主张与中国直接通使的教宗良十三世去世,庇护十世当选为新教宗,至1914年去世。继位的新教宗为本笃十五世,嘉斯巴里(Monsignor Gaspari 1852—1934)枢机出任教廷国务

●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94—95、97—98页。

●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第1061页。

卿。● 嘉斯巴里为主张废止法国保教权的人物。1904年,法国实现政教分离并终止与教廷的外交关系,时任法国政府总理的埃米尔·孔布斯(Emile Combes)指责教廷蓄意解除法国对远东基督徒的保护。当时任副国务卿的嘉斯巴里在耶稣会办的《天主教文化》(“The Catholic Civilization”)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强调法国需得到教廷同意才能在远东行使保教权,至少,这种权利的来源是双重的。

本笃十五世继位以后,追随良十三世的外交路线,关注非基督教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传教事业。1914年11月30日,教宗将他就任的消息,通过北京的宗座代牧、法国遣使会士林懋德(Stanislas Francios Janlin 1856—1933)● 通知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袁氏也请林懋德转达对教宗的问候。

中国方面通使的意愿,与陆徵祥● 出任外交总长有关。陆徵祥在民国元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外交总长,数月以后又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袁世凯的任命是试图用无党派色彩而易于驾驭的陆氏来取代已经倾向于同盟会的唐绍仪。次年,陆徵祥不愿卷入党争而辞职,退居总统府顾问。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

● 嘉斯巴里,意大利马切拉塔省人,与利玛窦是同乡。早年任罗马传信大学和拉特兰大学教授。1898年晋升总主教,历任教廷驻南美秘鲁、波利维亚、厄瓜多尔宗座代表。1901年任教廷国务院副国务卿。1907年册封为枢机主教。

● 林懋德,法国遣使会士,1884年来华。1905年升任北京教区监牧,后任宗座代牧。

● 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早年随清廷外交官许景澄出使俄、法等欧洲国家,后任驻俄公使参赞。1911年通电响应辛亥革命,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外交总长及国务总理。参与同日本“二十一条的谈判”。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拒绝《巴黎和约》,后任驻瑞士公使。1927年,他在夫人培德去世以后入比利时本笃会圣安德鲁修院为会士,1935年晋铎。1946年,教宗赐以 Ghent 城圣伯多禄会院院长衔。

一条”，袁任命陆氏负责对日谈判，复出为外交总长。后两年黎元洪任总统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黎不主张参战，陆徵祥则主张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陆氏以政见不合辞不入阁。次年主张对德宣战的段祺瑞组织政府，陆徵祥再出任为外长。

中国对德宣战以后，中国政府想以外交行动争取多数国家的同情，预备在将来的和会中，争回德国在山东所有的权利，防止日本实行“二十一条”的要求。在此既定政策中，陆徵祥便有了与教廷通使建交的计划。^①

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训令中国驻意大利公使馆和罗马教廷接洽两方互派使节问题。当时中国驻意公使为避免法国的猜忌，不直接与教廷国务院接洽，转请第三国即摩纳哥亲王在罗马的代表卡彼罗伯爵(Capello)为斡旋人。^②

教宗本笃十五世及教廷国务院对中国政府的通知表示欢迎，双方在罗马举行了谈判。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教廷因战事而引发的事端很多，故与中国通使一事交涉很缓慢。直到1918年7月11日，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Osservatore Romano”)发布一正式消息：“中国政府曾经向圣座表示，愿意同圣座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圣父教宗欣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并同意中国政府派遣前往西班牙及葡萄牙公使戴陈霖先生为中国驻教廷公使。”^③也就在7月11日和14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两篇

● 陆徵祥通使的主张除基于内政、外交的考虑之外，他承认受到他的老师、前清驻俄公使许景澄的影响。据多年后他对罗光神父说：“我们中国政府现在常不注意罗马教廷，李鸿章那时就提议和教廷通使，到现在已五十余年。许文肃公(景澄)也主张和教廷通使，我在外部也主张通使。”罗光《访问陆徵祥神父日记》，载《传记文学》第19卷第5期，第83页。

● (意)乔凡诺里：《本笃十五世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顾卫民译：《近代中国》第六辑第11页，上海中山学社主办1996年。

● 罗光：《中国与教廷使节史》第207页。

由教廷国务院授意写的社论,申明向派驻中国宗座代表的使命是纯宗教性的,在政教分离或非基督教国家和地区教会的权力也是来自于天主。●

教廷内定驻华宗座代表为白赖里总主教(Monsignore Giuseppe Petrelli)。● 但名字还未公布,法国立即作出了反应。7月26日,曾长期担任法国驻华外交官的现任法国外交部长毕盛,从巴黎致函教廷国务院,指出如教廷派使驻华,会使法国保教权难以维持,法国将终止恢复与教廷的外交关系。法国还派国家学会会员科尚(Denys Cochin)● 去罗马见嘉斯巴里,声明法国绝不放弃保教权,因为“法国在中国的世俗权利,是我们的传教士以鲜血代价获得的”。①

但与1886年不同,此时法国缺乏对教廷施加压力的有效手段。于是,法国转而向中国北洋政府施加压力。1918年8月13日,法国通过遣使会在北京办的《北京通讯》(“Journal de Peking”)上指责教廷任命的白赖里总主教有亲德之嫌。8月11日,法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指出“由于梵蒂冈似乎同情的是敌人而不是协约国,中国政府在大战期间接受梵蒂冈所任命的官员,将证明中国与协约国很少有什么友谊”②。

教廷国务卿嘉斯巴里辩解说:“白赖里主教不大可能与德国重

● 乔凡诺里著、顾卫民译:《本笃十五世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第11页。

● 白赖里主教于1903年被教廷派驻菲律宾,任宗座代表公署秘书,后升宗座代表(领总主教衔)。1916年曾被教宗指派为宗座使节访问日本,熟悉教会在东方传教事务。

● 科尚实为法国外交部副部长,但当时法国与教廷无外交关系,他以国家学会会员身份前往教廷访问。

●● 乔凡诺里著、顾卫民译:《本笃十五世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第13页。

要的政界人物有什么个人联系,因为他长期在亚洲国家工作。”即便如此,嘉斯巴里说教廷为迎合一些协约国家的意愿,可以撤换白赖里的任命,建议由毕萨尼(Pietro Pisani)● 主教出任此职。但是,法国进而指责毕萨尼也是亲德的。事实上,法国真正关心的仍然是保教权,它希望中国政府不仅拒绝白赖里,而且拒绝所有的教廷使节。同时,法国又联合英国、意大利,一齐劝告中国外交部勿接受教廷使节。那时的北洋政府正感到日本“二十一条”事件的压力,不敢再得罪法国等西方列强,终于作出了让步。8月17日,路透社报道一则消息:由于法国的压力,中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教廷使节来华事宜。

尽管如此,教廷国务院并没有放弃说服法国。8月22日,嘉斯巴里通过巴黎总主教阿梅德(Card. Leon Adolphe Amette)枢机递交一封官方信件给法国政府,要点如下:

- “(一)驻华宗座使节并不损害法国在远东的保教权:
- (二)宗座使节的任命目的只是精神上的,即:统一传教行动,设立宗座代牧区或监牧区并划定其边界;指示宗座代牧或监牧训练本地神职人员,纠正错误和抑制弊端;监督传教团体纪律,传递教廷指示并监督其履行情况;分析中国宗教情势并建议如何改进,向教廷提呈主教任命,判断传教士的纠纷,颁赐赦免法律,促进宗教生活的发展。
- (三)外交性质不是必须,但它提供了确定的和珍贵的益处。

● 毕萨尼:当时任教廷御前大会部副部长,充任战时教廷派驻君士坦丁堡教济难民专员。

- (四)不能接受所谓真正的教廷使节是法国公使的意见。
- (五)保教权没有宗教的功能,其权限只在物质方面。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 (六)宗座外交使节的建立有助于保教权的行使。”^①

10月13日,嘉斯巴里再次致信阿梅德枢机,强烈重申了上述观点。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教廷不仅不愿放弃派遣驻华宗座使节,而且产生了改革中国天主教会的意向。

二 中外天主教人士对教会积弊的反思

就20世纪初期中国教会的情况来看,虽然信徒的人数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自上一世纪沿袭下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变得越来越醒目了。同时,教会内部中国人士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有明显的提高,西来的传教士中新一代的人物也表现出不同于他们前辈的立意和眼光。由此产生的冲突和丕变,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首先,近代天主教入华,是以中法《黄埔条约》为先导的法国人从《黄埔条约》和后来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取得了保教权,而天主教则在毛瑟枪和大炮的伴送下与中西之间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使中国人因民族矛盾而排教,也使天主教会无法依靠上帝的力量来与中国人沟通。由是,教案引发的冲突,常常要依靠出自不平等条约的保教权来平息,而事后总是以巨额的赔款为了结。譬如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除清政府给列国赔款4.5

① 乔凡诺里著、顾卫民译:《本笃十五世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第15页。

亿两外,地方上也摊派了很多赔款,其中大部分赔给教会、教士和教民,仅山西一省给教会的赔款就达 200 万两。^①美国教会提出的赔偿原则是:“被毁坏房屋的实际估价,另加百分之二十为重建所需的人力和材料估价。”^②教案、保教权、赔款把上帝与强权、财物连在一起,上帝的面目因而显得一片模糊。《圣经》上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汉口的犹太商人把这句话稍作改动,遂变成:“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后面就有赔款。”可谓谗而虐矣。

时至 20 世纪初年,中国民族主义潮流已经腾涌四泻,天主教会中多数当权的西方传教士们却仍然未脱旧时意态。他们对强权政治的依赖已由稔熟而成习惯。但旧意态终究挡不住新潮流,其结果便是新旧之间的矛盾被搬到了教会内部。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天津的爱国教徒曾成立了“公教救国团”,以号召教内同胞“奋发风云,誓保国土,……为全国之一助”^③。并在“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中指出法国利用保教权侵害中国的事实。相近的时间里,上海耶稣会出版的《圣教杂志》,以《公教友人热心救国》为题,发表过社论支持天津教友的爱国行为,表现了南北之间的呼应。但当教务巡阅使光若翰(Jean Baptiste Marie de Guebriant 1860—1935)^④ 抵达上海以后,同一家杂志却在他的干预下转到反对罢工和学潮的立场,申明教徒“如果违反,应得神罚处分”^⑤。稍

①②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ary in China, PP. 521—525. N. Y. 1929.

③ 天津《益世报》1919 年 6 月 11 日。

④ 光若翰:1919 年,教廷派光若翰主教为教务巡阅使,到中国各地巡视教务。他走遍各教区,将教廷所拟的一些问题发给各地主教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保教权、宗座驻华代表、教会本地化等敏感事宜。光若翰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后来成为该会的总会长。

⑤ 上海《圣教杂志》1919 年 11 月。

后,光若翰来到北京,主持了华北主教会议,并以教廷特使身份发表了《致直隶司铎书》,申明:“一不容受教于众庶之无神品者。彼众既将中国政府旧有之一下等权威推翻以后,改造共和国家,遂梦想教中治理亦然改变,其思想之纰谬,盖无甚于此矣!二不容受教于报界,报界中虽有教中人主政,但为取悦报人起见,亦不能不大放阙词,恣意之余,亲率悖谬,不诚信,不确凿,盖往往而有;三不容受教于耶稣教人,该教于基督要理且不同心,而于煽动人心,则用种种方法,有时且危及公安,意在增其名誉,展其权力而矣。”^①这些话明白地表达了对于中国社会由帝制进于共和的一片不以为然之心;也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于反帝爱国运动的隔膜、蔑视与抵制。作为对应,则是教会本身在时潮与政潮起落中成为千夫所指的东西。随后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正是一种针锋相对的回答。

其次,自利玛窦的一套传教方法被教廷否定以后,外籍传教士大半不懂得中国文化。而近代来华的教士又挟有战争打出来的民族优势,无须尊重中国文化。这种倾向使天主教信徒中知识阶层少而乡间农民多。直到20世纪初年,这种情况也没有很大的改变。教会在各地设立过许多教理学校,冬季农闲时,准备饭食,招待望教者。^②饭食的质量较一般平民日常吃的要好,不无借以吸引望教者的动机。庚子以后,华北天灾人祸,兵燹战乱,造出了大批饥民,到教理学校里来求食的人数也因之增多。传教士干脆将“教理问答”分为四份,能背诵一份者,给洋银一圆,于是到教理学

① 1919年11月18日巡阅使光主教致天津华铎书。《马相伯文集续编》第58—5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版。

② P. Octave Ferreux, C. M. 著:《遣使会在华传教史》,吴中文译。第471—472页。台北华民书局1977年版。转引自陈方中:《民国初年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运动》,(台)政大历史所硕士论文。

校来的“望教者”更是趋之若鹜。这样，传教士在每年的教务报告中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然而，以这样的方式吸收来的信徒在信仰上实在是很成问题的。杨家坪苦修院的汪院长后来向教廷宗座代表说：“天主教徒，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形，可以说，对他们的外教同胞，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很穷，人数又不多，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也不能对基督的全善之德作什么有效的宣传。”[●]更有一些等而下之的人物，他们的目的本在于求得保教权的庇护，其人品更为世人不齿。山海关地方的本堂神父向宗座代表报告：“……实际上教友并不如其他人，而且在山中有些教友还横行霸道，竟敢击打警察，因为他们拒付警察应收的税金。”[●]在这教民眼里，教会如同教门，是他们的社会靠山。这种人被称为“吃教者”（Rice Christian）。信教和吃教虽然仅一字之差，但褒贬的区别却极分明。

复次，当时教会存在的一种奇态就是：在华的外籍传教士中，有国籍同而修会不同者，有修会同而国籍不同者，有国籍同修会同而会省不同者；这些人虽同奉天主，但彼此划地为牢，互为畛域，各自传教，财政和人员也各分壁垒，由此产生的五花八门，比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情形更为错综复杂。因为其间除了国家利益以外，还有各修会的利益。这种局面，使法国保教权成为驾乎于各修会的东西，而得以长久存在，又使四分五裂的局面长久地合不拢来。比照教会崇奉的“至公合一”的理想，实在是一种讽刺。

中国天主教会的种种积弊由来已久。20世纪初期，尘世的潮流感应了教会中人。这些积弊便引发了教会内部的批评。其中最

●● 刚恒毅：《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天主教主徒会，第56页，1980年版。

有代表性的是英敛之和马相伯。●

以创办《大公报》而得时名的英敛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最感愤怒不平的是同为上帝子民，外籍传教士可以谈爱国，中国神父和教友却不能谈爱国。1917年，英敛之作《劝学罪言》，以爱国为论题发问说：“前岁比国被德残毁后，该国枢机主教某公，● 发出勉励国民书一篇，反复比喻，谆谆以爱祖国为训，至理名言，无论有识无识，莫不痛感。至于我国宣道者，从未闻有提及爱国者，或有之，吾未闻也。岂圣教道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真欲索解人而不得矣！”● 这种反差，使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盛赞自己的宗国变得难以忍受：“法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法，意德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意德，……演出形迹，使其人竟如虎伥，使其教竟同罪藪。”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些话说得很沉痛；作为一个教徒，这些话又说得很尖锐。

-
- 英敛之：名华，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1867年生于北京西城，满洲旗人。1888年奉教，早年在教会中任职。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提倡新闻道德，争取新闻自由，抨击社会弊端，倡导社会改良。1913年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辅仁社，招收教中弟子研究国学。1926年去世。教廷颁发圣大額我略骑尉爵位。

马相伯，亦名建常，改名良。1840年生于江苏丹徒，其祖先在明末已经奉教。1862年入耶稣会初学院，31岁时晋铎。6年以后还俗退出教会。先在李鸿章幕府任事，后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和长崎领事，又入朝鲜襄助改革政事。1898年回到教会，退隐青浦佘山。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于徐家汇。二年以后另筹复旦公学。晚年刊行明末教会先贤遗著，并著文指斥军阀，反对内讧，培养民德，促进民治。抗战爆发以后，坚决主战，1937年3月任国民政府委员。“七七事变”后，西迁桂林、云南，1939年11月4日逝世于越南谅山。时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共领导人也致电表示哀悼。

- 指比利时曼西埃总主教(Card. Mercier)，比利时天主教会重要人物，驻节比利时马林(Malines)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曼西埃面对德军占领，不畏强暴，公开谴责德军侵略行径，在天主教界有崇高威信。
- 英敛之：《劝学罪言》，转引自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81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与英敛之相比,马相伯出身于天主教世家,因此也更能洞悉教会中的华洋之异。天主教历史学家方豪曾提到他去徐家汇访问神父住院,徐宗泽神父指着一排三楼朝南房间对他说:“马相伯、眉叔兄弟原住朝南的两间,某年,有外国修士来华,会长命马氏兄弟让出,迁往朝北房间;眉叔其时也是四品修士,因愤于中外修士待遇的不平,便毅然退出。”

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弟弟身上,但哥哥的感受会同样深刻。因此,马相伯一生奉教热忱,但心底颇厌恶外国教士。20世纪初期起,即竭力提倡本国神职治理本国教会的主张。他说:“西国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①由于西方传教士漠视中国文化,因此,由他们提携教化出来的中国神职人员在学问和文字上都不如人意,他们“中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传教之士,学问不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②这些话评论的是传教士的素质,而触及的是西国教士垄断教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不伦不类。西方人向中国人传播教义,但又老是希望接受了教义的中国人与他们一样西方化。于是,奉教的人们便处于一种夹缝之中,英敛之在同一题目下议论说:

“本国人不通本国文字,何以接人?何以应事?论其效果,不过自绝于高尚社会,自屏于优秀人群而矣。此等是非最易了解,尚何足辩?惟我中国奉教人,独受其毒,处于不中不西夹缝中,故成此非驴非马之种类。一言及

① 方豪:《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和思想》,(台)《民主评论》第205—207页,第6卷第8期,1955年。

② 《马相伯文集》,《代拟反对孔道请愿书五篇》第139页,(台)文海版1972年。

中国学问,则鄙薄之情,竟成第二之天性;再问其西国学问,则答以中国无此语言,足以译之。……因察教中最为我国上等社会第一口实,则为不尚学问之一端;而不尚学问之弊,则由我当权者量狭智昧,不知以大体为计,不能以圣教会之心为心,以致人才消乏,百事隳堕,自处于劣败之数,此无能为讳者也。”●

在另一方面,这些用激烈的言辞批评天主教会现状的人们抱着一种明显的亲切感热心搜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留下的遗著,并一一刊行。这些东西之所以令人感到亲切是因为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还没染上 19 世纪以来西方人的民族优势感。利玛窦那一代人既忠实于上帝,又具有足够的睿智和度量。因此,他们并不想把上帝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其传道之际,多取径于教义与儒学的沟通,在渐进之中,不仅获得士大夫的友情,而且进入了宫廷之中。经历了 19 世纪民族伤痛的那一代人,回过头去反观这些东西,当然很容易感到一片亲切。马相伯在为英敛之重刊《主制群征》一书作序时说:“吾友英敛之自幼求道,弗得弗措。年至弱冠,始得此书,乃惚然于加特力教所称天主即万有真原、万民父母;一身之父母不孝事,犹不可以为人,万民之大父母不孝事,乃曰:‘此科学也,此哲学也!’学云学云,非学以为人乎?以不孝倡天下,孰如此甚!因拟重刊汤著以救正之。”●《主制群征》一书出自汤若望之手,是明清之际外国传教士的作品。但英敛之之皈依天主教,却以此书之力为多。时至 20 世纪初期,马相伯又认为此书比 19

● 英敛之:《劝学罪言》,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 309—310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

● 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 1 期,第 35 页,1974 年。

世纪以来的传教作品更能打动人心。这些言论无疑在古今对比中包含着明白的褒贬,同一类被重刊的著作还有《灵言蠡勺》、《辩学遗牍》、《七克》、《名理探》、《利玛窦行迹》等等。

由此延伸,中国天主教会人士还致力于对天主教在华传教历史的研究。在这方面有过杰出贡献的是陈垣。陈垣早年与英敛之、马相伯相交。1917年,他完成了《元也里可温教考》一书,引用汉文资料,考定“元史”中的“也里可温”即为基督教,对于“也里可温”的戒律、人数、人物、军籍、徭役、租税及碑刻之数量;均有系统的论述,● 为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别开生面。以后他又陆续发表《浙西李之藻传》、《基督教入华史略》、《再论遵主圣范译本》、《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论西洋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雍乾奉天主教之宗室》、《汤若望与木陈忌》等等撰作。陈垣的教会史研究,使人看到了天主教与中国人往来中的兴衰之迹,陈垣说:晚明之世,“当时名士高僧攻教虽烈,而天主教并不因此少衰。”“顾何以康熙以后,天主教大不如前,别有原因在。先是利玛窦派以为中国人尊孔敬祖,与崇拜偶像不同,可以通融办理。而龙华民则反对甚力,其后他会教士至者渐众,大都不通汉学,力斥耶稣会士之非,遂以其事讼于罗马。教皇先后派钦使铎罗、嘉乐来华查办。二人皆不谙汉语,何论汉学,故贸然判定尊孔敬祖为异端,不许通融。”● 于是,天主教遂为朝廷所疑忌,为士民所排拒。这些结论,印证了英敛之、马相伯重刊明清之际天主教旧著的立意。但由于它们是研究历史所得,又具有更多的说服力。

此外,英敛之那一代人还以天主教比新教,指出前者不喜用学术奖掖,而后者则广播文化。由此造成的差异在20世纪初期已非

● 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57页,中华书局1980年。

●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第88—90页。

常明显。根据美国学者杰西·卢茨的统计,20世纪20年代以前,新教有三十余所大学,而天主教仅有的三所大学都是在20年代以后出现的。● 比较起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更喜欢接纳新教。因此,英敛之与马相伯曾于1912年联名上书罗马教皇庇护十世,敦请派遣高才硕德的教士,来中国设立公教大学:

“乃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即以北京而论,我圣教不独无大学也,无中学也,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甚巨,只可招教外人求学而已!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而已!前清亦尝以京师大学堂托我传教士矣,詎竟辞不受,致使耶稣教人代之;由是该教生徒,自旧清已跻政府,于今更盛,而我教独见摒焉;……倘我罗马圣教,不我遗弃,不终莫然置之于异教人之手,则望多遣当今博学良善而心谦者,广为师傅,其奉遣之人,能不拘何国,不限在会,似更相宜。倘拘定一国,则政治家视为国教,而启猜疑;倘限定在会,则不但会与会此疆彼域,猜忌争权,且人性喜同恶异,往往视不在会者如征服之国民,不巷议则腹诽,防御之惟恐不严不密。这就同会而不同国者之感情而推而得也。其有扶持之义,广扬之道,尚待言乎?但一国之广扬,以往例今,端恃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为一家之内,贵有能自食其力者,万不能专恃外债以生存也,明矣。”●

● 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第506—50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 马相伯、英敛之:《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辅仁生活》,1939年第2期。

他们希望天主教能够在中国重建声光,但天主教在中国的声光只能实现于“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而“万不能专恃外债以生存也”。公教大学的宗旨正在于此。1912年,英敛之受托主持香山宜静园女学女工,次年,他在宜静园成立“辅仁社”,招收教中子弟二十余研究国学。马相伯、陈垣诸人往来北京,一同指导,所拟的研究习题有《太古中西同源考》、《元也里可温教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贤著述辨》等等。“辅仁社”的规模不大,但毕竟开辟了教中人士研究国学和教会历史的先声,于是而有后来的辅仁大学。

天主教有许多地方讲到平等与博爱。当教会与保教权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教义中的这些东西常常被西方民族的优势意识所淹没。但这些东西的存在,又终究提供了一种眼光,使人可以越出保教权和母国的利益,去真实地观察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当教会中的中国人以批评表达自己的反思和忧思时,西国教士中的有识者也在以批评表达自己的反思和忧思,其中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Frederic Vicent Lebbe 1877—1940年)是最有声望的一个。^①雷鸣远于1901年3月抵达天津,其时,庚子事变刚刚过去,教会中的人们正在追叙教友殉难的事迹,而雷鸣远却更多地注意到了另一面。他在一封家信中提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欺压,并非

① 雷鸣远(Frederic Vicent Lebbe 1877—1940),字振声。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早年人巴黎遣使会,1900年抵中国,同年晋升为神父。奉派在北直隶区传教。1905年因宣教成绩卓著被林懋德主教升为涿州总本堂神父。他将教堂中代表法国保教权的法国国旗扯下,换上清朝龙旗。1912年,雷鸣远被调往天津,在津创办中华公教进行会,倡导中国自己办教会。1915年,在津创办《益世报》,后被教会当局放逐到嘉兴传教。1920年一度回欧洲。1926年再度来华,创立耀汉小兄弟会。抗战爆发以后,参加抗战,组织医疗救护队,转战华北各地。1940年因与晋察区边区发生磨擦,被八路军所俘。一个多月后获释,同年病故。(《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第22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

常不平地说：“欺压的原因是这个民族的颜色与我们不同，……我们军队所过之地，血流成河，劣迹昭彰，所作所为，迫使外教人发出恐怖的惨叫，使他们向教友说，外教人总没有做过这种事。”^① 由于教会与殖民主义纠缠在一起，因此 19 世纪中叶以来，几代传教士的努力，留下的仅仅是一种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深深的隔膜。1902 年，雷鸣远在升神父之前向主教坦诚直言：

“在这里，事实上我们造成了一个外国身体的教会，天主教地区像一个小的殖民地，我们跟中国人民没有联系也无法联系，……在传教士与教友间有一道鸿沟，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觉和我们都不同。……想象一下当西太后散步到了煤山，当她看见北堂时会怎么想，她说：‘这是我的地方吗？’或是说：‘不，这里隐藏着外国势力，所以他们能够用加农炮来控制我们。’”^②

他追问说：“难道教会不知道这些是错的吗？难道不应该有所改变吗？”这个问题是他向教会当局提的，也是他向自己提的。因此，从 25 岁开始，雷鸣远即努力地研习中国文化，学经史百家，读国文，为之殚精竭思，并在初任涿州总堂神父之日，即将教堂中代表法国保教权的法国国旗扯下，换上了中国的龙旗。在那个时候，这些举动使教会中的一些外籍教士和主教为之侧目。

辛亥革命之后，雷鸣远被调往天津。在那里，他结识更多的中国教友，也更深刻地看到了教会的积弊。在他主保庆辰^③ 的那一

●●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台中耀汉小兄弟会编译，第 34、38 页，1990 年。

● 每个天主教徒在领受洗礼时，都选择一个圣人做自己的主保，教会在年历中排定这些圣人的纪念日期。对信徒来说，其主保庆日的意义就等于一般人过生日。

天,雷鸣远备了一桌酒席,请教中领袖来赴会。大家都来了,可是谁也不敢坐。因为历来的规定是,外国神父吃饭时,一般教友只能站在一旁看。雷鸣远恳请大家坐下。据后来他的回忆:“席间英敛之哭了起来,他可不是轻易爱哭的人,他是一个很高傲要强的人,要他的眼泪,非受特别大的刺激不能!他哭着说:‘中国教会可称开了新纪元了,我们今天才知道天主教会是怎么一回事,真是另一个时代了。’”^①从此,雷鸣远和英敛之就结成莫逆。作为一个异国传教士,雷鸣远在天津期间并不以传教自囿。他所筹组的中华教友联合会、中国社会改良会、中华公教进行会、女子公教进行会以及他所参与的《广义报》、《益世报》等等,都有为中国社会谋改良之心。在八十多年的天主教人物史中显出了一种明显的博大宽阔。

而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则是雷鸣远在“老西开”事件中与法国人的公开对抗。老西开位于天津市郊,与租界毗邻的一块荒地,法国久有覬觎之心。1915年9月,法国领事突然发出传单,视老西开为管地,通告附近居民向工部局纳捐,引起国人抗议。稍后,法国人修桥筑路,又派兵巡逻。雷鸣远极愤法国人的霸道,遂请天津警察局设岗于老西开。法领弄清原委之后特请主教陪同质询雷鸣远,经雷鸣远据理驳斥后忿忿而去。事后,雷鸣远致函法国驻北京公使孔蒂(Alexandre Maurice Robert Conty):

“在天津公使先生希望扩展法国租界。……中国在无力抵抗下,只有接受这更坏的处境。为了了解中国的反抗和痛苦,只须回忆刚果事件就够了。在数年前,我们把刚果割给德国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据说那次

● 陈方中:《民国初年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运动》第63—64页。

事件曾是法国激起爱国心的原因之一，……我看不出这件事(老西开)与刚果的情形，有大的分别。公使先生，您知道吗，为攫取老西开的这小小一块土地，给法国引来多大的仇恨？”●

这些话使法国公使勃然大怒，雷鸣远也因此被迫离开了天津。但事件并没有结束。1916年10月，法国兵悍然开进老西开，同时法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将老西开三十余亩土地划为法租界。天津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竟申明支持法国的行动。雷鸣远在获知以后愤怒地说：“假如我是个老百姓，我会卖掉所有的一切，为买炸弹和子弹，而死在老西开。但因为我是神父，……宁愿死在罗马，也不愿在罪恶前缄口不言了。”● 在他的建议下，天津爱国士绅组织的法租界的全面罢工罢市，并在经济上抵制法货；机关、电厂工作的中国职员都拒绝上班，商人不做生意，工人不做工，巡警不巡逻，法国家庭中的佣人全部辞职，租界陷于瘫痪。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法国公使孔蒂被召回国，代理公使允诺归还老西开的土地。而雷鸣远则被巴黎遣使会总会从华北调往人生地疏的嘉兴。无疑，在教会当局眼中，这是一种惩罚。

老西开事件不属于宗教事务，但由此引发的却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分歧。站在雷鸣远一边的还有汤作霖(Cotta)神父。● 汤神父以请愿的形式向罗马教廷报告了中国教会内部的不公正。天津教

● 陈方中：《民国初年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运动》第63—64页。

●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第147页。

● 汤作霖是生在埃及的希腊人。1891年19岁时入巴黎遣使会总修院，与雷氏相识。晋铎以后到非洲马达加斯加传教，他提倡本土化的宣教方式，在岛上学习当地语言，赤足走路，行止如当地人。1906年4月在雷鸣远邀请下来中国传教。

区 29 位神父中有 19 位签了字。

1917 年 3 月,雷鸣远被远调到地生疏的江南嘉兴。不久,到绍兴任总本堂。9 月,他给当地主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系统地谈到他的一些看法:(一)“关于教徒爱国”,“爱国对于欧洲教友是一种德行,对中国教友也应是一种德行;为什么在欧洲神职界是光荣的事,在中国神职界就成为一个缺点呢?”(二)“关于提升中国籍神职人员”,雷鸣远认为天主教的普遍原则是建立本地教会,外籍传教士不应等待罗马的命令,相反应带头推进本地化运动。”“第一步必须推荐本地主教,如果没有我们的推荐,罗马是无法成立教区的。”(三)“关于保教权”,雷鸣远认为,无论为了法国的利益,或是教会的利益,都应该废止保教权。最后,雷鸣远请求主教“不要用法官的眼,而要用慈父的心”来省察他的立场。^①

在雷鸣远看来,要废除法国保教权,提升中国籍神职为主教,应着眼于中国与教廷直接通使。1920 年,雷鸣远跟随光若翰回到欧洲。这年 8 月,他在弟弟迫达神父和瓦内维(Mgr. Vanneufville)教卿的介绍之下,晋见了比利时曼西埃枢机主教。9 月 9 日,雷鸣远向曼西埃枢机写了几位优秀的中国神父的名字,他们中有赵怀义、程有猷、成和德和宁波的徐神父。12 月 16 日,曼西埃致电让雷鸣远去罗马。12 月 20 日,传信部部长王老松(Card. Von Rossum)枢机主教^②约见了雷鸣远。王老松表示:虽然有很多人反对祝圣中国籍主教,但必须走出这一步。而且第一批祝圣的中国主教在品德和才能上都要超出平常人的水平。12 月 27 日,教廷国务卿嘉斯巴里约见了雷鸣远,指出要派遣宗座代表前往中国的必要性。

^①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第 210—219 页。

^② 王老松(Von Rossum),荷兰籍贻世主会士,曾任贻世主会罗马神学院院长,兼教律法典编辑委员。1911 年升任枢机主教,1918 年教宗本笃十五世任命他为传信部长。

12月28日,教宗本笃十五世接见了雷鸣远,教宗通过雷氏向中国灾民捐赠十万里拉金钱,同时教宗排除所谓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素质低下的看法,并说他已经给了传信部部长有关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名单。

1921年1月27日,雷鸣远怀着欣慰和信心离开了罗马。不过,直到一年半以后,教廷才向中国派遣第一位宗座代表;而首批中国主教的祝圣,则是五年以后的事情。

三 刚恒毅来华及中国籍主教的任命

1919年11月,罗马教廷向全世界教会发布了一个通谕,由于其行文以“夫至大至之任务”为起首,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遂被称为“夫至大”通谕(“Maximum illud”)。这道通谕,阐发的当然是一种普遍的意义,但其中许多地方却富有针对性的切中在华天主教会的积弊。通谕说:

“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先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而陶养之,建设之。因本地司铎与本地人民、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地人心,当何等惊奇耶?且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输诚服,加以地方上又可随便进出,往往为外国司铎,欲置足而不能者矣。”^①

通谕认为,一个在异国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人应当置父母之邦的利益和光荣于教会之下:

^① 《教宗本笃十五世通谕》,《马相伯文集》第231—235页,(台)文经出版社影印。

“假如见有传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权威出乎中道之外而伸张之，母国之光荣加千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用功极猛之疫症。……夫传公教，而欲名实相符，詎可如此？然当常自回思，万万不为本乡邦族，实乃为基利斯督效其使命，必如此立身行己，足使人人一无犹豫，即深信其为教会之有司也。”●

教宗在通谕中提到了两名传教士，即拉斯·卡萨斯(Casas)和沙勿略(Francis Xavier)，前者为多明我会派往美洲的会士，专以捍卫困苦无告的印第安土著为己任，曾著《西印度毁灭史略》，控告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后者是来亚洲的开教之祖，创立了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基业。教宗在通谕中号召全世界的传教士追随他们的榜样，将天主教扎根于本地社会之中：

“适宜地培养教育本地的神职人员实属刻不容缓，倘欲产生预期效果，给他们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作为外籍教士的助手；欲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受管理教会的能力。”●

通谕强调的这些内容，与 20 世纪初期来自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的批评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印合，这种印合里显然有着英敛之、马相伯、雷鸣远、汤作霖历次上书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罗马教廷

● 《教宗本笃十五世通谕》，《马相伯文集》第 231—235 页，（台）文经出版社影印。

● 施省三：《六位国籍主教在罗马祝圣七十周年》，《公教报》1996 年 12 月 6 日。

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总枢。它所代表的“基利斯督之邦国”是一种上帝的权威,在这种权威面前,当然容不得由强力所派生的民族国家的权威。因此,“夫至大”通谕所反对的民族歧视未必与中国人自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同出于一个源头。但由此产生的平等之义却与中国教会内部正在出现的反思与忧思明显地有着共鸣和呼应的一面。

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天主教会是由法国代管的。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就教规和教义来说,这都是一种不成章法的局面。其间,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都不止一次地有过直接通使的愿望和行动,但总是被法国人中途阻梗,可望而不可即。自“夫至大”通谕之后,教廷终于下决心打破这种不成章法的局面。1922年,意大利人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①受命任宗座代表,远越重洋来到中国。

当刚恒毅受命出任驻华宗座代表的时候,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因此,启程前的一段时间,大半消磨在传信部的资料室里,以亟亟吸取有关中国的各种知识。除此以外,他心中有的便是教宗和教廷的若干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是:

- “(1)宗座代表的性质为纯宗教性质,不带政治色彩;
- (2)尊重中国政府,绝不以任何外国利益服务,宗座代表只代表教宗;
- (3)教廷不干涉政治,有时政治走入了宗教范围,教

① 刚恒毅,字高伟,1876年生于意大利伍地纳省。早年贫寒,16岁时入修道院,并入罗马大学就读。1899年升神父。先后任公高地亚及亚奎莱亚总本堂。1920年任阜姆(Fiume)代理主教,次年升领衔主教。1922年被教宗任命为第一位驻华宗座代表。在任期间,推进本地化运动。1933年离华。1935年被任命为传信部秘书长。1952年被册封为枢机。1958年去世。

宗也偶然办政治；

(4)教廷对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式的野心,中国应该属于中国人。

(5)天主教是普世的宗教,主教的人选,应从本地人中去选拔。外国传教士在结束开辟教区、培训神职以后,要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新的教会。”^①

刚恒毅于1922年11月抵达香港,经由上海抵达北京。有人建议他请法国公使引见中国总统黎元洪,但他宁愿由北京教区辅理主教陪同觐见了黎元洪。此后,他巡视了华北、中南教区。同一时间里,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了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详细了解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同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乱、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庚子事变及八国联军入侵的经过,以及由这些屈辱的战争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刚恒毅既看到了中西交往过程中中国人曾经有过的“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不了解西方的进步”的一面,也看到了西方人“在中国常以主人自居,他们有自己的法庭,不受中国人的审判,他们掌握关税,这是财源的大部分,还驻有军队”的另一面。而在20世纪初年,前一面已趋淡化,后一面却变得显著而且醒目。他记叙自己坐火车从北京到山海关的情形说:“头等车厢几乎坐满了大吵大闹的外国兵。在车厢里的中国人,默默无语。但是我看得出他们心中的感受,在自己家中被视为外人,当然愤愤不平。”^②他的同情显然在中国人一边。所以,当刚恒毅结束巡视回到北京以后,在使馆区外建立了自己的公署,期间,有人建议他将公署迁往使馆区内,他回答说:“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

^{①②}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第56—57、84页。

权的外国堡垒形的东西。它的由来是 1901 年拳乱之后订立的条约。主要的使馆都在里面,四周围着高墙,在墙垛上架着机关枪。这个地区构成了一个可耻的纪念品,招惹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自然地,早晚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中国人也赞赏我这种观点。”^①这些话至今读来仍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因为它们表达了一种宗旨和立场,显示了他不同于 19 世纪以来由保教权护送到中国来的教中大老们。

作为罗马教廷的代表,刚恒毅来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天主教的远播,但对中国天主教会来说,又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否定。因此,刚恒毅在中国的思考常常更接近中国社会。在保教权的庇护之下,不仅教会拥有很大的特权,而且许多外籍教士为了既得的权益不愿意建立本地化的教会,以至当时教会中没有一名中国人当主教。刚恒毅说:“我们在中国已经三个世纪,整个教会圣统是外国人的。我看到,五十位分散在中国各地的主教,都是外国人,显然都是修会会士。基督的意愿是这样的教会吗?天主教会在中国人眼中成了进口货色,而且常与外国政治利益有关系。”^②上个世纪来华的传教士把上帝介绍给中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中国人与上帝靠得比他们更近。这种矛盾使中国人不能成为中国教会的主人,天主教也因之而始终是一种客教。客教只是浮泛的东西,像水面上的泡沫,容易出现,也容易消散。因此,为了使中国人归基督,首先要使中国天主教会归中国人。自英敛之、马相伯以来由下而上的改革教会的议论遂因刚恒毅宗座代表身份而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行动。

1923 年,刚恒毅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的筹备会

①②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第 107—108、47 页。

议,五大传教区的中国籍、外籍神长 23 位出席此会。会议汇集各大传教区议案,并讨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和国民革命运动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对教会的影响问题。^①

1924 年 5 月至 6 月,刚恒毅在上海召集 42 名主教、5 位监牧和苦修会会长,13 位传教区代表,各修会代表 24 名以及中国神职人员多名举行了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一次主教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其决议第一次以教会的名义公开申明“决不可让脑筋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耀于大众之前”^②。并明白地强调“本地神职人员只要有资格,决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大会且有更远大的希望,并期望其尽可能早日实现,即由本国神父担任选任主教”。为了使这次大会充分显示合一色彩和宗教色彩,参加会议的主教和代表虽分属各国,但只准使用教会中共通的语言——拉丁文,各国公使和领事亦未被邀请与会或列席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将中国的传教区域重新划分为 17 个大教区:即蒙古、东三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苏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黔桂滇教区。

此后,由刚恒毅发议,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他先从北京教区中划出一区,成立新的宣化教区,从太原教区中划出汾阳教区,从宁波教区中划出台州教区,从南京教区中划出海门教区。^③ 随着各新教区的成立,四位中国神父被任命为主教,两名中国监牧升任为正式主教。他们是:(一)宣化教区主教赵怀义,圣名

① 倪蘊辉:《刚总主教与上海会议》,《刚总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罗马传信大学中国学生会编。

② 《圣教杂志》第 13 年第 7 期,《中国全国主教公会议专号》1924 年。

③ 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第 83 页,台南闻道出版社 1980 年。

雅各伯，北京长辛店人，生于 1878 年，早年入北京北堂小修院，1904 年升神父，长期在遣使会北京教区服务，并担任毓英中学校长。刚恒毅来华以后，任宗座代表秘书。(二)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1875 年生于山西潞城，早年慕方济各之苦行，入方济各会继续修道，1903 年升神父，在太原忻县传教，1911 年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1921 年任临县总铎区总本堂，是太原中国籍神职界领袖。(三)台州教区主教胡若山，1881 年生于浙江定海，祖先十二代均为天主教徒，幼时入定海小修院，曾在修院中指导外国修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09 年升神父，一边传教，一边在宁波大修院中讲授哲学。(四)海门教区主教朱开敏，圣名西满，1868 年生于上海董家渡，早年入董家渡小修院和徐家汇大修院，后入耶稣会初学院，1898 年升神父，并在上海浦东、江阴后澄常熟鹿苑传教达 20 年之久，1924 年任江苏南通总铎区总本堂，次年兼任海门区总本堂。(五)由蠡县监牧升为主教的孙德楨，圣名默尔爵。生于 1869 年，1897 年升神父，他的拉丁文在当时中国籍神父中是首屈一指的。1901 年以后，他在北京北堂小修院中讲授拉丁文达 12 年之久，后又在天津、仓县、京东等地传教。因学识丰富而被选为主教。(六)由蒲圻监牧升为主教的成和德，圣名奥多利各，湖北襄阳人，幼时入方济各会，尤长于圣乐。据说他出任蒲圻监牧是由于汤作霖的推荐。●

1926 年 2 月 28 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发布了《教会事务》(Rerum ecclesiae)通谕，再次重申了前任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夫至大》通谕中阐明的思想。他指出：“从古代基督教信仰的文学遗稿中可以看

① 《赵主教怀义事略》、《陈主教国砥事略》、《胡主教若山事略》、《朱主教开敏事略》、《孙主教德楨生平所记》，(台)《恒毅》月刊，第 2 卷第 4 期。成和德事见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 376 页。

出,由宗徒为每一个信友团体所任命的领导人,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从他们生长的国家中拣选的。”这是教会初期的惯例,因此,教宗命令将修道院向本地人开放,不应视本地神父为传教士的助手。通谕总结说:“如果指示得以实施,将来便不会缺乏能够管理的堂区和教区的本地神职,而这将是天主所悦乐的。”●

1926年9月,刚恒毅偕同朱开敏、胡若山、赵怀义、孙德桢、陈国砥、成和德启程赴罗马参加由教皇庇护十一世亲自主持的祝圣大典。抵达次日,即受到教皇的接见。10月28日,祝圣大典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共襄盛举的刚恒毅在其回忆录曾记录了这一声光动人的历史时刻:

“早晨六时,人群涌入了大殿,……右边高处是罗马贵族席,左边是外交使团,殿内两旁是教会首长,以后是修女、群众。祭坛上的蜡烛都点燃了,照耀着大理石闪闪发光。……突然,大殿入口处侍卫队号令传来,全殿立即肃静,当教皇驾到时,正祭台的灯和殿顶上的灯大放光明。抬轿的人都穿着红锦缎制服抬着教皇的御轿。瑞士士兵、贵族侍卫队在前徐徐而进。教皇的后面是新主教及其随员。……教皇的祭服是辉煌耀目的,戴着镶嵌宝石的高冠,登上祭台,在大弥撒礼中祝圣六位新主教。青年歌咏团天使般歌声的衬托使仪式更显得引人入胜。新主教伏在地上表示服从,再由教宗手中领油和牧杖,教皇分施圣礼时,又把金冠加在每位主教的头上。新主教则向教皇献上两个饼,两瓶酒,金色器皿在明烛辉耀下构成一幅美景。在优美动人的低音歌声中,教皇在每位主教

● 施省三:《六位国籍主教在罗马祝圣七十周年》,《公教报》1996年12月20日。

面颊上施以平安礼。典礼中最动人的是弥撒礼成以后，新主教坐在伯多禄的宝座下，静听教皇的训言。这几位头戴金冠的亚洲人，平日很少有表情的面容，现在却大为感动……”^①

持续五个小时的祝圣大典才结束，六位新祝圣的中国主教就从祭台走向大殿外的广场，向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祝福。从比利时赶来参加盛典的雷鸣远跪在宣化主教赵怀义的面前祈求降福，两人都感动得泪洒满襟。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享受最大的幸福，不会说话，也听不见人说话，七窍不通，完全白痴，想不到享福享到最深处，竟什么也不觉了。”^②

对比清代初年，罗马教廷公布了对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的任命以后，不少外籍主教竟以中国人不胜此职而不愿为之祝圣。1926年，这六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的声光动人确乎表现了中国天主教中的今昔之不同。

自“夫至大”通谕颁布以后，教廷重新考虑英敛之、马相伯在中国开办天主教大学的建议，并委托专人来华考察，后赞同这一建议。1923年2月，教皇庇护十一世捐赠北京天主教大学开办费十万里拉。不久，美国本笃会联席会议主席兼圣文森会院长司泰来（Aureliues Stehle）和本笃会士奥图尔博士（Dr. Barry O'Toole）受教廷之托来华，筹措办校事宜，以逊清载涛亲王之府邸为校址，辅仁大学的建校工作遂正式展开。1925年7月建成预科。聘英敛之为社长，仍沿用“辅仁社”之名，亦称国学专修科，专为教中子弟而

①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第347—348页。

② 陈方中：《民国初年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运动》第188页。

设。英敏之逝世以后,由陈垣接任,并按当时教育部规章,增添科目,并组织了辅仁大学董事会,辅大由此而初成雏形。

设立天主教大学虽是教廷的成策,但教会留恋旧法的人并不以为然。据刚恒毅回忆,1925年本笃会士来华时,他将消息告诉北京法国遣使会林主教和富主教,两人“心里不乐意”。随后他又将此事通知法国公使,“他表示有点不满,但是,仍不失君子之风作了一个不得已的笑脸”。与首创此议的英敏之、马相伯相比,这些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消解的隔阂。刚恒毅也是西方人,但他对于辅仁大学的期望却与中国人一样热切。1929年,刚恒毅在辅仁大学新校舍奠基典礼上说:

“一个民族复兴的所有危机,是思想方面的。外在社会组织的革新,首先应是内在的革新,是精神上的革新。这座大学愿意作高深的文化工具,愿对中国的复兴有所贡献。……中国目前正由根基而起革新,我们希望这个伟大的民族能够突破目前的混乱骚动的局面,能快速完成复兴大业。”^①

这些话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民族的前途的关怀和祝愿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围。于是,以宗教为源头的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演绎出了更广泛的意义。

据中国天主教历史学家徐宗泽神父于1935年的统计,由中国籍主教管辖的教区已达23个,列表如下:^②

①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第139页。

② 徐宗泽:《近十年来天主教在我国之状况》,《圣教杂志》第24年第8期,1935年8月。

广东	浙江	湖北	四川		河南	江苏		陕西	山西	山东	河北			蒙古	省份							
广州	台州	蒲圻	雅州	万县	顺庆	驻马	南京	海门	凤翔	周至	洪洞	汾阳	阳谷	临清	永年	宣化	保定	赵县	安国	集宁	赤峰	地名
杨福爵副	胡若山	张敬修	李容兆	王泽溥	王文成	王伯禄	于斌	朱开敏	王道南	张指南	成玉堂	刘锦文	田耕莘	胡修身	崔守恂	程有猷	周济世	张弼德	孙德楨	樊恒安	赵庆化	主教名
一九三一	一九二六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二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二	一九三二	一九三〇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三	一九二八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二六	一九三三	一九三二	祝圣年

虽然中国籍主教区在全国一百十数个教区中只占五分之一弱,但对比 1922 年刚恒毅来华之前无一中国籍主教区的情况,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同一时期,中国籍的神父和修女也是相应地增加。鸦片战争时期全国天主教神父共约 130 人,1900 年增至 470 人,从 1920 年起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 963 人。经过有意识的培训和提拔,到 1930 年中国籍神父已达 1500 人,到 1933 年达 1600 人,与此相应增加的中国籍修女到 1933 年达 3600 人。^①

在缓慢的本地化进程中,天主教会的修院和国籍神职班也有所增加。据 1934 年刚恒毅离华以后的统计,120 个教区中现有大修生 1000,小修生 4000,修院 120 所。总修院有 12 处,分别是:河北、北平、山西大同、山东济南、兖州、上海徐家汇、湖北汉口、江西九江、四川成都、浙江宁波(鄞县)、河南开封、河北宣化和香港的南华总修院。从 1923 年至 1931 年,刚恒毅亲自派遣 47 位修生赴罗马传信大学进修,包括后来成为高级神职人员的于斌和罗光,所有证书均由宗座代表公署发给^②。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3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② 罗光:《刚总主教与传信部大学的中国修生》,《刚总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1928年,刚恒毅创设了第一个由中国籍神职自行管理的修会——“主徒会”。此事由刚氏委托宣化主教赵怀义办理,但赵在1927年去世。1928年,程有猷主教继任,在宣化城外购得背山面河、清静远俗之地百亩,大兴土木,同年秋,“主徒会”正式成立。此会定名主徒,取意耶稣复活以后,二位宗徒赴厄马乌,路遇耶稣,挽留耶稣,及耶稣分饼为二位宗徒归耶路撒冷宗徒聚会处之全段故事。此会暂属教区主教下辖,待成熟以后将直接隶属教宗及传信部。创建初期,由西班牙救世主会协办,待基础稳固以后将完全由中国人管理。

与此相应,在传教方式上,刚恒毅的见解表现出一种向利玛窦回归的趋向。他认为,基督教原本起源于闪族,后来吸收了希腊的哲学语言以表达自身的神学思想。基督教来到中国、日本和印度以后,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因此,天主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存在着沟通的可能:“天主教面对中国人,不要只用西方经院派的那种理论的形式,也要用中国哲学的那些形式。……我们并不想把中国思想‘欧化’,只愿使它‘基督化’。这种尝试是绝对可以实行的”。是以,“传教士应有一点适应精神,应该尊重中国文化和善良风俗。圣保禄说:‘我们应当让别人快乐而非我们。’”[●]以此立论,则可以走得比利玛窦更远:(一)经文的本土化:刚恒毅认为佛教的经文非常美妙,值得天主教借鉴。比如“南无阿弥陀佛、救世救人慈悲之祖,弟子诚心诚意求赐重生净土,大慈大悲菩萨救我脱免尘世劫数,请照顾我,犹如水中之月的诚心”之句,“假若以基督之名代替,我们也可以诵念”;(二)隐修院的本土化:刚恒毅访问过中国的一个佛教寺院,僧人开门很有礼貌,餐厅里有四十多个剃光头的学生,默默地念经和吃饭,很像天主教会里的修士,

●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第391—392页。

“假若将有一天在中国也盛行隐修院的生活,也不必把西方的方式搬过来,因为有了现存的一切。只要把启示的真理带来就够了。把他们祷告的佛及其他神祇的名以他们不知的天主之名代替”。●

(三)供品的本土化:刚恒毅很注意地看到教外人向观音菩萨和其他佛教神祇摆的供桌和供品,不同于天主教信徒摆的西欧式的供桌和供品。他也注意到了外教人的供桌和供品与天主教的主要特征非常相似,一具雕像,一张桌子,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仅把神像更换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其他部分?宗徒们曾经接受了罗马富于文化气氛的陈设与方式,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国也这样做?”●在这里,宗徒保禄的“为一切人而改变一切”的原则与中国传统“入境问俗”的古训是一致的。

尽管如此,20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仍然是比较缓慢的,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本地教会标准。相当多的外籍教会人士对改革抱有抵触情绪。然而,这个过程毕竟减弱了天主教会在19世纪所带那种过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而增多了宗教本身应有的肃穆和感化力。后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从另一个方面打断了这个进程,使有志于教会本地化的人们所预想的境界无法实现。但刚恒毅留下的一段话,还可以使人们想见他们的憧憬:

“传教士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并没有这样的职务,要把欧洲的文化,移植到传教地区去;他却应该使那些民族,有时也许有数千年光荣文化的,准备并且合适于接受基督生活的习惯和因素,并加以吸收。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当地

●●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第202—203、170页。

的天主教徒,应该是天主家庭里的成员,是它神国里的人民;可是,他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祖国,却仍是那个国家的人民。”●

作为近百年中西交通史上的一种思想资料,这些话至今仍有可取的地方。

● 刚恒毅:《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第 331 页。

第六章 抗战与内战时期中国与教廷的关系

一 第二任宗座代表蔡宁来华

1933年2月1日,罗马教廷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离开北平宗座代表公署,转道上海,然后乘船经香港和新加坡回国。刚恒毅离任的主要原因是其右腿患肿瘤,手术后继患静脉炎,终至卧床不起。^①刚恒毅的离去,标志着自1922年刚氏抵华以后的中国与教廷的关系以及他曾经较为积极推进的本地化进程告一段落。

刚恒毅于1933年3月8日回到威尼斯,不久回罗马述职。同年3月14日,教宗庇护十一世(Piux XI)任命富玛绍尼·毕翁弟(Fumasoni - Biondi)为枢机主教,并出任传信部部长。1933年被教廷定为特别圣年,以纪念基督救贖尘世一千九百周年,是年中国和印度的教友都组成了赴罗马的朝圣团。6月7日,教宗特别接见了中国朝圣团,并致欢迎辞。同一天,教宗接见了五位中国、印度和越南的本地神职人员,其中三位是中国人,他们是绥远集宁教区主教樊恒安、河北永年教区主教崔守恂和四川叙府教区主教李容

①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第421页。

兆。另一位是印度西南部 Antivari 教区主教阿德伯提(Giuseppe Attipery),还有一位是越南海防附近的发艳(Phat - dien)教区的董主教(G. B. Tong)。6月11日,教宗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五位来自东方的本地主教主持了祝圣典礼。^①

罗马教廷任命的第二任驻华宗座代表是蔡宁(Mgr. Mario Zanin),此项谕令于1933年12月4日发布,并加蔡宁脱拉让总主教衔(Archiepi - scopus tit, Traianopolitanus in Rhodope)。1934年1月7日,传信部部长毕翁弟枢机在传信部的圣堂里为蔡宁主持了祝圣典礼。^②

蔡宁,1890年4月3日生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斯省灰尔脱莱城。早年入本教区小修院,受初等及中等教育。后入该省倍路诺(Belluno)大修院习神哲学,又赴巴度圭(Padova)城国立大学研究哲学与文学。1913年7月,在倍路诺城主教大堂晋铎。曾任该省大修院副院长及主教秘书。1922—1926年,蔡宁专门从事教会慈善事业。1926年调赴罗马传信部供职,管理出版事业。1930年升任圣伯多禄宗座事业善会之总秘书,加名誉主教衔。

蔡宁于1934年3月6日从罗马起程,经威尼斯坐船前往中国。时中国驻意公使刘文岛亲往送别。蔡宁经印度、新加坡,于31日抵香港。在港期间,他巡视了华南教务,并宣布了其来华使命:“奉教宗谕旨,及秉刚恒毅总主教既定方针,继续进行发展在华教务,使教民与政府能够继续合作,得到民族间之真正和平,使国家兴盛,促进中华公教进行会各项事业实行及发达。”^③5月8日,蔡宁抵达上海,全国公教进行会特派专人在上海迎迓。在沪期间,

①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第442—444页。

② 《宗座驻华第二任代表蔡宁总主教履新纪念册》第120页,上海公教进行会1934年12月出版。

③ 《宗座驻华第二任代表蔡宁总主教履新纪念册》第13页。

蔡宁拜会了市长吴铁城,并在秘书安童仪和沪公进会长陆伯鸿^①陪同之下,参观了徐家汇和南市的新普育堂。时沪上大报《申报》发表评论曰:

“我国外交当局,以前任教廷代表刚恒毅主教,驻华十一年,极表新睦,劳绩卓著,而持论公正,有转移欧美列强对华态度之功,加以我国驻意公使刘文岛之知照,俟蔡使晋京时,将以公使之礼优待之,国府主席,择期接见,以申谢罗马教宗对我之好感云。”^②

1934年5月14日晨,蔡宁抵达南京。上午11时,蔡宁偕秘书安童仪,南京宗座代牧区主教惠济良(Augustus Haouisee),海通教区主教朱开敏、陆伯鸿,南京总本堂神父张运之的陪同之下,晋见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致词曰:

“大主席阁下,鄙人此次奉罗马教宗庇护第十一世特派为驻华宗座代表,前来觐见大中华民国政府主席,不胜荣幸之至。谨代表宗座恭祝贵主席政躬康健、国运亨荣。鄙人此次觐见,亦愿代表中华全国天主教会,以及一百二十教区,将一切慈善文化工作,宗教道德,与夫精神上之

① 陆伯鸿:上海天主教著名实业家。圣名若瑟,其祖先由徐光启劝化奉教。他生于1875年,曾在董家渡天主堂接受宗教教育。1911年任上海市南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又创办大通航业公司。1923年在黄浦江滨建立和兴码头堆栈公司。1928年任上海南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他曾建立新普育堂、杨树浦诊所、医院、安老院,并在北京设立中央医院。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曾从事收容伤兵和难民工作,教廷授袍剑爵士勋位。同年被刺殒命(《圣教杂志》第26年第2期1937年)。

② 《申报》1934年5月11日。

努力，一并呈于贵主席之前。……^①”

林森在答辞中首先对教宗表示感谢，继而以回顾中国与罗马教廷交往的历史以表示维持这种关系的愿望：

“中国与公教之关系具有悠久之历史，公教教士，远在中国与各国树立正式关系之前，已航海东渡，为外人来华者之先驱。元代介绍中国文化于泰西者，固系一公教教士。明朝最初予中国人民西方科学艺术之智识者，亦系一公教教士。公教教会，对于中国和平进步繁荣之贡献，本主席深表盛荷，本国政府，乃将赓续其保护公教机关之安宁，以利其有益之事业，固无庸赘述者也。以贵总主教在宗教上文化上之宏富经验，及对于中国人情事务上之深刻了解，本主席深信中国政府及人民，与教廷之关系必益加增进。”^②

当天下午2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交际科科长林桐实的陪同之下，蔡宁一行拜谒了中山陵，向国父孙文表达敬意。^③

从5月29日开始，蔡宁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全国教务巡视工作。他从上海出发先抵达山东兖州、济南，后抵天津。时天津主教文贵宾、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一行前往欢迎。蔡宁在老西开大堂举行了大弥撒，并参观了天津工商学院。6月初，蔡氏抵北平以后拜访了当时的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及东交民巷各国公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6页。

② 《宗座驻华第二任代表蔡宁总主教履新纪念册》第126页。

③ 周超：《宗座代表谒陵记补志》，《圣教杂志》第23年第8期，1934年8月。

使,参观了辅仁大学、西什库北堂和北平中央医院等地。不久,蔡宁又巡视了宣化、张家口、大同。10月,他从北平南下至汉口巡视教务,同行者有秘书于斌等少数人。抵汉口以后他再去了武昌、汉阳、蕲春,乘船赴九江、安庆、芜湖,再度到达南京。11月25日,蔡宁由津浦路北上,到蚌埠、徐州,载陇海路西行至归德、开封、郑州,转平汉路北上到卫辉、正定、保定等教区视察,返北平时已经是当年圣诞节前后了。●

蔡宁来华之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对江西共产党实行“围剿”之际;在文化思想领域,国民党政府为巩固“一党专政”,强化思想控制,以提倡中国固有思想道德为标榜,倡导所谓“新生活运动”。在各地巡视教务的过程中,蔡宁以宗座代表的身份,号召各地教会要配合“新生活运动”。在武汉等地,蔡宁发表了如下的谈话:“中国民族,在文化道德各方面,均有悠久的历史。最近国家更厉行新生活运动,按新生活即新道德,这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好现象,天主教当尽量协助中华民族复兴的运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的科学主义、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颇为流行,尤其对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蔡宁在巡视各地教务的过程中,访问了许多教内教外的学校,发表了一些演说。他以提倡“天主教道德”为主旨,指责了上述的思潮:“以哲学史眼光看去,现代思潮之演变,愈趋愈下,唯理主义否认一切超理智之价值,超然界之学理,横加抨击;实证主义的学者只承认可感知之事实与现实,其他一切均虚无缥缈,不可思议;唯物哲学则更变本加厉,视人生为机械,一切问题均为面包问题,所谓经

● 刘鸿逊:《蔡总主教华中视察记略》(上)、(下),《磐石杂志》第3卷第1、2期,《公教新闻》。

● 《蔡总主教华中视察记略》(上)第38页。《磐石杂志》第3卷第1期。

济史观,于焉成立。理知走入歧途,演成思想界混沌。此种精神恐慌,使道德大受影响。”^①

1935年9月,中华公教进行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是发源于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在俗天主教徒的组织。1902年教宗良十三世正式称之为“公教进行会”。1928年教宗庇护十一世正式为该会制定章程,其宗旨为将天主教的伦理原则推广到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凡天主教徒均可参加。^②民国初年,山西的中国籍神父成玉堂和刘锦文发起成立中华公教进行会。后在雷鸣远、英敛之的支持之下,1914年10月18日,中华公教进行会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大会,雷鸣远被推为监督。1913年,上海也成立了“江南公教进行会”,陆伯鸿和朱志尧当选为正副会长。1928年,在华天主教会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并在各教区成立分会和支会。于斌出任总监督。^③1934年8月15日,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总部在北平东堂举行授职典礼,陆伯鸿受聘担任中华公教进行会会长。1934年新年之际,宗座代表蔡宁在公教进行会新年团拜时发表训词:“表示过去的一年,公教进行会的工作,无疑的是很进步,不但是在组织干部方面大为成功,即在影响方面也很大,特别是长江一带,蓬蓬勃勃的气象,和汉口公进训练周空前的记录,……故此余深望今年的公进会,由春天变为秋季,渐渐结果。”^④1935年7月31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代表大会致宗座代表蔡宁一份手谕,该手谕指出:

-
- ① 《蔡总主教华中视察记略》(下)第44页。《磐石杂志》第3卷第1期。
 - ② 《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第12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
 - ③ 成和德:《中华公教进行会之演变史》,载《圣教杂志》1935年第12期。
 - ④ 蔡宁:《公教进行会的展望——公进总部新年团拜时蔡总主教的训词》第67页,《磐石杂志》第3卷第2期,1935年。

“自基利斯督之光传入中国之始,即常有勤苦卓绝之男女信友,于传教事业上,与神职班以有益之援助,而其中最使人念念不忘者,如保禄徐光启,位至阁臣,学识深邃,甘第达徐太夫人,对于传教事业,皆曾与以有力之辅助。……自公进会组织大纲遵照余之谕旨与训谕批准完成后,以极短之时间,在扩展巩固圣信之德上,因群众同心协力,已获有更丰富之收获,此余之所乐闻者也。”^①

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代表大会从9月8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来自15省的183个代表出席了大会。在大会宣言中称该团体的目标是协助宗座代表及各地神长推进中国的“公教化”,并协助国家、促进建设。会议期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分别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同时,大会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称公教教友“谨向主席院长表示,愿尽其所能,对我国建设有所贡献。关于道德方面,尤愿协助政府竭力促进”^②。9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函蔡宁,对宗座代表和教宗本人表示谢忱。

1936年,蔡宁祝圣于斌为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字野声,1901年出生于黑龙江兰西县。1913年受洗入教,取圣名若翰。早年毕业于吉林省小修道院。1914年,他曾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全省学运代表。不久,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科,1922年入吉林省大修道院。1924年入罗马传信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以后继续攻读

① 《教宗庇护十一世致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手谕》,《磐石杂志》第3卷第8期。

②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4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神学,并在罗马晋铎。1933年,于斌以教廷管辖之下的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身份回到北平,次年任公教学校视察专员兼辅仁大学伦理学教授。1936年7月7日,罗马教廷发表谕令,任命于斌为南京教区主教。南京教区原属天主教江南教区管辖。1921年,江南教区划分为南京、安徽两教区。南京教区辖有无锡、南京两个总本堂区,十几个本堂区。当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该教区有特殊的重要地位。9月20日,蔡宁在北平西什库天主堂为于斌举行了祝圣仪式。●

二 教廷承认伪“满洲国”与 抗战时中梵关系

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日本帝国主义就阴谋吞并东北全境,并进而侵略华北和全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位于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关东军总部,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在以后的数月中,东北三省迅速沦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际,当时中国全国天主教事务由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统理。据刚氏回忆:

“9月27日日本电报新闻社发出电讯,在日军行动前夕,东北天主教美籍传教士(抚顺教区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在沈阳集会,由于地方治安不佳,感于他们处境不太安全,有意请日军来保护。因此我打电报给那里的传教士询问究竟,可惜电报已不通了。我再写信给抚顺教区

● 于汀之:《于斌主教》,《近代江苏宗教》第133—1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之长给我澄清一下。这位教区之长亲自来到北平，绝对否认那条新闻。因此我在《平津日报》上发表声明，严词驳斥日本新闻社的电讯为荒谬子虚。”●

刚恒毅曾全面分析日本侵华的原因是：(一)日本人口八千万，每年急剧增长，领土狭小，农产品缺乏，故蓄意谋求生存空间；(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割取台湾，并吞朝鲜，并不满足，近年美国和澳洲相继禁止日本移民，故日本对东三省垂涎已久；(三)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水陆两路均取得大捷，取代俄人在东北所有的利权，已具有吞并东北的基本条件；(四)日本在工业和军事技术上取得重大发展，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日趋重要，一意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五)欧美各国为经济问题所困，无暇东顾，中国则连年内战频繁，给日本的侵略造成有利的时机。● 刚恒毅认为，依靠国际联盟的影响，绝不足以制止日本的侵略：

“日本设法找出一不撤出东北的借口，以便向国联交待。开始造谣由于土匪作乱，所以暂时还不能撤兵。除此外又在东北掀起‘分裂运动’，成立伪满洲国，它无疑地是日本的傀儡。”●

1932年，国际联盟派出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调查日本侵略东三省及伪“满洲国”成立各事项。6月30日，法文《十字架报》(La Croix)发表了一份《中国主教就东北事件致国联调查团公函》，

①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第333页。

● 同上书，第330—331页。

● 同上书，第332—333页。

反映了中国传教区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坚决反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立场。这份公函逐条驳斥了日本提出的吞并中国东北的所谓理由：(一)日本认为中国四分五裂，不能管理自己，世界将会高兴地看到日本民族代中国整顿一下。公函指出，根据良心的立场，日本对中国的描绘太离谱无稽，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已逐渐走向团结和有序。(二)日本认为中国人有仇外之根性。公函驳斥说这种指控完全不符合实际，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愿意与世界各友好国家和民族交往。至于抵制日货事件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才发生的。(三)日本担心中国会共产主义化，故充当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公函指出中国国民绝大部分是农民，爱好和平，不愿从事阶级斗争。而战争带来的动乱会使他们流离失所，转而投奔共产党。消弥国内革命的方法是维持和平，发展经济。这份公函除第三点反映了天主教会一贯的防共立场之外，其抵制日本侵略的意愿是十分明显的。公函最后呼吁：

“如果以战争从事入侵，兴起被人类诅咒的可怕战争，屠杀无辜百姓，……这种行为不仅为国际公法所不容，而且也为永恒定律所不许。我们的人民在财产上所受的损失，无法估计。尤其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更是无法形容。只有天主知道究竟我们吃了多少苦。在这件正义的案件上，天主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诸位调查委员先生，天主也将襄助你们，作一公正无私的调查，它关系着五亿人民的幸福啊！”●

● (法)《十字架报》1932年6月30日，转引自《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下)第361—362页。

以上刚恒毅及部分中国主教对中日战事看法,仅代表他们个人的意见而非教廷的决策。1932年2月,溥仪被日本挟持至东北出任执政;3月1日,溥仪甘为日本傀儡,沐猴而冠,加冕为伪“满洲国”皇帝。事实上,在1934年2月,即刚恒毅离华一年以后和蔡宁抵达中国前二个月,罗马教廷已经在酝酿承认伪“满洲国”。是年2月10日,为教廷与伪“满洲国”建交事,吉林教区主教法籍巴黎外方传教会高德惠(A. Gaspais. Bishop)访问了伪“满洲国”外交大臣谢介石,事后长春天主堂公布《天主教会发表书》,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东北教区脱离中国教区而独立,罗马教廷并宣布高德惠就地任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自1935年以后,东北各教区另印行伪“满洲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而在上海教区编印的“中华全国教务统计”从此也不包括东北各教区。《满洲公教月刊》等杂志发表的《天主公教会发表书》全文如下:

“罗马教皇廷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帝国天主教会之关系事项,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其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故罗马教皇廷,常使其传统忠实之代表,以使之将关于天主教会所有问题得与既成之国家交涉耳。”●

由此,罗马教廷在日本之后,第一个承认伪“满洲国”。

1938年9月10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冈道尔夫别墅会议厅特

● 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资料百则》,《宗教研究通讯·增刊》第27页,1982年。

别接见伪满“外交部长”韩云阶率领的特使团,并接受了伪“满洲国”皇帝呈进的信件和礼物。据《梵蒂冈画报》1938年9月号报道:“……宗座对此再三致意,并附加说明,皇帝可以相信教宗的同情,皇帝如愿教廷与满洲国的关系日益增进,为谋求人民与国家的幸福,使满洲国繁荣的天主教传教事业成为全世界天主教会中极有前途的丫枝,则可以而且应该相信宗座合作。”^①同年10月20日,庇护十一世亲自致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全文如下:

“教皇庇护十一致满洲国溥仪皇帝陛下

祝健康昌盛!

在刚才逝去之九月间,我人以对其应有之荣耀,接待了陛下所遣特使韩云阶先生阁下。

陛下派遣特使和由他带来如此友好的信件,我人向皇帝陛下表示深切的感谢。皇帝陛下为我宗座的繁荣昌盛向我人亲切表达的良好祝愿,我人亦同样衷心祝愿于陛下。我人还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接受了陛下热情惠赠的礼品精工玉刻香炉。见此内心的象征,曷胜欢欣。因为我人衷心为贵国以及全人类幸福、和平及繁荣之恳切祈祷上达于天,一如含有祈祷意义之烟香,香氤缭绕,上升于天主台前。

借此良机,对信仰天主教的信友和教会机构于满洲帝国内享有合法自由,向陛下表示我人诚挚的感谢。由此,陛下亦可深信——在其他方面亦很清楚地显出——关于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天主教友是不甘落在人

① 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资料百则》,《宗教研究通讯·增刊》第28页,1982年。

后的。

此后,尊敬的皇帝,我为皇帝陛下及我至亲爱的陛下人民,祈求全能天主,赐以繁荣和幸福。

1938年10月10日,我在位的第17年,
发自罗马近郊冈多尔福。”●

庇护十一世去世以后,新继任的教宗庇护十二世(Piux XII 1939—1958在位)于1939年2月12日,致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通告他本人膺选教宗的消息,并要求伪“满洲国”境内教民,“于理应服从合法政府”。此信全文如下:

“致满洲国大皇帝溥仪陛下:

尊贵的皇帝陛下:

祝平安!祝昌盛!

众枢机主教已选我登上天主教会最高宝座,职责所在,谨以奉闻于尊皇帝面前。

首先我要向陛下保证:已故前任教皇对于陛下及陛下人民的敬意,和我的意愿是完全吻合的。

怀着对陛下隆情厚意的信任,我对信奉天主教的信众及其正当的机构,在贵广大帝国内,将续享贵政府法律的垂顾与保护,抱有坚定的希望。至于他们,我充分相信,于理应服从合法政权,于热爱祖国,是不会落于人后的。

● 《巴黎外方传教会杂志》(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Missions - Etrangeres de Paris)第18年第206期,转引自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100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祈求全能的天主降恩惠于陛下，并赐我们相互的关系，常给人以纯粹爱德的印象。

1939年2月12日，我在位第1年，
发自罗马伯多禄殿近侧，庇护十二世。”

庇护十二世是在1939年3月12日在罗马圣·伯多殿大殿举行加冕典礼的。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于3月9日致电中国驻法大使顾维均，指示他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这次加冕典礼。^①顾维均于11日抵罗马，12日上午参加大典，13日中午，庇护十二世接见了顾维均。当时，中国军民正倾全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大战区和敌后的抗战进入了高峰，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民众正蒙受着日益深重的苦难。庇护十二世一方面致电伪满继续表承认的态度；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特使，对于日本侵略的暴行不置一词，只是笼统地表示“憎恨暴力”。据顾维均回忆，当双方转达了各自的问候以后，教宗表示：

“我希望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苦难不久即将结束，并将能再次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全世界都钦佩的文化和文明工作中去。……，我憎恨暴力猖獗，并一定竭尽全力从道德上和精神上施加影响，使人类表现在文化和文明方面的真正优越性重新发扬光大。”^②

● 当时在罗马的罗光神父，在比利时的陆徽祥神父均建议国民政府派特使往贺。欧洲各国的中国使馆亦电请国民政府派使。外交部原拟派驻意大利代办徐道邻为特使，后知教廷素不接受驻意使节为特使，乃改派顾维均为正使、徐道邻为副使，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第一次派使赴教廷。

● 《顾维均回忆录》(三)第379—380页。

顾维均在接见时表示“我深信教皇的崇高威望将对全世界的和平正义事业发挥作用”，冀望教廷站在公道的立场上讲话，但教宗这些不着边际的言辞令他失望。

抗战军兴前后，中国国内有一些天主教人士，出于宗教和爱国的感情，希望国民政府抢在日本之先与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在国际上和道义上孤立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于斌主教和蒋百里曾去罗马，为双方通使事与教廷接洽，但未成功。● 据中国天主教历史学家方豪神父回忆：

“已故蒋百里先生对此事尤具远见。蒋先生并主张以当时驻法大使顾维均先生为首任教廷使节。其时我国对教廷之外交活动，实先日本一着。盖前教宗庇护十一世对我国夙具好感，而传信部秘书长刚恒毅总主教又为前任驻华教廷代表，对此事亦极出力。与教廷通使事，甫有端绪。南京不幸陷敌，德使陶德曼奔走调解，一时和平之空气弥浓，教廷遂取观望态度，政府亦无暇及此，通使问题乃暂搁置。既而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派遣私人代表密昂戴勒(Myron Taylor)赴梵蒂冈，并于当年2月27日会见教宗，正式呈递国书。国人也颇有主张采取同样方式者。”●

但是教廷并没有先期与中国建交。1941年1月27日，在瑞士的法国通讯社忽传日本将向罗马教廷派驻使节，教廷亦准备向日本派遣宗座使节。具体人选为马莱拉总主教(Paolo Marella)。另传马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41页，(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 方豪：《〈梵蒂冈一瞥〉代序》，(台)《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336页。

莱拉总主教向教廷表示斡旋远东和平的时机已到。教廷方面则称马莱拉的意见纯系私人性质,不代表官方意见。当时国民政府方面有人对此事颇为注意。同年10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审查委员会国际外交组对外交部工作报告审查意见第二段有“请外交当局注意与梵蒂冈作进一步联系”一项,在大会上以147票对21票通过。^①

1942年3月12日,有报道说教廷已允许日本向梵蒂冈派使。^②英美两国遂向教廷提出质问,同盟国方面竭力阻止此事,于是盟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日本在菲律宾、香港、海南岛和暹罗各处以及希特勒在欧洲各地虐待迫害天主教徒的新闻。当时,代表中国天主教会立场的《益世报》于3月19日发表社评,敦请教廷勿允日本之请求,理由为:(一)日本并非天主教国家,在日本国内及占领区屡屡发生压迫天主教会的事实;(二)日本的暴行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破坏教堂、屠杀教友,为全世界教友不能容忍。但罗马教廷不顾盟国的规劝以及包括中国天主教徒在内的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宣布同日本建交。27日,路透社宣布日本官方宣称教廷驻东京代表马莱拉总主教享受外交特权,而日本则派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外交官原田健任日本驻教廷代表。^③教廷承认日本是在1942年3月,正值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后数月,当时日军正向香港、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太平洋诸岛大举进犯之际,故英国政府明确向教廷表示,梵蒂冈此举将被解释为屈从轴心国压力及对日本狡诈无信的野蛮偷袭和侵略的姑息宽容。^④

① 方豪:《〈梵蒂冈一瞥〉代序》,(台)《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336页。

② 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第235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

③④ 方豪:《〈梵蒂冈一瞥〉代序》,(台)《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337—2338页。

1942年4月20日,日本首任驻教特使原田健,离开其驻维希使馆参事任,由巴黎前往罗马,27日,教廷国务卿玛格利奥纳枢机接见,5月9日,向教宗呈递国书。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以积极的姿态争取与教廷建交,并多次向教廷示好。因为教廷与日本建交以后,驻欧美的中国使馆向外交部建议与教廷通使事不宜再缓。1942年4月8日,中国敌产处理委员会会议决对各地教堂,多加保护。4月30日,行政院长官蒋廷黻处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一)在中国之德、意天主教教士,虽为敌国国民,但系受罗马教廷委派前来中国,故其所受待遇与敌侨略异;(二)天主教之产业并非私有财产,与经商之敌产情况不同,故区别对待,予以保护。●6月9日,蒋廷黻正式对外宣布中国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为驻教廷首任公使,17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任命谢寿康为中华民国驻教廷特命全权公使”。●教廷方面则表示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暂时不更换。

谢寿康为江西赣州人,生于1894年,少年时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为比利时大学经济学博士,擅长法文,喜好艺术,著有法文中国戏剧剧本,是比国最高皇家学会会员。曾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三年,驻比使馆代办一年。谢氏于1943年1月30日抵罗马,由罗马车站直入梵蒂冈。因为当时中国属同盟国,意大利则为轴心国,双方处在交战状态,中国外交人员不能在意大利旅行,所有与意大利交战国驻教廷的使节全部迁入梵蒂冈城内。中国驻教廷的使馆被安排在梵蒂冈市政府法院第一层楼内。2月25日,谢寿康晋见教宗,呈递国书,教宗亦致词答谢。●

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宗座驻华第二任代表蔡宁正在

●● 方豪:《〈梵蒂冈一瞥〉代序》,(台)《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339—2340页。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44—248页。

西北巡视教务。不久，日军占据北平，蔡宁转往汉口。11月31日，面对日益扩大的战事，蔡宁向全国主教发出一牧函，敦促战时天主教会应加强慈善救济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华北及华南一带的教会医院，多改为伤兵医院，或尽量收容伤兵。上海、南京、汉口、杭州、长沙等地的天主堂，亦收容因战争流离失所的难民。● 1938年1月28日，中国全国的天主教堂，因蔡宁的训令，举行追悼阵亡将士的弥撒。他本人在汉口重行这一大典。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到堂参加典礼。●

但是，当1939年全面抗战进入高潮之时，3月14日，蔡宁突然发布一份公函，要求全国各地主教和神职人员对目前的局势“不偏左、不偏右，即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该公函全文如下：

“致可敬的中国主教

最可敬的主教：

我信而坚持，负有神圣职务之人中，无一人对于政治愿有丝毫之参与，一如教会训令所严禁者。

在目前危险的时局下，是项禁令更亟须遵守。因此，请各位可敬的主教郑重告诫属下司铎，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事务，不偏右，不偏左，即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因为，目前最可怕的事例教训我们，这些行动能给人以攻击教会住院的报复借口，尤其在农村地区。

迫切而又迫切地请你们嘱咐并注意遵守圣教法典和中国第一次公会议关于这些问题所规定的事项。

在顺境和逆境，都要小心翼翼，警惕机灵，对鲁莽轻

● 方豪：《三十年来中国的天主教》，《方豪六十自定稿》第3538—3539页。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8—229页。

率以致行为不慎的不明智者,应加以训斥。

事关传教区生命,不要因个别人的不明智而贻害整个团体! 只有一视同仁的爱德,才能获生获救!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蔡宁

1939年3月14日于北平。”^①

这封公函充分反映了蔡宁对于抗日战争的暧昧态度。国民政府也认为该公函对于“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南西北,皆有尽抗战之责”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抗战国策相抵触,遂有外交部训示驻法大使顾维均向教廷表示不满。顾维均则请中国著名天主教人士陆徵祥代他拟一份说牒。陆氏本人对蔡宁的公函亦甚为不满,并明确表示了态度:

“对于蔡总主教发出的公函,蒋委员长给外交部一批示,以为该公函对于中国精神总动员的国策有所抵触,对于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有些妨碍。外交部训令顾大使写一文书交与教廷驻华大使,转送教廷。顾(维均)请问我的意见,并要我写一说牒稿。我和爱德华神父研究昔日曼西埃枢机对各教廷驻比大使的文件,拟一说牒,态度较外交部的态度稍强。中国人常讲礼貌,有时外国人不懂,以为我们怕他们。我们该以外国人的态度对外国人。”^②

① 《公教教育丛刊》1939年5月号,第454页。转引自《宗教研究通讯》增刊第5期,1982年12月,第33页。

② 罗光:《访问陆徵祥神父日记》,(台)《传记文学》第19卷第5期。

从教廷承认伪“满洲国”、与日本建交一直到其驻华宗座代表蔡宁发布“不偏右、不偏左”公函等一系列事件,表明罗马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政策,虽然这些事件在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中国天主教徒及中下层神职人员所了解,但其本质上是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行为。亦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很多天主教人士(包括上层神职人员)积极从事抗战活动,并未被教廷政策所左右。于斌在1938年春、1939年和1943年,曾三度出访欧美各国争取欧美国家舆论支持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并要求美国增拨作战物资的供应,呼吁早日克复滇缅公路,这种民间外交对抗战是积极贡献。^① 尤其值得回味的是陆徵祥神父于1933年用法文撰写的《根据曼西埃枢机的著作从天主教教义看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和占领》一书,作者根据比利时的曼西埃枢机(Card. Merci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占领比国时期的言论,对照天主教的教义,指出“基督的宗教把爱国著为律令,没有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不是纯粹的爱国志士”,^② 并引奥古斯丁名言曰:“不为兴战争而求和平,然得为和平而作战。”曼西埃枢机号召比国民众不服从德军刺刀下建立的傀儡政府,陆徵祥根据此原则,认为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也是不合法的强权:

“这种强权不是一种合法的权力。自今以后,在你们心中,无须有重视、依恋或服从的观念。”^③

陆徵祥并不了解教廷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实。但是,他已经从天

① 顾裕禄:《陆徵祥、于斌的抗日表现》,《宗教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1985年第6页。

②③ 罗光:《陆徵祥传》,(台)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188—190页。陆徵祥著:《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

主教教义上驳斥和否定了这种行为。

罗马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远东对日本与伪满的态度与其在欧洲对法西斯势力总的绥靖策略有关。据现有资料来看，二战期间虽有不少天主教人士从事于拯救纳粹迫害下的犹太人行行动，但像主教和梵蒂冈高层官员很少参与此类事件。以法国为例，战后由以色列政府颁发的专以表彰拯救犹太人的英雄“义人奖章”1100人中，其中85名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但无一人是高层人士。^①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其副总理天主教徒巴本(Von Papen)向梵蒂冈表示“愿与圣座发展友好关系，因为基督教是民众生活的道德基础”。同年，德国与教廷签订政教协定。德国天主教政党“中央党”转而支持纳粹政权。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德国开始作出种种违约举动，迫害天主教的事件屡有发生。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37年3月发布了《灼热的焦虑》(Mit Brennender Sorge)通谕，谴责纳粹政权宣扬的种族主义、种族国家主义，侵犯人权，将一个个人与基督并列等等。这份通谕在3月27日圣枝主日在德国所有天主堂公布，但德国天主教会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没有作出反应。^②然而，也就是同一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又用拉丁文公布了一份反对共产主义的《神圣救世主》(Divini Redemptoris)通谕，对共产主义运动大加指责。在教宗心目中，共产主义是普世性的危险，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仅是地方性的危险，局限于德国领土之内。随着纳粹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猖獗，庇护十一世感到迫在眉睫的威胁，1938年6月22日，教宗在冈道尔夫宫接见了途经罗马的美国耶稣会士约翰·拉法热(John Lafarge)，请他起草一份《人类团结》通谕，文稿于10月撰毕，交给另一位神父审阅，但后者于11月去世。同时庇

① 《吕斯蒂才事件》，《海外天主教动态研究资料》1995年第4期。

② 穆启蒙：《天主教史》(第四卷)第137—138页，1990年版。

护十一世亦因心脏病突然病倒。1939年2月10日,庇护十一世因心脏病再次突发去世。这份没有发表的《人类团结》通谕既谴责了唯物主义,指出它“将社会看成一架机器而个体只是零件,个体完全被国家利益所牺牲”,同时,它也指责了纳粹的种族主义,指出它“在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之下排斥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群,因而是反宗教的一架战争机器”。● 1939年3月登基的庇护十二世搁置了这份通谕。不久,大战就爆发了。后来的历史学家曾经指责庇护十二世在战争中的暧昧不明的表现,在登基以前他曾是教廷驻慕尼黑的圣使,1933年与纳粹缔结政教协定时他是教廷国务卿,因此与德国有密切联系。德国侵占波兰以后,波兰首席主教霍龙(Hlond)枢机曾向教宗报告波兰教会的悲惨处境,马耳他骑士团的斯卡维齐(Scavizzi)神父等许多人士也都曾向教宗报告纳粹在集中营所犯的滔天罪行,但庇护十二世均保持缄默,不置一词。相反,教宗对法国的贝当卖国政府和意大利侵略阿尔巴尼亚都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支持。由此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观察教廷在远东的措置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中的另一件大事是教廷解除了有关“礼仪之争”的禁令。“礼仪之争”起源于明末清初之际,当时教会内部有部分耶稣会士以及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士不同意利玛窦容忍信徒“祭祖祭孔”的主张,一直上诉到教廷,演成旷日持久的争论。教廷在康熙时代两次派使来华,均未解决问题,反而导致清廷有意禁教。最后,教宗本笃十四世于1742年7月11日发布《自上主圣意》(Exquo Singulari)的冗长通谕,严禁信徒祭祖祭孔,并禁止教会内对礼仪问题的任何争论。

1935年3月25日,吉林宗座代牧兼教廷驻伪满宗座代表高德

● 《人类团结——一份未问世的通谕》,《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1997年第20期。

惠致信传信部,报告伪“满洲国”内有恢复尊孔的趋势,因此他于2月27日致信伪满“外交部”询问此事,后“外交部”转来“教育部”的一封信,声称尊孔是为了加强伪满境内百姓的“王道”意识,而非宗教仪式。3月12日,伪“满洲国”内各教区神长聚“新京”(长春)开会,议决:(一)在教会学校可以挂孔子像,并向学生解释这属于民间的而非宗教的仪式;(二)在教外学校的信教学生可以以消极和宽容的态度参加尊孔仪式;(三)信教学生、士兵和民政官吏可以入寺庙朝觐,但不得分享祭品;(四)允许教徒参加教外的私人葬礼。5月28日,传信部部长毕翁弟枢机,致信高德惠,表示原则同意。●

1939年11月8日,传信部部长毕翁弟枢机和秘书长刚恒毅总主教,向全中国天主教会发布敕令,解除“礼仪之争”的禁令:(一)由于中国国民政府申明无意发布宗教性的命令,因此尊孔仪式不含宗教意义;(二)不应禁止天主教学校悬挂孔子肖像;(三)如果信教师生被迫参加公共礼仪,可以用消极的态度参加;(四)可以在亡者和亡者的肖像前行鞠躬和其他民间性的敬礼;(五)1742年的《自上主圣意》通谕已不适应传信部目前的决定,但争论仍是禁止的。●1941年2月28日,传信部将这五点指示发给宗座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由此,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礼仪之争”宣告结束。

三 “圣统制”建立及应变与撤退

1945年上半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彻底胜利,欧洲战场的战事宜告结束。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

●●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英文版)第83—86、86—89页,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交流中心,1992年。

界大战正式告终。世界历史步入了战后的新时期。

庇护十二世声称对中国天主教在战后实施复兴计划的总要求是使天主教“更加中国化”。● 在欧战停止和日本尚未投降之际，教廷已酝酿祝圣天主教在华历史上第一个枢机主教。当时中国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和于斌向教廷推荐的人选是陆徵祥。据谢氏于1945年5月22日致中国外交部信曰：

“……最后职询以现欧洲停战，发表枢机之御前会议是否即将召集，伊（教廷外交部次长）答称此事现尚渺茫。职乘机表示中国教区之多，为世界第二，吾人极盼能有一枢机。伊谓发表枢机，为教宗之个人特权，职复称中国教士中有被任枢机资格者有数人。如陆徵祥教士道德学问均为人推重，伊即询问教士之洋文姓名，并抄录备查。去秋于主教在此时，职曾与之商讨此问题，于意枢机尊位不能多有动作，倘有可能，中国第一枢机最好推陆教士任之。”●

1945年12月19日，传信部秘书长刚恒毅托人询问谢寿康有关陆徵祥的详细履历，谢氏认为是为陆升枢机作准备。实际上，教宗是准备升陆徵祥为比国本笃会刚城（Ghent）圣仁伯多禄会院院长。12月14日，谢寿康才得知枢机人选为田耕莘：

“教宗决定于明年2月18日御前会议任命青岛主教

●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谢寿康1945年5月22日致外交部信节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8，卷号2109。

田根(原文如此)莘为枢机。我方得有枢机,以为首次。实开未有记录。”^①

1946年1月1日元旦,教宗接见谢寿康时表示“此次决定任命中国枢机,系彼对中华民族表示亲切之意,故择定一在中国教区负实际责任之道地中国教士为枢机,并希望此后中国与教廷外交关系更可密切云云。”^②

田耕莘,字聘三,世居山东阳谷县张秋镇。田氏于12岁入教。1904年至1910年,在小修院求学,1916年入大修院。1918年6月晋铎,先后在山东省的鱼台、嘉祥、郓城等地传教。1933年,他被任为阳谷教区宗座监牧,1939年升宗座代牧。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年余,日军占领华北及东南沿海,田耕莘穿越火线,从上海乘船辗转赴欧洲,于10月29日在罗马接受教宗本人的祝圣。1942年11月10日,田氏调任青岛主教,^③因善于理财和发展教务而得教廷器重。1946年2月17日,已经抵达罗马的田耕莘觐见教宗,并呈送山东花边桌布一套,教宗则询问了中国教务。2月18日,教廷发表新任枢机名单32名,田耕莘在内。同一天,田耕莘在传信部接受了任命状,时刚恒毅作陪礼。^④

1946年4月11日,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敕谕,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将全国划为20个教省,每教省设一总主教。在此以前,中国天主教传教区域的划分,是采用宗座代牧区和宗座监牧区的形式,代牧和监牧以宗座的名义代治教区内的教务。在设“圣统制”以后,教内统序由代牧制进于通常的主教制,这是中国天主教

①② 谢寿康1945年12月14日、1946年1月1日致外交部信节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8,卷号2109。

③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42—343页。

④ 谢寿康于1946年2月19日、2月22日信。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罗马教廷在中国设立“圣统制”，是重视当时战后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传教事务的表征。但是，当时中国天主教会的实际情况并不足以成为建立“圣统制”的条件。这不仅由于抗战中天主教会蒙受重大损失尚未复元，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不是一个真正本地化的教会。绝大部分教会领袖尚未摆脱旧时殖民主义时代的意态，教会的权柄也没有真正交给中国人。以 20 名总主教为例，他们是：(1)北平田耕莘枢机总主教，属圣言会；(2)南京于斌总主教，属正统神职界；(3)福州赵炳文总主教，多明我会；(4)汉口罗锦章总主教，方济各会；(5)南昌周济世总主教，味增爵会；(6)绥远穆青海总主教，圣母圣心会；(7)济南杨恩赉总主教，方济各会；(8)太原李路嘉总主教，方济各会；(9)西安万九楼总主教，方济各会；(10)兰州濮登博总主教，圣言会；(11)安庆梅耿光总主教，耶稣会；(12)重庆尚惟善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3)长沙蓝泽民总主教，方济各会；(14)杭州梅占魁总主教，味增爵会；(15)广州魏畅茂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6)南宁沈士杰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7)贵阳蓝士谦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8)昆明德为能总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19)开封阳霖总主教，米兰外方传教会；(20)沈阳卫宗藩总主教。● 此 20 名总主教中，只有北平田耕莘、南京于斌和南昌周济世三人是中国人。至于全国近 140 个传教区的主教中，更有 110 主教是外国人。● 这些传教区主教的名单及排列如下：

绥远穆青海(比)、宁夏王守礼(比)、西湾子石德懋(比)、集宁

●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 230 页。

● 《中华全国二十位总主教姓氏》，《圣心报》第 61 卷第 5 期。

●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 71 页。

樊恒安(华)、沈阳(卫宗藩)、抚顺林化东(美)、热河南阜民(比)、吉林高德惠(法)、四平街石俊声(加)、延吉白化东(德)、赤峰赵庆化(华)、佳木斯兴光启(意)、林东赵玉明(加)、齐齐哈尔胡千普(瑞士)、哈尔滨祁高德(国籍不详)、北平田耕莘(华)、安国王增年(华)、赵县张弼德(华)、景县凌安澜(奥地利)、正定陈启明(华)、顺德葛乐才(波兰)、献县赵振声(华)、宣化王振仁(华)、保定张弼德(华)、天津文贵宾(法)、永年崔守恂(华)、永平刘士杰(法)、大名查宗夏(匈牙利)、易县马迪儒(意)、济南杨恩赉(德)、烟台杜坤安(加)、周村杨光被(美)、沂县万宾来(德)、曹县何方济(德)、青岛(缺)、阳谷牛惠卿(华)、兖州舒德禄(德)、益都狄嘉略(意)、威海卫路道宣(意)、太原李路嘉(意)、汾阳刘锦文(华)、潞安康济民(荷)、朔县俞广仁(德)、大同邓维道(荷)、榆次富济才(意)、洪洞韩廷弼(华)、绛县孔昭明(荷)、西安万九楼(意)、凤翔王道南(华)、汉中孟守道(意)、三原班锡宜(意)、延安易兴化(西)、周至高正一(华)、兴安方(名不详,意)、同州穆继文(意)、兰州濮登博(德)、秦州(缺)、平凉高金鉴(西)、西宁夏思德(德)、新疆卢斐德(德)、南京于斌(华)、海门朱开敏(华)、上海惠济良(法)、徐州邵轶欧(美)、安庆梅耿光(西)、蚌埠赵信义(意)、芜湖蒲庐(西)、屯溪扶直义(西)、开封阳霖(意)、郑州丁玉守(意)、驻马店袁庆平(华)、归德陈明理(西)、洛阳巴友仁(意)、南阳南岭梅(意)、信阳张维笃(华)、卫辉林栋臣(意)、新乡米干(美)、重庆尚惟善(法)、成都骆书雅(法)、康定华郎廷(法)、嘉定邓甘霖(华)、宁远包明扬(法)、顺庆王文成(华)、万县王泽溥(华)、汉中罗锦章(意)、汉阳高尔文(爱尔兰)、宜昌顾学德(意)、圻州佳格理(意)、老河口费乐理(意)、施南顾学德(意)、武昌郭时济(美)、蒲圻(缺)、沙市狄隆(美)、襄阳易宣化(华)、随县龚成德(爱尔兰)、长沙蓝泽民(意)、常德王德纯(西)、衡州柏常青(意)、汉口罗锦章(缺)、开封阳霖(缺)、沅陵欧克澜(美)、澧州马国珍

(西)、宝庆龙博义(匈牙利)、湘潭佳索理(意)、岳州高凤翔(西)、永州德志恒(意)、南昌周济世(华)、赣州和若望(美)、吉安梅雅谊(意)、南城利伯高(爱尔兰)、余江光一幸(美)、杭州梅占魁(法)、宁波戴安德(法)、台州胡若山(华)、丽水杜绝蒙(加)、福州赵炳文(西)、厦门茅中砥(西)、福宁赵炳文(西)、建瓯谷源真(美)、邵武王峻德(德)、汀州雷斯基(国籍不详)、广州魏畅茂(法)、香港恩理觉(意)、嘉应福尔德(美)、江门柏增(美)、澳门罗若望(葡)、北海祝福(法)、韶州欧尔额(意)、汕头和敬谦(法)、海南德文斌(法)、南宁沈士杰(法)、梧州曹(名不详,美)、桂林罗(名不详,美)、贵阳蓝士谦(法)、安龙贾禄(法)、石阡包美德(德)、昆明德为能(法)、昭通(缺)、大理徐司庆(法)。

当 1942 年中国宣布与教廷建交,并派谢寿康为公使驻教廷以后,梵蒂冈方面并无使节派回中国。当时蔡宁驻于北平,远离抗战大后方,且发表了一些不适当的错误言论,为国民政府及天主教会人士所不满,他并不具有外交使节的身份。1946 年 2 月,教廷方面曾考虑派正式的外交使节来华,其外交部政务次长私下征询谢寿康意见,是否由蔡宁充任教廷驻华使节。谢寿康大概了解国民政府及于斌等对蔡的不满,因以蔡宁身体欠佳婉拒,希望教廷另派新的使节。据 1946 年 2 月 17 日谢寿康致外交部信曰:

“……今日下午 6 时教廷外交部政务次长约往晤谈。伊首请正式呈报钧部教廷接受中国政府欲教廷派驻华大使之愿望。拟不久派大使前往,职答以迄未接到训令,表示此项愿望伊谓据其所得各方报告,中国政府有此愿望教廷极愿接受。拟从事使其实现并拟派蔡宁主教前往,但在未实现以前本人亟愿知道贵使之意见。职询以是否征求同意,伊谓此非征求同意,只系友谊询问个人意见。

答以宁主教在华甚久,身体不好或需养休息,伊谓如此则教廷可另派他人云云。职退出后即访刚总主教,请其注意人选。伊谓教廷必选择中国欢迎之人,并谓万一中国不接受教廷提出之人选,而请另派他人,教廷并不丢面。因征求同意为秘密步骤云云。谨闻并敬恳电示钧旨又此事与中国公教关系极大,可否请通知于主教是否有当,敬祈钧裁。(节录)”^①

1946年7月6日,教宗庇护十二世下谕,设立教廷驻华公使馆,同日任命黎培理(Abp. Antonio Riberi)总主教为第一任驻华教廷公使。

黎培理为摩纳哥人,生于1897年,父母为意大利籍。早年入意大利北部古奈阿城修院。1922年晋铎。后转学于罗马传信大学,攻读教会法律,被选入教廷外交学院。1925年被派任教廷驻波利维亚使馆成员,1930年调任教廷驻爱尔兰使馆参事。1934年任教廷驻东非英属殖民地宗座代表,领总主教衔。二次大战时返回罗马,任教廷救济外国侨民事务所主任。黎培理于1946年底抵华,12月28日晋见当时中国政府政要,他将公使馆设于南京。^②

1946年夏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召谢寿康公使赴巴黎参加和平会议,同时派他赴比利时参加陆徵祥神父升名誉院长的典礼。不久,中国外交部征询教廷的同意,委派吴经熊为中国驻教廷第二任公使。1947年1月21日,吴经熊公使率全家抵罗马。2月16日,吴经熊晋见教宗并呈递国书。

吴经熊,号德生,浙江宁波人。生于1889年3月28日,早年

^① 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2—233页。

肄业于上海，入基督教。后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又赴巴黎和柏林深造。二十六岁回国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又任法学院院长，兼任上海租界法官。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后又任主席。抗战爆发以后，吴携全家避难香港。在港期间阅读但丁《神曲》和《圣女德兰传》，有感于心，于1937年改进天主教。日军占领香港后，他避至重庆，期间他翻译了《圣咏》，传诵一时。抗战胜利以后派驻教廷。^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迅速演变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对抗。而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共产党的势力亦十分强大。由于历史上一贯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东欧国家划归社会主义阵营、意大利共产党在竞选中表现出的活力等等原因，罗马教廷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执行反共政策。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5年6月3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向枢机团发表重要宣言，他首先谈到了纳粹对天主教会的迫害，以图消除舆论界对教廷在二战中保持缄默的批评。同时，教宗指责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牺牲弱小民族”及“违背大多数国民意愿”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制度。^② 数天以后，苏联及南斯拉夫都对教廷的宣言加以反驳。^③ 随着双方冲突的升级，1947年12月18日，教宗再次发布通牒，不指名地影射共产主义运动是“阴谋利用工人大众的痛苦，而障碍正义与秩序的力量，毁灭努力复兴建设的繁荣”^④。

由于受教廷的反共决策影响，以于斌为代表的中国天主教会

① 《欢送吴公使履新》，《益世周刊》第27卷第24期。

②③ 谢寿康1945年6月3日、6月9日致外交部信，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 庇护十二世：《希望已久的和平通牒》，《益世周刊》第30卷第9期，第132页，1947年12月。

上层领导集团在国内不遗余力地支持蒋介石政权发动的内战。1946年7月,国共全面内战正式爆发。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占领了北方战略重镇张家口,共产党则有部署地战略转移。蒋介石政府错误估计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于11月召开了摒弃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宣布所谓“制宪成功”。于斌是此次“国民大会”的主席团成员。1947年元旦,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在南京石鼓路天主堂宣布实施“圣统制”,并祝圣于斌正式就任总主教职务。^①10月,随着内战的加剧,于斌亲自赴美争取美国的援助。10月15日在上海教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于斌作了《中国今日面临的课题》的演说,称二次大战以后东西方的“冷战”和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斗争是“思想的斗争,是共产主义和反共产集团的斗争,这次战争不仅为武力战,而为超越物质的思想战,不分国别,不分阶级,其斗争的激烈,远出于武力之上”,“今日面临的危机,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人类的一大危机,中国又首当其冲。”^②10月26日,于斌抵美国旧金山以后,向美国各界宣称中国的内战“此系苏联与中国之战,亦即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战”,并希望美国加以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增加,罗马教廷与美国的关系及美国教会与中国教会的关系也变得日渐密切起来。^③在1946年2月罗马教廷新任命的32名枢机中,美国的枢机主教占了4名。其中有纽约总主教史贝尔曼枢机(Card. Spellman)。史贝尔曼于1889年5月生惠特曼城,祖籍爱尔兰。

① 《两大旷典在首都大堂举行》,《益世周刊》第28卷第1期,1947年,第3页。

② 于斌:《中国今日面临的课题》,《益世周刊》第29卷第60期。1947年,第242页。

③ 抗战前美国天主教在华传教士不足300人,仅占在华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人数1/13。到1942年增至650人,占1/9。1947年增至800人,占1/7。

1907年入纽约耶稣会办的福德汉大学,1911年至罗马北美学院,1916年晋铎并派回波斯顿主教区。1925年又赴罗马教廷国务院供职。1932年升主教,1939年升纽约总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同盟国军随军总主教。● 二战一结束,他即于1945年10月10日在罗马教廷秘密逗留20小时,会见教廷要人。“谓中国若能顾到中美关系问题,其前途实有莫大希望。中国民族性与共产主义根本不融洽云云。”● 史贝尔曼共二次访华。第一次是在1945年9月,当时国民党政府尚未返都,史贝尔曼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1948年5月31日,史贝尔曼经新加坡、香港、马尼拉抵达中国,开始了他第二次访华的行程。6月3日,史贝尔曼抵南京,受到盛大欢迎。蒋介石在总统官邸设宴款待,到会者有司徒雷登、黎培理、于斌、翁文灏、吴鼎昌、薛岳、吴铁城、俞大维、李惟果、董显光、谢寿康等。蒋表示:“现在我们在戡乱的时候,适逢史枢机再度来华,不胜愉快和荣幸,相信枢机返国以后对中国的精神及物质方面,一定有很多帮助。”史贝尔曼不指名地指责苏联禁止人民信教自由,继而指出:“我今天郑重申明,今后一定尽我能力所及,提倡中美精神上物质上合作,因为中国的和平稳定与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是有密切关系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给予史贝尔曼很高的礼遇,冀望他在呼吁美国援助方面发挥作用。

1946年底黎培理抵华以后,即开始巡视各大教区,部署对全国天主教教务工作的统一领导。1947年1月6日,黎培理向全中国各教区领袖发表一份公函,表达了在罗马教廷统一领导之下推

● 钟国屏:《介绍史贝尔曼枢机》,《益世周刊》第30卷第42期,1948年,第375页。

● 1945年10月10日谢寿康致外交部信。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 毓扬:《总统上宾飞抵首都》,《益世周刊》第30卷第24期,第378页。

进教务工作的希望。[●] 当时,拟准备成立三个机构(1)天主教翻译委员会、(2)公教名词划一委员会和(3)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但事实上只有第三个机构才正式成立。“天主教教务协进会”(Catholic Central Bureau)其英文名称为“天主教中央局”。这个机构分类两个部分,一部分设南京,但主要的工作机构设于上海岳阳路197号。它直属于教廷驻华大使馆的领导,其成立的时间约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天主教务委员会”的主要委员有:(1)华理柱(James E. Walsh),美国玛利诺会传教士,1918年抵广东江门,1927年升代牧。1936年7月任玛利诺会总会长,回美国纽约。12年以后随史贝尔曼再度访华,并留在中国,出任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秘书长。(2)赵玉明(G. Predost),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原在东北传教,后来上海,任副秘书长。(3)高乐康(Legrand),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士,曾在内蒙古西湾子任总本堂和会长,后任协进会文化出版部主任。(4)梅雨丝(Charles Mcuus),比利时传教士,1935年来华以后在海门教区传教。一度回国,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协进会财务组组长。(5)陈哲敏,中国籍神父,四川万县人。早年就读于罗马传信大学,并在该大学教授哲学,曾任教廷驻华大使馆中文秘书。任协进会公教名词统一组组长。(6)沈士贤,中国籍神父,汉阳人。曾在罗马传信大学读书,并去英、法、瑞士、爱尔兰考察教育。(7)莫克勤(William A. Mc Grath),爱尔兰高龙庞会传教士,曾在汉阳传教。(8)田望霖(Alain de Terwangne),比利时鲍朗会会士,抗战胜利后来中国,任协进会图画宣传组组长。(9)田恩霈(Terry),河北献县法国耶稣会士,任协进会劳工法律组组长。(10)穆德(Motte),河北献县法国耶稣会士,任协进会家庭通讯组组

● 《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致全中国各教区领袖公函》,《益世周刊》第82卷第5期,1947年,第76—77页。

长；(11)董世祉，中国籍神父，生于上海，早年入北方的本笃会，后去瑞士学习神学并晋铎。1936年加入于斌的南京主教区，抗战时去后方，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协进会教理讲座组组长。(12)张介眉，中国籍主徒会神父，甘肃武威县人，他曾在北京主编《铎声》杂志，到协进会以后亦担任杂志编纂工作。“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原是一个从事于文化事业的协调全国教务的机构，集中了全国各教区的精干人材。但是，随着局势的迅速演变，其成员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与新中国敌对的政治斗争。^①

1949年2月，在渡江战役前两个月，罗马教廷部署了部分教会人士撤退的决定：“(一)大修院生迁往安全地带，继续学业；(二)关于小修院生，教宗谓全迁移遥远地区，使能继续进修，或无可能。(三)至布道人员，除有少数有特殊危险可避走外，教宗谓其他圣职人员得留守其岗位。”^②以后，上海等地各修院的修生陆续撤退至海外。

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败退之际，黎培理奉教廷之命没有离开，当时国民党“外交部长”吴铁城对此有所不满。^③1949年7月1日，黎培理还向全国各教区发布了教廷圣职部的反共敕令：(一)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二)亦不得宣传和阅读支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书刊；(三)如违反以上二点，即不能接受圣事。^④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天主教会内部已经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1951年9月，黎培理及其秘书高理耀终因从事敌视和反对新中国的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中国天主教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① 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751—798页。

② 《益世周刊》第31卷第23期，1949年2月22日，第341页。

③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2—233页。

④ 《宗教研究通讯》增刊第5期，第二部分，第2页。

附录一

主要人名索引

A

- 阿鲁浑 Airghon Khan 11, 12, 13
阿里雅底 Antonio Agliardi 111, 114, 115
阿礼国 Sir. Rutherford Alcock 106, 107
阿梅德 Card. Leon Adolphe Amette 126, 127
艾儒略 Giulo Aleni 29
艾嘉略 Louis Delmarre 95
安德烈 Andrew the Frank 17
安多 Antoine Thomas 63, 67
安若望 Jean Henri Baldus 98
安治泰 Johann Baptist Von Anzer 117, 118
爱德华一世 Edward I 12
奥图尔 Dr. Barry O'Toole 149

B

- 巴本 Von Papen 175
巴扫马 Bar Sawma 11, 12, 13

- 巴范济 53
- 巴特纳 Jules Patenote 112
- 巴富尔 93
-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67, 81, 87
- 巴尔纳博 Barnabo 100, 107
- 柏朗嘉宾 Jean de Plan Carpin 5, 6, 7
- 柏尔德密 Jules Francois Gustave Berthemy 95, 96
- 拔都 2, 5
- 本尼迪克(波兰的) Benedict 5
- 本笃十二世 Benedict XII 17
- 本笃十三世 Benedict XIII 86
- 本笃十四世 Benedict XIV 82, 176
- 本笃十五世 Benedict XV 122, 124, 140
- 彼得二世 Peter II 43, 60
- 毕盛 Stephan Jean Marie Pichon 125
- 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i 31, 32
- 毕天祥 Luigi Antonio Appiani 65, 69, 86
- 毕萨尼 Pietro Pisani 126
- 毕翁弟 Fumasoni - Biondi 155, 177
- 庇护九世 Pius IX 99
- 庇护十一世 Pius XI 147, 148, 155, 160, 165, 166, 167, 175
- 庇护十二世 Pius XII 167, 168, 176, 179, 183, 184
- 卜弥格 Michael Boymn 33, 34, 35, 36, 37
- 薄贤士 Antoine de Beauvollier 67
- 保罗三世 Paul III 23
- 保罗五世 Paul V 27, 41
- 白晋 Joachim Bouvet 45, 63, 66, 72, 78

白赖理 Monsignore Giuseppe Petrelli 125

勃兰德 Von Brandt 117, 118

拜住 7

C

蔡宁 Mgr. Mario Zanin 156—161, 171, 172, 173, 177, 182

陈垣 134, 136, 149

陈国砥 147

陈哲民 187

成和德 140, 147, 148, 151

程有猷 140, 147, 148, 151, 152

崔守恂 151, 156

慈烜 32

D

大卫 Moriffat David 7

达里布 Tagliabue 104

达·迦马 Vasco de Gama 21

多罗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60—73, 82

道光皇帝 92, 93

迪亚斯 Bartholomew Diaz 20

德瑾琳 Gustav von Detring 108, 109

德里格 Pedrin 73, 78, 86

德庇时 Sir John Francis Davis 90

敦约翰 John George Dunn 108, 109, 110, 112, 116

董世祉 187
董显光 185
戴陈霖 124

E

恩理格 P. Christ Herdtricht 63

F

范礼安 P. Alexandre Valignani 25
樊国梁 Pierre - Marie Alphonse Favier 119
樊恒安 151, 156
方豪 116, 132, 169
丰大业 H. V. Fontanier 105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 II 4
腓力蒲四世 Philip le Bel IX 12, 60
费隐 Xavier Fridelli 81, 87
费利切尼 Antonius Feliciani 98
费理簿 Philippus Maria Cesati 75

G

高母羨 Juan Cobo 25
高一志(王丰肃) Afonso Vagnoni 54
高德惠 A. Gaspais Bishorp 165, 176
高乐康 Legrand 187

- 高理耀 188
- 高多林第 Ignatius Cotolendi 42
- 公沙的西劳 Gonzale Texeira - Corea 28
- 刚恒毅 Celso Costantini 143—150, 152, 153, 155, 162, 163, 165, 177, 179
- 格里高利九世 Gregory IX. 4
- 格里高利十三世 Gregory XIII 22
- 哥伦布 20
- 葛达多 Gotthard Plaskowitz de St. Maria 86
- 葛必达 P. Stanislaus Clavelin 92
- 顾盛 Caleb Cushing 90
- 顾维均 168, 173
- 良布雷尔 John Marry Gabrielli 58
- 光绪皇帝 102, 104
- 光若翰 Jean Baptiste Marie de Guebriant 128, 140
- 贵由 3, 5, 6, 7
- 贵加 7

H

- 华理柱 James E. Walsh 182
- 黄伯禄 62, 69
- 忽必烈 9, 10
- 韩云阶 166
- 惠济良 Augustus Haouisee 157
- 何济各 Onorato Maria Ferrari 75
- 洪若翰 Joannes de Fontaney 45, 63

胡若山 147, 148, 151, 181
亨利亲王 Henry the Navigator 20, 22
赫耐斯(轩尼诗) John Pope Hennessey 107, 108, 109
赫宣 Pierre Herve 71
翰兀立海迷失 8

J

贾耐劳 D. Belchior Carneiro Leitao 22
贾神父 Francisco Diaz 46
加匝 John de Casal 44, 73
嘉德朗 Antonius Calderon 48
嘉斯巴里 Monsignor Gaspari 122, 123, 125, 126, 127, 140
嘉乐 Carlo Mezzababarba 75—82
揭傒斯 18
蒋百里 169
蒋介石 173, 184, 186
蒋廷黻 171
焦璉 32
计有纲 Antonius Guignes 86
久里亚耐里 Francesco Giulianeli 104

K

康熙皇帝 29, 30, 60, 62—73, 84
卡彼罗 Capello 124
阔里吉思 15

孔蒂 Alexandre Maurice Robert Conty 138,139
孔布思 Emile Combes 123
孔神父 Florent Daguin 98
孔祥熙 161
克勒门五世 Clementus V 14,16
克勒门十世 Clementus X 47
克勒门十一世 Clementus XI 58,61,73,82

L

拉法热 John La Farge 175
拉萼尼 Thēodose de Lagrenē 90,91,92,93
郎怀仁 Adrien Languillat 81,92,101,107
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 87
雷鸣远 Fredric Vicent Lebbe 136—141,143,149,160
良十世 Leo X 22
良十三世 Leo XIII 102, 104, 107, 108, 113, 114, 115, 119,
122, 160
郎莫 Lambert 42
郎博拉 Card Rampolla 118
赖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95
李顿 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Lytton 163
李明 Ludovicus Le Comte 45,63
李自成 31
李之藻 53
李成栋 33
李容兆 151,156

- 李国屏 78
- 李秉忠 78
- 李鸿章 105, 106, 108—115, 116, 118, 119
- 李玛诺 Manoel Diaz Senior 54
- 利安当 Antonio de Sancta Maria 42, 54
- 利玛窦 Matteo Ricci 25, 26, 27, 28, 29, 52, 53, 54, 67, 69, 71, 78, 129, 133
- 利类思 Ludovico Buglio 27
- 黎元洪 144
- 黎玉范 J. B. Morales 42, 54
- 黎培理 Abp. Antonio Riberi 183, 185, 186, 187, 188
- 林森 157, 158, 161
- 林懋德 Stanislas Francios Jarlin 123, 150
- 刘应 Claudes de Visselou 45, 63
- 刘德蕴 49
- 刘锦文 181
- 刘文岛 156
- 龙如美 Andre de Longjumeau 7, 8
- 龙华民 Nicolas Longobardi 27, 53
- 卢伽 de Luca 116
- 陆方济 Franciscus Pallu 42, 44, 45, 48
- 陆若汉 Juan Rodriguez 28
- 陆伯鸿 157, 160
- 陆徵祥 123, 124, 173, 174, 178, 183
- 路易九世(圣路易)Louis IX. 4, 7
- 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45, 60, 61
- 罗光 151

罗历山 Alexandre de Rhodes 41
罗耀拉 23
罗明坚 Michael Ruggireri 25
罗文藻 44,46,47,48,49,50,149
鲁布鲁克 William of Rubruck 8,9
吕海寰 120

M

马可 Marco 7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9,10
马可斯 Markos 11
马屯哈 Mar Denha 11
马太后 32,33
马宁 Card Manning 109,110
马格里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 109
马莱拉 Paolo Marella 169,170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93
马国贤 Matteo Ripa 73,79,81
马黎诺里 Margnolli,或 Giovanni de Firenze 18,19
马戈尔尼 Lord, Macartney 88
马内·维罗勒 Emanuel Verrolles 97
梅雨丝 Charles Mcuus 187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93
曼西埃 Card. Mercier 131,140,174
蒙哥 8
蒙高维诺 Giovanni da Mortecorvino 14,15

- 孟振生 Joseph Martal Mouly 98,99
弥次郎 24
莫克勤 William A. Mc Grath 187
墨林 Francesco de Molin 33
穆德 Motte 187
穆敬远 Joannes Mourao 78,81,85
马相伯 131,132,133,134,135,136,143,145,149,150

N

- 乃颜 10
拿破仑三世 101
诺比利 Roberto de Nobili 61
南怀仁 Fedinandus Verbiest 28,29,49,62
尼古拉四世 Nicholas IV 12,14
尼古拉五世 Nicholas V 22
尼格尔 P. Goswin Nickel 33
尼古拉 Charles of St Nicholas 58

O

- 欧阳玄 18
欧杰尼四世 Eugene IV 22

P

- 潘如 Perroni 73

庞天寿 32,33,34
庞迪我 Diego Pantoja 54
溥仪 165,166,167

Q

耆英 90,91
钱启 Baldassarre Cenic 60
瞿式耜 31,32
瞿安德 Andrew Xavier Koffler 32

R

儒略二世 Julius II
任掌晨 Amodei 73

S

沙勿略 St. Franciscus Xaverius 24
沙国安 Mariani 66,72
萨拉诺 Nicholas Serrano 58
山遥瞻 Bonjour 73
宋君荣 Antoine Gaubil 86,87
史可法 31
史贝尔曼 Archbishop Sepellman 185,186
史泰来 Aureliues Stehle 149
施阿兰 Auguste Gerarel 95,96,119

施体仁 Francesco San Giorgio di Biandrate 71
苏奴 85
沈士贤 187
孙德桢 147, 148
孙中山 158
速不台 2
撒里答 8

T

铁木真 1
田耕莘 151, 178, 179, 180
田嘉璧(田类思) Louis Delaplace 107
田望霖 Alian de Terwangne 187
田恩霈 Terry 187
汤若望 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 28, 133
汤作霖 Catta 139, 143, 147
同治皇帝 99

W

瓦列索 Charles Francis Veresio 58
瓦内维 Mgr. Vanneufville 140
万其渊 49
王太后 32, 33
王老松 Card. Von Rossum 140
王伯禄 151

王文成 151, 181
王泽溥 151, 181
王世杰 183
汪精卫 161
卫方济 Francisco Vieira 53
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55, 56
翁文灏 186
窝阔台 2
乌尔班八世 Urban XIII 41, 55
吴铁城 157, 161, 186
吴历 48
吴三桂 32
吴经熊 183
文贵宾 158
文和温 Francois Wynhoven 112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93

X

徐光启 28, 53, 54
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63, 64
徐宗泽 150
徐类思 Luigi Celestino Spelta 98, 99
薛福成 107, 108
谢寿康 171, 178, 182, 183, 186
谢介石 165
悉哥底 Sigott 65

Y

- 亚杰利 *Ascelino* 7
- 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21
- 亚历山大七世 *Alexander VII* 34, 56, 71
- 亚历山大八世 *Alexander VIII* 43, 50
- 雅各彼尼 *Jacobini Card* 97, 107, 108, 113
- 雅八拉哈三世 *Yabalaha III* 11, 13
- 杨光先 57
- 杨毓辉 119
- 扬森 *Cornelius Otto Jansen* 57
- 伊都立 78, 79, 80
- 伊大仁 *Bernardinus della Chiesa* 44, 45, 74
- 易得丰 *Itdefonso de Nativitate* 86
- 于斌 151, 158, 159, 160, 161, 162, 169, 178, 180, 182,
184, 185, 186
- 于卜善 *Philippe Le Blanc* 45
- 俞大维 186
- 胤禊 85
- 原田健 170
- 余神父 *Juan Francisco de Ieonissa* 51
- 颜珰 *Charles Maigrott* 45, 57, 58, 67, 69, 76
- 英斂之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8, 143, 145, 149, 150, 160
- 英诺森四世 *Innocent IV* 4
- 英诺森十世 *Innocent X* 33, 55
- 袁世凯 123, 124

元顺帝 16, 17, 18, 19
雍正皇帝 84, 85, 86, 93
宴吉只带 7, 8

Z

哲拉德 Geradus 16
张焘 28
张诚 P. Jean Francois Gerbillion 63
张之洞 96
张指南 151
张运之 157
张介眉 187
曾国藩 105, 106
曾纪泽 109, 111, 112
曾德昭 P. Alvarode Semedo 32
者别 2
周济世 151, 180
朱聿键 31
朱由崧 31
朱由榔 31
朱开敏 147, 151
朱志尧 160
赵昌 78, 79, 80
赵方济 Francois Maresca 98
赵怀义 140, 146, 148, 149, 152
赵庆化 151

赵玉明 G. Predost 187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一 西文部分

(1) Allen, Charles Wilfrid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Shanghai, no date
艾伦:《京廷之耶稣会士》,上海,无出版日期。

(2) Cohen, Paul A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柯恩:《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
暴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

(3) George A. Dunne

A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62.

邓恩:《一代伟人:耶稣会士在明代最后数十年活动史话》,
圣母大学出版社,1962年。

(4) Lat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纽约,1929年。

(5) Lat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7vol, New York
赖德烈:《基督教扩展史》,纽约,1944年。

(6) Huc

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 and Thibet 3vol, London, 1857 –
1858.

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鞑靼和西藏》(3卷)伦敦 1857—
1858年。

(7) Wolfershan, Bertram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1860 – 1907. London, 1909.
吴费斯坦:《天主教会在中国,1860—1907年》伦敦,1909
年。

(8) Ray R. Nou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
versy(1645—1941)”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Press. 1992.

诺尔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百篇》,旧金山
大学出版社,1992年。

二 中文部分

(1) 费赖之著、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
1773)》,上海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8年。

(2) 耿昇著、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
记》,中华书局,1985年。

(3)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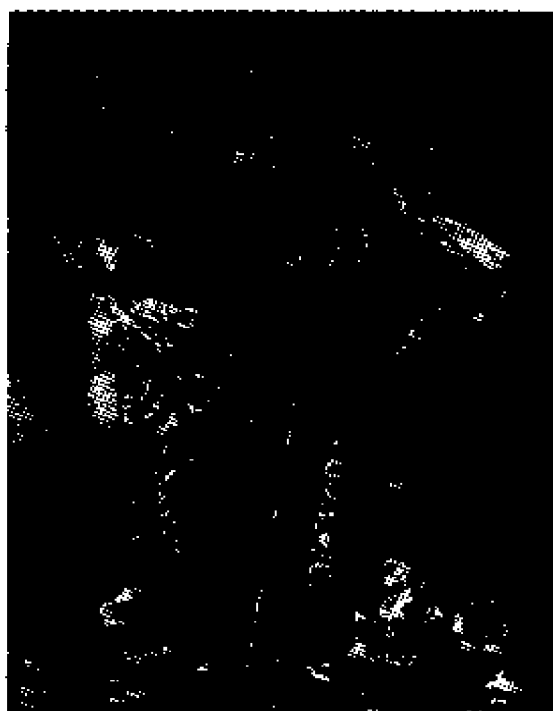
(4) 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

- 局,1984年。
- (5)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6)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
- (7)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7年。
- (8)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二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 (9)方豪:《中西交通史》(二卷),岳麓书社,1987年。
- (1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三卷)中华书局,1988年。
- (11)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下二卷),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
- (12)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
- (13)德礼贤:《中国天主教史略》,(台)商务印书馆,1972年。
- (14)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台)商务印书馆 1980年。
- (15)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 (16)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影印,1991年。
- (17)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台中耀汉小兄弟会编译,1990年。
- (18)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台北文景出版社,1977年。
- (19)刚恒毅:《残叶》,(台)天主教主徒会,1980年。
- (20)刚恒毅:《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天主教主徒会,1980年。
- (21)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上下卷),(台)天主教主徒会,1980年。

- (22) 顾保鹄:《中国天主教史大事年表》,台中光启出版社,1965年。
- (23) 赖诒恩:《耶稣会士在中国》,台中光启出版社,1965年。
- (24)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上海书店,1990年。
- (25)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
- (26) 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
- (27) 李刚己:《教务纪略》,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
- (28) 薛福成:《星轺日记类编》,云间丽泽学会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 (29)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一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 (30) 卫青心著、黄庆华译:《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31)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台)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74年。
- (3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附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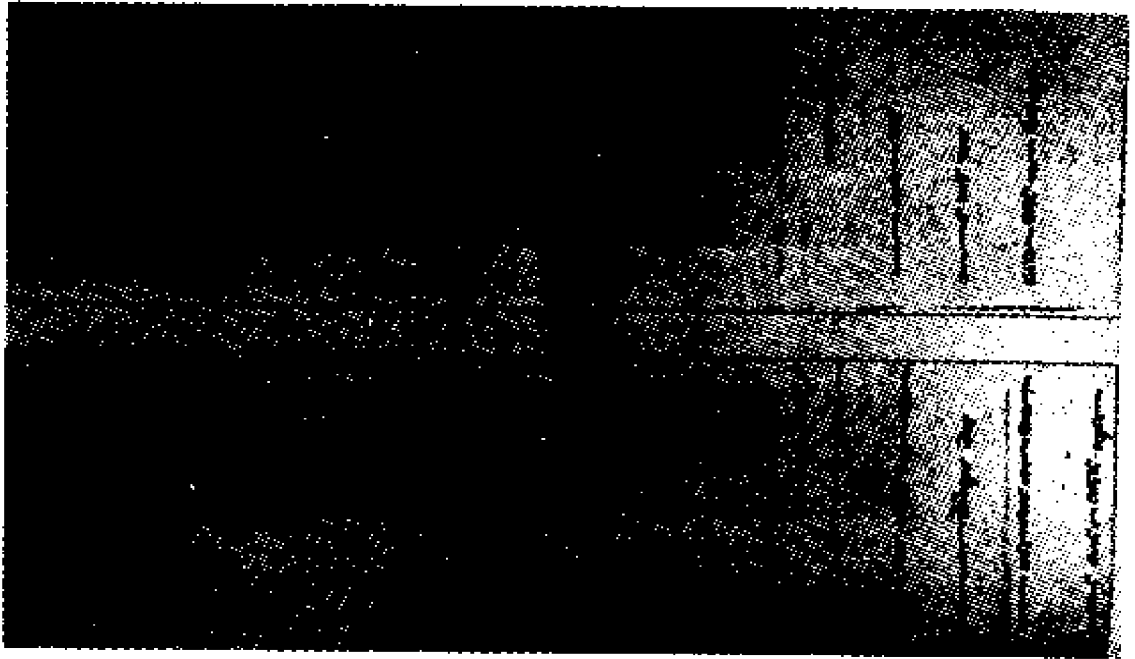
图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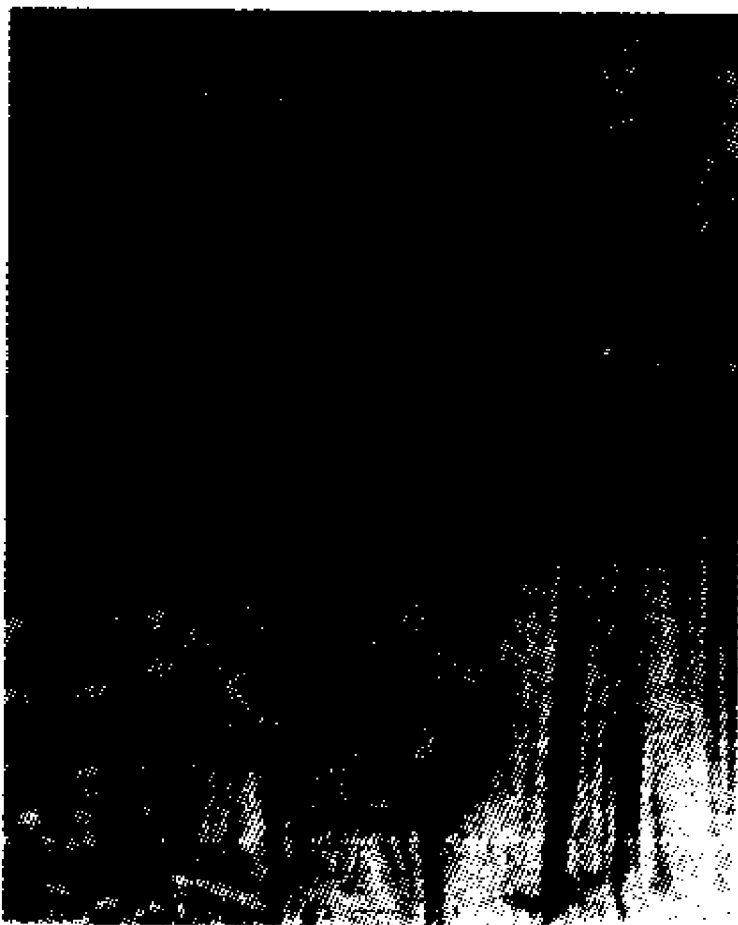
(1) 元朝来华第一位教廷使节、汗八里总主教蒙高维诺。



(2) 中世纪法国旧地图中所绘马可·波罗一家来中国。



(3) 蒙古宗王阿鲁浑致法王腓力四世书信。



(4) 元朝时来华的旅行家、方济各会士和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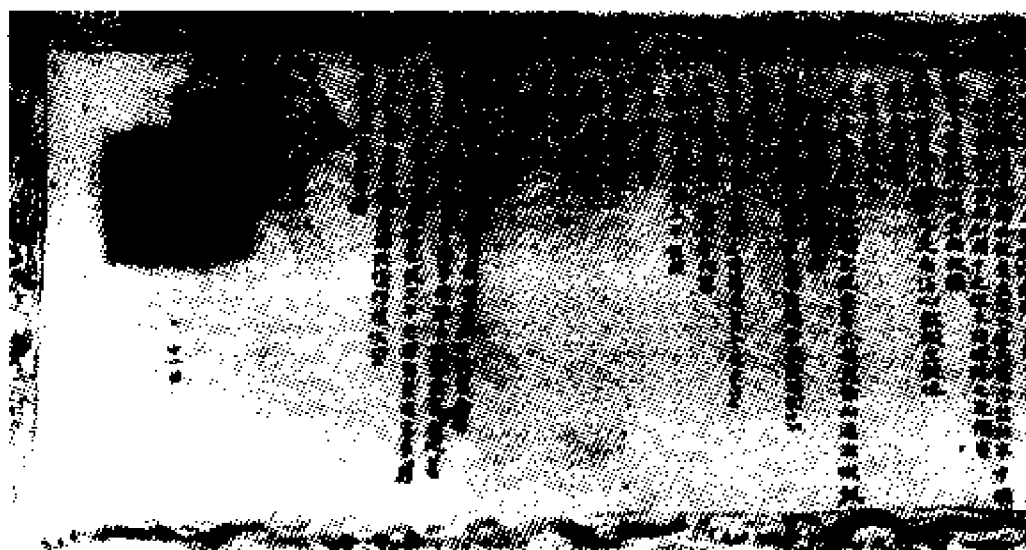
(5) 利玛窦《基督教远被中国记》欧洲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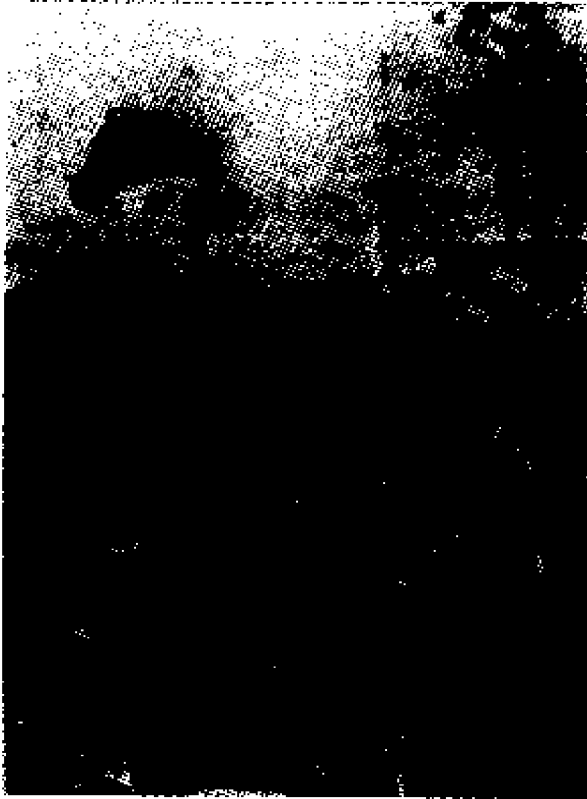
(6) 北京车公庄明清西洋传教士墓地。



(7) 上书罗马教廷的南明皇太后王烈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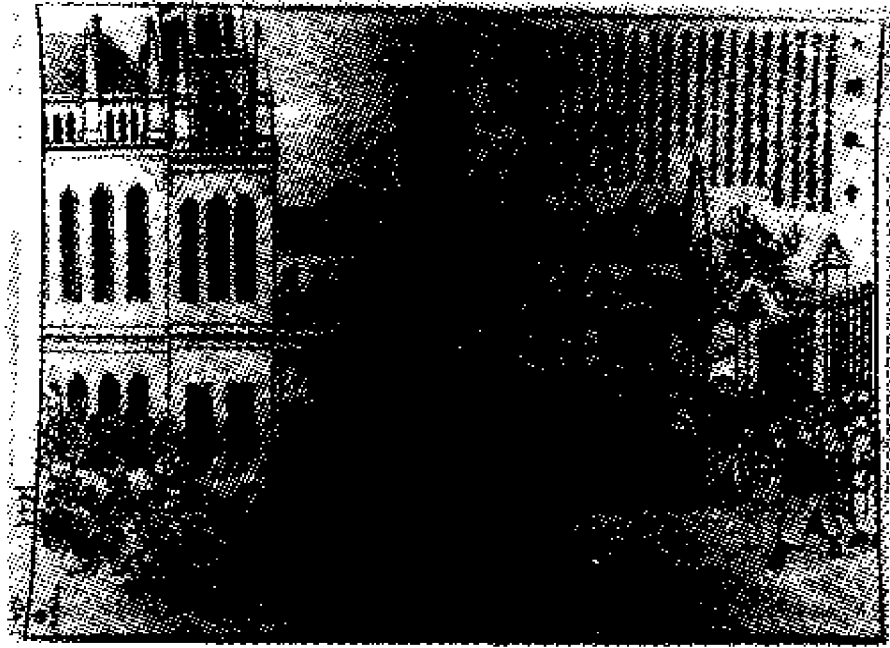
(8) 南明皇太后王烈纳致罗马教宗英诺森十世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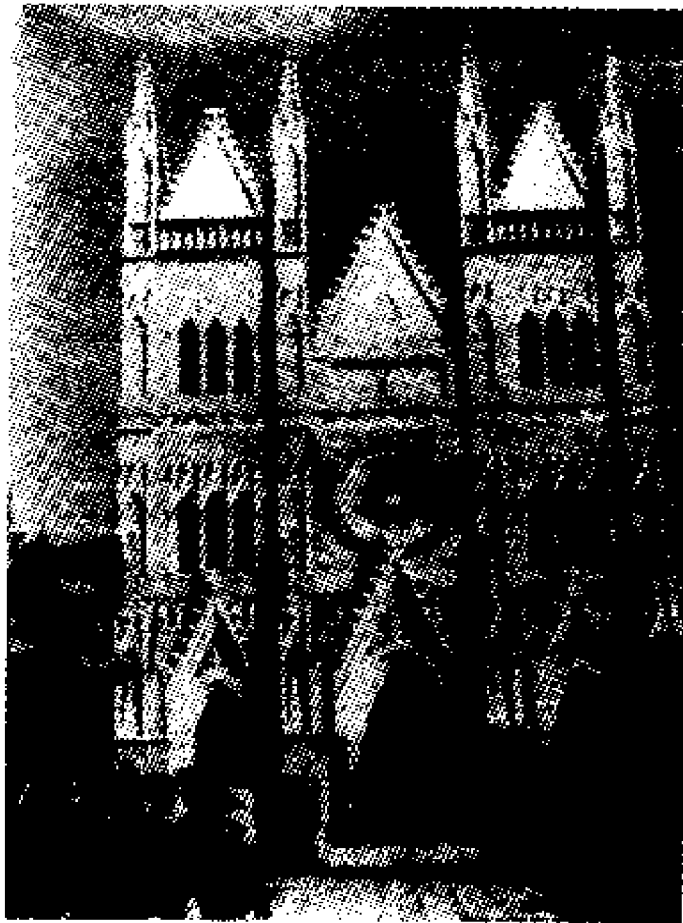
(9) 清代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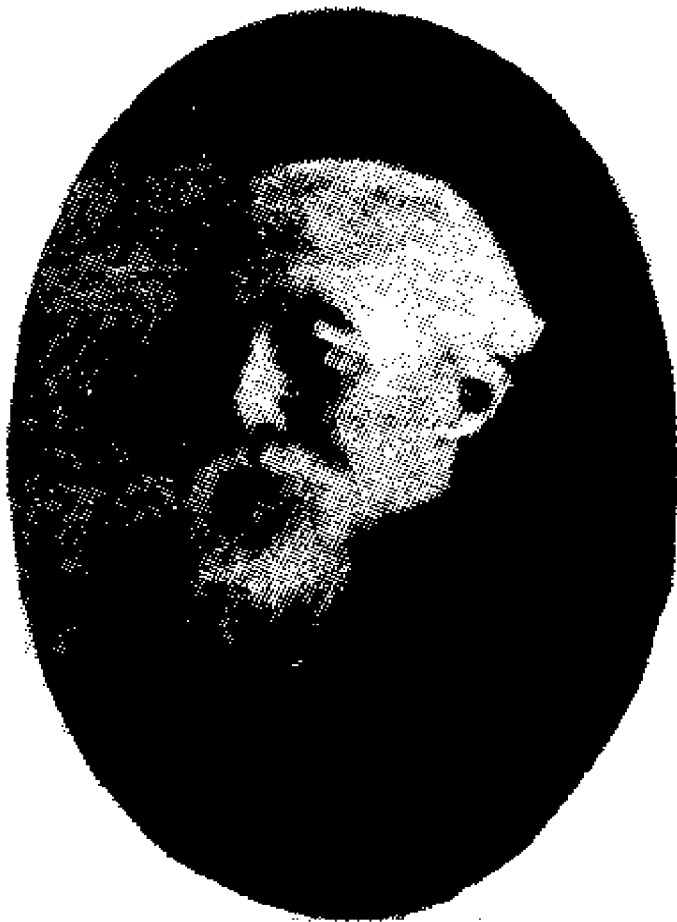
(10) 康熙皇帝为“礼仪之争”发布的谕旨。



(11) 近代《点石斋画报》中关于“教案”的描绘。



(12) 北京西什库天主堂（原蚕池口天主堂）。



(13) 方主改革教会积弊并上书教宗本笃十五世兴办公教大学的马相伯。



(14) 1926年8月刚恒毅与六位中国籍主教前往罗马前夕在上海合影。



(15) 1926年10月六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接受祝圣之礼仪。



(16) 1936年蔡宁与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后 记

本书是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形式。在研究此一课题的过程之中,作者得到了许多师长的指教,他们是: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戴康生研究员、张新鹰研究员、任延黎研究员、上海市宗教学会会长刘建老师、上海教区光启社总编辑沈保义老先生、华东师大历史系孙道天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李培栋教授以及严耀中教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夏青女士和东方出版社同仁对书稿作了认真的审阅,作者在此对于他们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一课题已于1998年获得通过。作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的基本立场,就是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不作无根据的评论,也就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它对于现实的实际情况有借鉴的意义,这是作者乐意看到的。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实,它的借鉴作用是由此衍生的应有之意。

由于历史档案尚未全部开放以及语言文字上的隔阂等原因,许多问题尚未深入讨论。因此,这只是一部关于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的大纲,故取名“史略”。作者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诚恳的批评。

顾卫民

2000年3月4日

